

民主台灣

33



1984年1月1日



選 舉 後

這次選舉，由於康寧祥、許國泰、張德銘、黃煌雄、高李麗珍等等黨外知名人士的落選，國民黨歡天喜地宣佈大勝慶祝。黨外運動的支持者雖然對選舉的成敗有各種不同的詮釋，但總歸不認為是勝利。由於這個結果相當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因此在選舉結束之後，所有黨外人士及關心民主運動人士，莫不議論紛紛，在台灣激起了一股廣泛的反省工作。迄今為止，方興未艾。

我們認為這是個好現象。選戰，就如任何戰爭一樣，原是有勝有敗，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也。因此，一時選舉結果的得失，實在不必過份計較。何況，這次選舉黨外的總得票率與上屆相差不多（依各種計算法而有不同，有的還認為稍微高了些），如果說黨外的失敗，不過是獲得席位的失敗。這主要是黨外人士大量參選，又無統一政黨可資協調，「失敗」乃屬技術性，而且是不公平的因素，才造成這個「技術性」的失敗。

但是，黨外運動發展到今天，已有許多需要自省檢討之處。這種檢討的需要性也可以從這一、兩年來黨外內部的所謂「路線鬭爭」中嗅出氣息來。然而，過去這一、兩年來的檢討是很不全面的，不僅是認真檢討的人只屬少數，檢討的內容與方向也不全面。我們曾指出，台灣的前途正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夕，以黨外目前的情況，要領導台灣人民渡過未來的暴風雨，還有待經過一番火鳳凰般的鍛鍊。因此，以台灣民主運動長遠眼光來考察，目前台灣黨外運動最重要的工作或許是一個廣泛而徹底深入的檢討。準此觀之，這次選舉的「失敗」，或許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這裡，我們也願提出一些看法，以和讀者與所有關心民主運動者互相切磋。

首先，讓我們來回顧，選舉在台灣是怎麼產生的？大家都知道，台灣在宣佈戒嚴下，許多人民的正常權力，如組黨、辦報、集會、示威遊行、罷工、農民運動等等，都被禁止了。唯獨選舉還能在台灣舉行（雖然也是限制多多）。誰都知道，選舉不過是民主的運作之一，體現民主運動的方式還很多，像上舉各樣都是。然而，台灣幾乎所有的民主運作式都被國民黨禁止了，却唯獨開放選舉（儘管是跛腳式的），這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如眾週知，國民黨之取消各種民主運作形式，長期戒嚴，主要是由於國民黨被中國大陸人民趕出來，危機意識高漲。它認為，所有民主方式對國民黨都是一種挑戰，一種威脅。因而它乾脆取消各種民主權利。然而，它也知道，一旦所有不滿的管道完全被堵住，則民怨一旦爆發，將是不可收拾的一個革命性局面。它必須開放，有控制地開放一個管道。於是選舉才能在戒嚴的荒漠中，成了人民嚮往民主的唯有的一塊綠洲。

這裡我們看到，選舉在台灣固然是人民追求民主的綠洲，是人民表達抗議的武器；但更重要的，它是國民黨維繫統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它先天就是跛腳的，是兩刃刀，可以

的 檢 討

有利於人民，也可以用來加強國民黨對人民的控制因而不利的。

不少黨外人士也認識到這種兩刃刀性，對選舉抱戒慎的態度。還有些人更是特別注意到不利的一面，看透了選舉的虛偽性，因而拒絕參加選舉。對此，我們必須強調，在其他民主的管道還被堵住時，選舉這種方式不可放棄。當然，也得注意其不利性。

然而，在黨外運動中，更多人似乎忽略了這個不利面。特別是近十多年來，由於黨外運動有相當的發展，於是對選舉的期望日益高漲，「選舉萬歲」已成了多數黨外人士的心態。其間雖有國民黨鎮壓黨外運動的高雄事件發生，然而黨外人士在事件後的選舉勝利中淡忘了高雄事件所可能產生的重大啟示作用。黨外雖然也不時有人喊出廢除戒嚴，但內涵多重政治應用，而對於實質的更多管道，更澈底的民主並未賦於足夠的重視。事實上，以今日的政治氣氛，往下紮根於勞工問題，農民問題等等實質民主的工作已可展開，但却未受到黨外應有的注意。

黨外近十多年來的成長，基本上是和台灣的經濟成長相適應的。這正符合了十七、八世紀歐洲資本主義興起後，新興的資產階級要爭取政治權力的普遍規律。因此，黨外近十多年來的一個新支持力量乃是新興資產階級。黨外出了不少這種新領袖，即使以康寧祥這個出身於萬華中下層民衆支持的黨外，這幾年也努力開發新興資產階級的票源。然而，新興資產階級固有其要求改革，追求政治權力的一面，但也有保守，維持現狀的一面。在國民黨的危機意識宣傳下，再加上國民黨誘以一些席位，這批要求安定的新興資產階級很容易被國民黨拉攏過去。這是一個涉及黨外長遠發展及基本性質的重大問題，值得更多的注意與更深入的分析。

與新興資產階級支持的動搖有關的，是黨外對待中共的態度。基本上，黨外對這態度還很不明確，其因素是不難了解的。我們一再指出過，國民黨壟斷與中共關係的專利權，對台灣人民是非常不利的。然而，黨外人士對此似乎很少探討，僅有少數有關中共的言論或主張，也都是盲從國民黨的反共心態，了無新意。即以這次選舉政見「自決」而言，雖然有各種詮釋，但主要提倡者的基本出發點是衝着中共而來的。我們不反對自決，更不反對抗議中共的對台政策。然而那些積極倡導者基本上仍然訴諸危機意識及恐共心態，與國民黨並無太大差別，這是我們深覺可惜的。須知，要反共，國民黨比黨外更有「威望」。如果出發點是基於恐懼中共的來臨，為什麼不支持國民黨？這種危機感特別容易促進新興資產階級倒向國民黨。

以上只是我們初步檢討所得。我們盼望海外關心人士也和我們一起來討論，歡迎大家來信。

評論	1	選後的檢討／本社
瞭解台灣	5	暗含玄機的「台灣前途決議案」／近聞與短評 台灣人民要求自決，但是美國是個會支持自決的國家嗎？
	6	從「偵破」爆炸案談起／近聞與短評 所謂「偵破」各有說詞。也談個人暴力的問題
	8	黨外運動的瓶頸／近聞與短評 最近的選舉結果引出一些問題
	11	選民對黨外是否有信心危機／吳宏 一位選舉目睹者整理了他的觀察所得
	13	台灣學生運動三十年（一）／速字 三十年來，國民黨極力防止學生運動，但仍有些事件發生
	17	「祝壽專號」的言論風波／陳漳生 「自由中國」全面和國民黨衝突的前後
	20	清議與干戈／劉博崑／原刊「自由中國」15卷9期 借慈禧太后勸諫蔣介石不要太獨裁
	22	談糧食進口大國的稻米過剩危機／任覺民 矛盾的發生，源於美國傾銷農產品
探討中國	30	黃賢與陳明忠／不光 曾為拯救台灣陳明忠而努力的黃賢，自己在中國被判刑十五年
認識世界	7	創造反侵略的環境／近聞與短評 防止美國入侵格島事件的重現，要民間創造一個反侵略的氣氛
	36	十九世紀日本帝國主義的心理分析／入江昭作嚴敬譯 分析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各種說詞
思想	34	青年馬克斯主義的異化理論評述／向新左 異化理論是馬克斯早期重要思想，反映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
	43	為什麼要社會主義／愛因斯坦著，思餘評 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問題
歷史	41	愛因斯坦的另一面／信英 介紹愛因斯坦較不為人注意的反戰思想與社會主義主張
	46	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二）／戴國輝原作，林真理改譯 本期介紹「洋務運動」前的台灣主要經濟農作
藝文	55	記一次文學座談會／陳鴻 六位作家發表他們從事寫作的經過及其他
	53	聽陳映真「台灣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的比較」演講雜感／過客 陳映真把台灣文學放在國際性第三世界的架構中來考察

編輯報告

這次立委增補選，是從十月中到十二月中這段編輯期間，最引人注意的事了。有關這方面的新聞報導非常豐富。“民主台灣”是雙月刊，基本上不適合合作消息性的報導。因此我們將不作新聞性的整理，我們推出一篇社論及兩則評論，來表達我們的關心與看法。

在付印前，我們已看到幾份選後出刊的黨外雜誌。幾乎所有這些刊物都以大多數的篇幅檢討這次選舉。多數意見都很誠懇地承認黨外的失敗，並作了許多反省。這是令人欣慰的好現象。黨外運動發展至今，已產生許多問題。需要好好地檢討，才能應付未來更重大的責任。選舉結果引起對黨外運動全盤的檢討，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就目前所看到的而言，檢討的內容似乎較重選舉策略，對未來的改進之道似乎也較重技術性。這是我們覺得美中不足之處。有鑑於此，我們的檢討便較注重黨外運動的意義，黨外支持者的階級分析及其可能的變化，等等方面。

另外，黨外刊物的這些檢討又太注重選舉的得失，或者太重視「選舉本身」。誰都承認，選舉在今天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性。忽視選舉，就不可能掌握台灣社會運作的脈動。而在國民黨長期戒嚴下的各種限制，選舉也幾乎成了台灣民主運動唯一可以活動的管道。這是必需承認的事實。但是，承認事實的存在並不等於承認事實的合理性。沉湎在既存的事實框架內，不僅無法改革現存事實的不合理性，甚至合「法」地應得的勝利也往往得不到保障。民主運動必需超越「選舉萬歲」的心態，努力開拓其他民主活動的管道，如社會運動、學生運動、工人、農人運動，等等。

如果我們把眼光投注在這些新領域上，將會看到一片寬闊的原野待人開拓。上期我們刊出了社會環境運動的探討，本期開始介紹台灣的學生運動，還有從稻米生產過剩看到農民處境，等等。

台灣稻米生產過剩危機，反映了台灣問題的一

個複雜面，即台灣的對外關係。戴國輝的台灣史介紹，告訴我們近代帝國主義對台灣的垂涎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事實上，台灣的悲慘的歷史命運，主要地是拜受帝國主義之賜。時至今日，帝國主義對台灣的野心與影響，比之百年前決不稍弱。很遺憾地，這個對台灣人民的幸福前途具有這麼重大影響力的因子却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這期有多篇稿件，包括「十九世紀日本帝國主義的心理分析」、「從國際關係看台灣問題」、「聽陳映真演講雜感」、「創造反侵略的環境」、「暗含玄機的『台灣前途決議案』」以及上述兩文都從不同角度涉及帝國主義，顯示這個問題涵蓋面廣兼曲折複雜。

除了要跨越設限的格局之外，縱深的探討也是黨外運動目前所需強調重視的。即以稻米生產過剩同時台灣又進口大量糧食此一現象而言，表面看來似乎令人費解。生產過剩竟然會造成危機，這在過去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中是很罕見也不易理解的問題。要充分認識這現象產生的原因，造成的危害及防治之道，只有將它放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架構中來探討，才有可能。其他類似的例子，隨時隨地可以從我們平日所見所聞的現象中列舉出來。時代愈形複雜化，它逼迫人們必須以更深刻的分析，才能認識許多似乎相矛盾或不相干的表面現象。

本期有兩篇思想性的文章，代表我們對此一問題的注視。這兩篇文章涉及馬克斯主義及社會主義。剛從台灣出來不久的同學們也許會覺得陌生或害怕。我們期望能以開放的心胸來接觸它。它並不可怕。您將發現，馬克斯的思想中有非常人道的成份。事實上，馬克斯不僅具有人道主義的精神，而且還極度重視，重視到他用極大的力氣來挖掘現代人所以受苦的最根本因素。這就是他的異化理論。

社會主義對台灣教育下的留學生，也是一種近乎邪惡的東西。但在事實上，它是無數具有崇高理想、思想冷靜深刻的人所共同追求的目標。人類史上，最有智慧也最偉大心靈之一的愛因斯坦，便是其中之一。本期我們譯載了他的一篇文章，並介紹了他為人忽略的和平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的一面，希望有助讀者來探討社會主義。

我們一直擔心，較理論性的東西不容易介紹好。我們在這方面文章的審核及編輯過程都花了較大的心血。然而，當局者迷。到底成果如何，還有待讀者的讀後感。我們等待着您的來信。

帝國之腦最後結論，續稿來遲，下期再刊出。

暗含玄機的

「如雲必纏珠」

在美軍剛擊武揚威的雄據格林那島之後不久，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了第七十四號議案——台灣前途決議案。該案議決：參議院認為台灣的前途必須和平解決，其方式須是免於強制，且為在台灣的人民所能接受，並須符合「台灣關係法」以及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簽訂的各項公報。

議案本身的文字與含義，應該可以理解成是對台灣人民的好意。但是，議案的提出，以及參院在邀請論者作證的選擇及作法上，却不能不令人擔憂，參院在對台灣人民的「好意」之外，尚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用心。

在台灣前途決議案的聽證會上，受邀出席的論者，有代表國府立場的蔣經國、代表國務院立場的蕭萬長，代表台獨勢力的羅福全。這之間沒有真正台灣島內人民的聲音，也沒有代表中共官方立場的聲音。

議案在外委會通過之後，中共即發出四、五篇文章猛烈譴責美國和「台獨」勾結，企圖干涉中國內政。台獨亦大幅刊出各地同鄉支持台灣前途決議案的廣告，以示該議案決非「一小撮野心份子」的把戲。國府的反應則欲語還休，亦拒還迎，美國則盡量淡化該新聞。

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我們當然希望支持台灣民主力量的國際友人越多越好。但至今，對台灣而言，「國際」的同義詞仍只是「美國」，衡諸美國的對外歷史及現實，我們在對美國的善意領首稱謝之時，却不能不提高警覺。

從越戰前越南政變的顛倒、智利民主政府的倒

台到最近美軍入侵格林那島以致目前仍在瀰漫的中東煙硝烽火，美國以她自己從十九世紀以來的歷史表明，美國從來都不關心別國的人民，美國人關心巨型的災難，但災難永遠要在遠處。在對外關係上，美國永遠有一條明確的綱領，那就是要拼命維護她已獲得的利益和爭取更多可能獲致的利益。

任何帝國主義大國在實施對外擴張時，總免不了對所欲據領的土地人民寄以口頭的關懷。日本欲侵略中國東北、華北時，先許以當地人民應有爭取民主的自治權、成立自治政府，繼而獨立建國。這種口頭關懷背後有整套在步驟的計劃在配合。

一九七九年，島內發生驚天動地的「高雄事件」時，號稱講人權的卡特政府，沒有半句傷情的支持台灣人民的話。在各方面都比卡特還要保守反動的雷根政府，竟會突然關心起台灣人民的前途來了，其中暗含的玄機，不是任何有心識無家鄉父老的台灣人所難深思的嗎？雖然雷根政府在稱頌國會的決議不是他的政府能左右的，但這不正顯示美國在必要時，不惜要弄「民意牌」，以獲取本身更大的利益嗎？

在台灣人民面臨各種坐牢危險，爭取憲法賦予人民的民主權利時，在台灣人民爭取自己詮釋「自決」的意義時，在台灣人民和國民黨和中共作各種奮鬥時，台灣人民更應提高警覺，識破「美國關心台灣人民」的這層糖衣，要決然防止台灣人民在自求解放的過程中，遭到美國對台灣採取類似格林那島式的禰手。

從

——偵破爆炸案——談起

今年四月廿六日，震動台灣島內外一時的台北中央、聯合兩報爆炸案。國府已於十二月十二日宣佈偵破。主嫌黃世宗現年廿六歲，已逃離台灣，返回僑居地巴西。其兄黃世梗因涉同案，已遭台灣當局逮捕。

台北特別調查組的發言人說，美國世界台獨聯盟首腦張燦濞派遣黃世宗進行爆炸案。據稱張曾到巴西祝賀他參與炸彈攻擊。

調查局表示，能順利偵破該案，乃因「台獨聯盟」組織總部的一名核心工作幹部，於今年八月自美回國，向調查局自首，透露極機密的檔案證據。調查局根據那些資料，循線破案。

調查局說，爆炸案經調查，確是台獨聯盟自海外派遣暴力份子返台從事的恐怖暴力活動，造成十二名無辜民衆的重大傷害，案情與「台灣公論報」所發佈的新聞相符。

美洲的台灣公論報於十二月十四日及十七日連續發表兩則台獨聯盟的聲明稱：蔣政權於目前宣佈偵破「四二六」爆炸案，企圖掩飾長期無能破案的醜態，「四二六」事件，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島內革命組織「正義建國軍」的英勇抗暴行動，當日同時對蔣政權警總出入境管理處、中央日報及聯合報施予攻擊。

台獨聯盟發言人林大川並說，國民黨謂該聯盟有人返台投誠，純屬捏造，實不足採信。

該報並稱「正義建國軍」傳出電文謂：四二六爆炸事件是正義建國軍為打擊蔣家獨裁政權所採取的英勇抗暴行動。整個事件的策劃及執行，全由本地革命同志負責，與黃世宗及黃世梗全無關連。

「正義建國軍」並指控國民黨特務人員慘無人道，刑死黃世宗的雙親。另外，巴西聖保羅市的台獨聯盟南美本部，鄭重聲明四二六事件與巴西僑胞黃世宗、李朝旺和該部完全無關。

國府未抓到爆炸案的元兇，國府指控該案是台獨聯盟主謀的。現在，兩方面顯然是各說各話，一方一口咬定，另一方矢口否認。甚至「正義建國軍」亦稱整個事件完全由島內的人策劃執行。爆炸案到目前可謂尚未宗全偵破。至少，偵破爆炸案的說詞，至今仍未能完全取信於海外的華人。

我們固然理解任何一宗非為個人目的而行使政治爆炸案件，背後一定存在着一些其他因素。國府和西方現存的統治階層，在譴責類似的爆炸案件時，固然都從濫傷無辜的人道主義去譴責暴力活動。然而，當他們在譴責暴力份子行使非法暴力時，他們却在「合法」的範圍內，讓警察享盡了使用暴力的特權。像打死王迎先的警察，被表面起訴後，居然還能出國，逍遙法外。當權者在譴責暴力份子枉顧人權時，往往忘了自己漠視人權的事實。

要改進台灣社會不合理的現象，要促進台灣的民主化，從事運動者往往沒有掌聲、沒有喝彩。然而，對台灣未來目標的主張是否正確，應由社會檢驗，通過多數人民認同的過程的主張，才會是較正確的道路。如果不是通過組織群眾，喚起民心，逐步鞏固人民對民主化的要求，而只是通過少數個別的武裝活動，像政變之類暴力活動，則台灣人民未來的幸福，則仍難獲得保證。

無論爆炸案是否偵破，我們却認為在推動台灣的民主化時，濫用暴力活動似無法獲取台灣真正的民主。回顧台灣在一連串的爆炸、放火之後，國府的統治權威並未動搖分毫。爆炸放火，固然能使某些人痛快一時，激發一些士氣。然而，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却不能不認清，要在全社會的範圍內，從事教育、文化、政治、經濟、性別的各項民主工作時，絕大多數時間，皆是枯索無味的。每個人在自己崗位上所能成就的，常常是微不足道的。想在民主運動中，以痛快壯烈的行為做事，無疑是會帶來

與事先的期望相反的成果。

綜觀世界各國在建國的過程中，人民未普遍覺醒時，少數懷有理想的菁英份子，用各種暴力手段，以自己崇高的理想生命，換取統治階層的身家性命，像中國辛亥革命時的「彈炸五大臣」，和汪精衛的行刺活動。他們皆想「引刀成一快」壯烈成仁，他們的暴力行動固然可以合理的解釋，但是，當革命的客觀條件未成熟時，暴力行動就只能被解釋成個別的暴徒行爲，或無望的小資產階級的安那琪主義作祟。像PLO的行動，至今並無法對整個目標有很大的幫助。台灣的爆炸案即使未破案，對台

灣的民主運動又有何具體幫助呢？

暴力活動若未與整個客觀社會的條件相配合，那就變成一小撮人的一廂情願。台灣民主運動乃至整個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仍有很遙遠的路要走，台灣從事民主運動者，一定要從台灣社會的現實性出發，尋求各種有益的社會力量，糾合成一股民主潮流。沒有任何捷徑可循，只能老老實實的，透過組織群眾、教育說服、提高人民的民主素養。唯有當人民都準備當家作主時，台灣人民的民主生活才能獲得真正的保證。

共同推動

防止侵略的環境

美軍入侵格里那達，震驚了全世界。以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攻打只有幾萬人口的蕞爾小國，這種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帝國主義嘴臉暴露無餘。

美國以其最先進的生產力，最前鋒的科技能力，最成熟的資本主義制度與最富饒的人民生活水平，吸引了許多較落後國家心向上爬的人。他們嚮往着美國這一切，嚮往得如此五體投地，以致於對美國的一些缺點，也就事不關己式的表現出無比的容忍性。

這些人甚至不相信某些對美國缺點的指述或批判。例如，對於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的說法，便常聽到許多反對的說法。其中一種說法「美國並未像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那些英、法、德、日等國派兵攻擊他國。」他們認為越戰是「應當時南越政府的邀請而出兵的，爲了防範共產勢力的擴大，美國本身並無侵略的野心」。至於韓戰，那更是「爲了服從聯合國的決議，抵抗北韓的南侵」。這兩個戰爭的複雜性，使得美國出兵的性質容易引起爭論。然而，入侵格島事件使這類邏輯失去任何說服力。

還有些人天真地認爲，美國雖然是帝國主義的國家。但時代不同了。往日那種船堅砲利的赤裸裸入侵，在今天這個國際形勢下不可能發生。美國人侵格島，又把這種美夢打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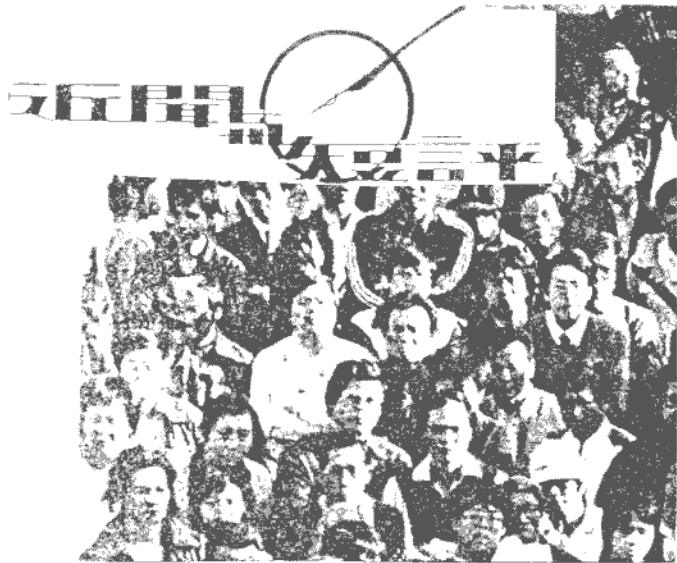
當然，今天這種赤裸裸地以兵戎相加，的確不若十九世紀下半葉的頻繁。然而，這個「時代性的不同」，並非因爲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根本性的改變，而是因爲國際性的各種反對性力量的成長。這種反對性力量，主要不在於幾個強國之間的對峙（強國間的對峙，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早已如此），而是人們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及無數次反帝國主義的經驗，逐漸形成的。它是一種人們普遍的覺醒，是一種民間的力量。它不是實質的槍炮，却能抑制帝國主義者的軍事冒進。

美國入侵格島的軍事部署並不是最近才開始的。事實上，早在四年前，格島大選社會黨人獲勝組閣時，美國便已積極從事軍事行動的步署。只是當時美國社會氣氛未若今日之好戰。從六〇年代末期美國人民因反越戰而形成的一股反戰或反侵略氣氛尚未完全消褪，故美國不敢輕易用武。但到了這一、兩年，在雷根的極右政策下，再加上國際上的現實主義高漲，倡導正義的理想主義落入低潮，美國便敢於出兵了。

從這個分析，我們看到，若要使今天這個時代的確與十九世紀不同，我們還要繼續增加各種反對力量。這種反對力量，主要是一種人們普遍的覺醒。它不是另一個強國以軍事嚇阻力量的姿態出現，

看起來不足剛強有力；但它却是促使這半世紀以來帝國主義者不敢輕易動武的主因之一，它造成了「時代不同了」。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也是我們應該做的。所有



這次萬方矚目的台灣立委選舉，在經過十五天激烈的競選活動，有些候選人散盡千金，有些候選人用盡宣傳花招，一些真假黨外候選人也趁機抨擊國府諸種不當的措施，在半個月的衝刺之後，十二月三日選舉揭曉，黨外人士僅獲江鵬堅、方素敏、鄭余鎮、許榮淑、余陳月瑛、張俊雄六席，担任十四年公職的康寧祥竟然僅獲得三萬餘票，康氏的落選成為當日的國際新聞。

選舉結果揭曉之後，中英文各報皆說黨外大敗。親國民黨報紙均以大篇幅報導分析國民黨大獲全勝的原因，一些所謂的開明御用學者，開始事後有先見之明的對國府的開明化，予以不保留的肯定。當然，有些給自己的學術良心留點後路的學者，總不免在結束評論之時，再對國民黨的民主化傾向，予以耳提面命式的叮嚀嘉許或寄以深切的期望。

若從黨內外的獲票數分析，國民黨的獲票率仍在七成左右，但剩下的三成不純是黨外的票數，由黨外後援會推薦的真黨外候選人，得票率佔百分之十八點七七，其餘的是那些黨友或假黨外的獲票數。以前的人，把非國民黨者就稱為黨外，在進步到今天的台灣政治現況，黨外的含義已比早年明確多了。同時，也可看出草莽式的地方勢力在品味上與黨外相去甚遠。

雖然有人列出諸多這次黨外立委席次減少的主

不願意看到帝國主義以武力來干預弱小國家內政的人，所有愛好和平、愛好民主的人，讓我們共同努力，共同推動一個反戰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國際環境！

黨外的 瓶頸

因，乃因國民黨種種不公平的措施及作弊所致，而不承認這次黨外的失敗。國民黨在選前選後作了許多手脚，被明列出來的有如下諸端：一、國民黨早就利用各式各樣的黨員大會、平民大會進行期前競選。二、利用選罷法諸種嚴厲措施，限制黨外候選人的活動。三、在區域選舉和職業選舉上大作手脚，使黨外候選人的獲票數，顯著受影響。四、利用金牛瘋狂買票。五、選舉後瘋狂作票。例如，很多鄉鎮的投票所，投票結束後，並不當場開票，工作人員將票箱抱住往選舉中心去開票。中間的過程作了許多不可告人的手脚。再如，高李麗珍的票數當場亮出來的票數，且經工作人員簽名負責的票數，到了選舉中心之後竟然縮水。國民黨不說是選務主委蘇南成的錯，反而推稱是下級工作人員的筆誤。面對那樣的流氓惡霸作風，此次選舉無論怎麼說，都說不上國民黨在公平競爭，也說不上國民黨有誠意實行民主政治。

但是，無論怎麼數落國民黨，黨外在這次選舉能不承認失敗嗎？雖然有些人稱：「黨外總得票數並未降低，國民黨瘋狂作票、買票，選罷法逼黨外處在不平等地位競爭……。」因此，他們下結論道：「黨外並未失去民心。」可是，反駁者同時可說：「國民黨那一次不作票、不買票？那一次公平競



選過了？」

所以，雖然國府所公佈的選舉數據，非常值得懷疑，但我們依然可以從這次選舉結果，總結一些作為黨外運動者未來參考的經驗。

首先，當然是黨外的配票問題，今年如果選舉時，各黨外候選人能搭配得好的話，至少黃煌雄、高李麗珍、許國泰、張德銘應可獲選。那黨外就有十個席次的立委，至少能維持住八〇年的局面。從這次黨外各自為政的局面看來，「黨外中央後援會」事實上未發揮任何功能，黨外要朝向組織化的合作路線，顯然是很困難的。即使歷經此次的大敗，黨外人士深切反省之餘，恐怕很多人仍只會認為個人的失敗乃因與地方關係不夠密切所致，往後所努力的也許只是參加婚喪喜慶、參加的更勤快，培養自己的地方的影響力。「中央後援會」如果不能在財政、人源的供應上建立權威性，作為一個組織，它終究是空的。

今年的選舉，黨外最該承認失敗之處，就是高估自己情勢的擴張，黨外票源並未增加，而黨外候選人却大量增加。三年來黨外群眾沒有增加，顯示三年來雖然黨外辦了十多份雜誌，却只徒然增加了固定的黨外支持者荷包的負擔而已，並沒有增加黨

外的群眾，這說明三年來黨外運動的方向有深值檢討之處！舉例來說，在台灣十八歲以上的就業人口中，有百分之五十工人，百分之廿農民，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到現在為止，他們的問題很少被關心，也很少黨外人士想到要去開發這個廣大的票源。

黨外人士這幾年來，不斷糾纏於「改革體制」、「體制改革」，「放火」、「放水」，「中國結」、「台灣結」，等空洞的路線之爭上，且幾乎使盡全力用於路線的批鬥。並非路線的問題不重要，但在黨外當前強敵環伺的情況下，團結別人猶恐不及，有何本錢要大家表態交心呢？黨外必須僅發一分力氣搞路線問題，其餘九分力氣要去開拓廣大的工農票源。

同時，這一次台灣的選舉中，黨外莫名其妙的喊出了「自決」的口號，在時間的配合上，似乎與海外的美台們推動的「台灣前途決議案」遙相呼應。這個口號的要求是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未來的命運，但是很明顯的提出這個口號所隱含的心理因素是反對中共，但是選民不免狐疑黨外與海外呼應這個口號目的何在？在台灣，誰都知道國民黨是最反共的。要投反共票一定投給國民黨。黨外是不是反共，人民尚不很清楚呢！黨外湊這個反共熱，不是顯得太自大了嗎？自以為比國民黨更適合談這個問題。而其實呢？選民要求黨外的就是老老實實的把架在台灣人民頭上的那些苛政厲法迅速解放。黨外不此之圖，却要模仿美台們講些高層次的，只有美國參、眾議員才聽得懂的話，難怪選民對黨外依個自的理解千奇百怪的解釋「自決」感到納悶不已。

黃煌雄、高李麗珍、許國泰、張德銘等人的落選，可說是落選並不落敗。他們的落選可以說是其他技術性的因素所致。然而，康寧祥的落選則含意深遠。有人說，康氏的落選代表黨外選民對「放水路線」的唾棄，但對這種說法，有人認為不能太快下定論。另有人認為黨外年來嚴厲的批康，造成對康的殺傷力，也有人說批康僅是反應選民的看法。同時，也有很多人都說因為他們認定康氏會當選，所以轉向支持較弱的江鵬堅，而認為是康氏的大意失荊州。還有人認為康氏是被國民黨的傳播機構故意吹捧，而整倒的。

然而，在諸多原因中，我們認為康氏的落敗正是一個信號，這個信號在說明國民黨的一些技術官僚，在力求國民黨的自由化上，努力扶助中產階級

的生意人，獎勵各種投資企業，使得生意人越來越怕台灣動亂，中產階級在台灣目前經濟逐漸復甦聲中，可能對黨外的支持日漸萎縮。

康寧祥崛起於號稱與台北的發展無緣的艋舺。在萬華勞動兄弟的支持下，他由市議員而國會議員的逐日建立他的聲望。又他經常在立法院的圖書館用功圖書，頗得像吳延環之類的國民黨立委的好感。在他後期的政治活動中，經常在青商會、扶輪社、獅子會等中產階級俱樂部中，發表一些「高瞻遠矚」的演說，甚至與美國自由派議員及海外一些美台們發展了良好的關係。在他聲望日隆之際，他的勞動兄弟却發出「他僅顧應付記者而不在乎應付選民」的抱怨。康寧祥個人雖掛上了中產階級的列車，可惜他的勞動兄弟追不上，在中產階級的列車奔向國民黨的懷抱時，老康只有孤孤單單的落敗了。

康寧祥已揚言三年後捲土重來。他曾經在選前要求中央後援會推薦現任立委，他的黨外公職人員掛帥論，使得他的落選顯得倍加淒苦。黨外人士如果不能被選上公職人員，則他的發言權就應小一點嗎？如果，三年後，中央後援會仍然存在的話，老康是否還堅持應該推薦現任立委參選呢？康寧祥如果不能從這次的落敗中，看出黨外運動除了選舉之外，還有許多可做的事，則這次挫敗對他而言並無太大意義。如果，他真的是一個值得美國、國民黨、以及黨外群眾寄以厚望的領袖人物，則他應能從選舉窄巷走出來，使黨外運動走向更廣大的視野。

在台北市以第一高票落選的雷渝齊，獲得五萬一千多票。他的「敗部冠軍」呈現出台北市的一面。到底投他票的是那些人呢？假如我們欲分析這些的話，不如先求證那些人不可能投票給他。

第一類為國民黨的鐵票，雷既然已違紀競選，這些國民黨能控制的鐵票是不可能分給他半分的。

第二類為黨外的鐵票，雷雖然大罵國民黨中的特權份子，但他始終以忠實的國民黨自居，所以不論是公開表示或私下反對國民黨者，都不會投票與他。

第三類為地域觀念濃厚的本省籍人士，雷本身為外省籍人士，地域觀念濃厚的本省籍人士是無法與他產生認同感的。

去除了以上三類人士，剩下者便很明顯了，這些投給雷渝齊一票的人都是一些中間性的遊離票。這些中間人士，他們原本很可能都是國民黨的忠

誠支持者，但漸漸由於國民黨許多的政策錯誤與特權階級作祟，使他們心中開始產生不滿，這裏甚至包括國民黨本身的一些開明派與自由派人士。但另一方面，由於受到大眾傳播媒體的扭曲報導，使他們認為黨外人士就是「分歧份子」、「野心份子」，因此又不願認同於後者。在以往的選舉中，由於「角色衝突」的心理影響下，使他們基於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而投給國民黨一票，現地忽然有一個聲音，這個聲音是如此大肆揭發國民黨特權階級的黑幕，另一方面又自稱為忠實的國民黨員，這正符合了他們心中的期望，因此紛紛投票給他。這種現象告訴社會大眾一個事實，那就是不滿意國民黨者與支持黨外者這兩種人是不能劃等號的，因為前者一定大於後者。黨外人士如何努力去改變這種態勢，正是未來黨外民主運動的大課題。

楊祖珺的選舉熱潮，也反應了台灣社會的一些實況。第一，她是以真正黨外外省人的面貌投入選戰。她的先生林正杰當年選舉時，雖然也是外省黨外，但他和許信良的關係密切，外省人的形象反而不是那麼突出。第二，她的選舉擴大了選舉的視野與內涵，點出了黨外領導台灣文化面的可能性，也指出了民主運動未來的可能方向。

十二月六日中報的報導稱，張富忠認為楊祖珺的選舉，已使黨外運動增加許多內涵。楊祖珺在選戰中，一邊歌唱，一邊演講，送玫瑰花。使得所有的群眾都無法拒絕她所傳播的愛與和平的訊息。張富忠形容楊祖珺的選戰頗像六〇年代美國年輕人所展開的民主運動，使民主運動不只停在挑戰國民黨政權的層面上，更推廣到整個社會文化的層面。如果楊祖珺的形式能為社會普遍接受的話，台灣未來的民主前途，內容將更豐富，更能溫暖人心。

對台灣的民主運動而言，選舉只是許多百廢待舉中的一環，國民黨把選舉大勝說成是它的大獲民心，在一個自定遊戲規則的競賽中，自己評給自己接近滿分，然後愉快的昭告世人說自己很好，這種阿Q心理固不足取。然而，黨外在席次減少之餘，却不能不更嚴肅的思索，作為要背負台灣未來十字架的人，一定要懷着謙卑的胸懷，更深入走向社會深處，為大多數貧苦無告、被損害侮辱的人爭取憲法賦與的權利。否則，若一味停留在妄筆談論憲政危機、法治危機等空泛的議題上，台灣黨外則仍將長期的空談下去。



- 吳宏 -

選民對黨外有「信心危機」？

從這次台灣島內立委選舉看來，黨外政治運動其實已陷入十分險惡的境地。筆者認為，黨外運動目前遭遇的嚴重問題在於，他們已逐漸令選民與之「貌合而神離」。更確切地說，過去一向支持黨外或不滿國民黨作風的中間派人士，他們在與黨外人士認同的情感上可能已產生一種疏離的傾向，原因是黨外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猶自四分五裂，將來握權之後真能強過國民黨嗎？由此疑問延伸出來的「信心危機」，恐將是黨外人士日後必須嚴肅對待的問題。

筆者本身雖無具體統計資料，但根據觀察本次選舉所得認為，這一次黨外候選人大部份落選，主要是支持黨外的選民最後未去投票的緣故！

個人認為，「黨外選民未投票」的看法，主要是依據幾次推測而來。第一，據觀察所得，每場黨外人士的政見發表會，必定是人山人海，少則五、六千人，多則數萬人，與國民黨籍候選人的聽眾人數相比較，簡直有天壤之別。可是，這些冒着十一月底寒風小雨（尤其是北部）的聽眾，最後投票日到那裡去了？第二，今年台灣島內的經濟情況，依舊如去年一樣糟，到處與人談起，使到處可聽到咒罵或批評國民黨的聲音，人們言論尺寸之開闊，有時直叫人吃驚。既然批評國民黨之聲不絕於耳，那麼這些選民的選票到那裡去了？第三，這次南有余陳月瑛、張博雅，北有方素敏為黨外製造氣氛，聲

勢不可謂不大。但就全島黨外得票總數看來，並未較往年增加，是由於今年參選的黨外人士較多，按理黨外獲票應比往年增加才對，所以這些按正比例應得的「自然增長票數」，又到那裡去了呢？

當然，上述的觀察結果皆可用「國民黨作票」一語予以解答。然而問題是，老K今年作票、買票真的比歷屆都厲害嗎？也許他人有不同的結論，但至少依筆者私下尋問所得，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一口咬定老K作票，因此導致這次黨外選舉的慘敗，那麼以下的討論皆屬多餘，而今後黨外人士唯有全面罷選途了。

假如事實並非如此，則黨外人士必須面對現實，虛心檢討這次選舉失敗的根源。

筆者認為，黨外選民未去投票的癥結，即在於他們對黨外人士表現的失望，這不單能用黨外候選人的言論尺度來作衡量。意即黨外候選人落選，至少就這次的選舉看來，不見得在於他們未更嚴厲地批評國民黨。事實上，幾位最激烈的批評者，如黃天福、雷渝齊、許國泰、楊祖珺等，並未獲得選民的熱烈支持。

黨外選民的失望，應種因於他們對黨外團體內部失和以及提不出吸引民衆的新主張兩點上。

黨外一年多以來的批康運動，已為支持者帶來一種嚴重的困擾，連帶對黨外運動產生一種「信心危機」。他們恐會推論說，如果連老康這種舐舐兄弟都會被國民黨收買，誰能担保後繼者不會步其後

塵？就在黨外群龍無首的情況下，他們原本熱烈、積極於向黨外運動認同的向心力，被冷卻了下來，終致認為投不投自己的一票都無關緊要，甚至不知該投給哪個黨外？島內選民這種對黨外運動的目的及方向所產生的懷疑，恐怕是阻礙他們前去投票的一次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黨外候選人這次除了提出「自決」問題的口號與討論外，幾乎仍在原地踏步，攻擊老K的言論還是前幾年的舊論調，批評層次還是侷限在政治一隅，台灣今年真正的重點（筆者認為也是國民黨的最大弱點）——經濟，則無人作有系統的分析與揭露。

「自決」問題的提出，不論如何，的確是今年選舉之中黨外的一項重大突破，只是黨外也因此付出重大的代價。

台灣「自決」看法的公開討論，當然有益於台灣人在未來政局的轉變中，對自己前途的如何進行思想準備，以免在島內、外重大事件發生時茫不知所措，任由執政者宰割。

然而，在少有政治危機感的情況之下，以及缺乏充分宣傳之前即便提出，並倚之為競選的重點口號，恐就失之匆促。台灣「自決」口號不論對台灣人或外省人來說，均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因為島內的民衆均有或多或少的「中國結」存在。寄望他

們在短短的一、二個禮拜立刻擺脫掉這種情結，以至能夠冷靜進行思考，最終向自決口號的內涵認同，這種心路歷程絕非大多數民衆所能「神速」趕上的。

此外，黨外人士平素少就台灣社會的經濟結構，進行有系統的觀察與分析，以至在批評國民黨高官與子弟等利用特權牟利，或者譴責國民黨籍候選人為大金牛，其立論與舉例皆十分零碎，無法向選民說明這種現象其實是根源於台灣畸型的經濟、社會、政治制度，而執政黨至今仍舊在維護種種不公平的制度。所以，如何剖析台灣政、經制度的運作以及國民黨與島內各大財團之間的錯綜關係，應是黨外人士今後研究、探討的重大課題之一，否則台灣民衆永遠弄不清大金牛的來源及其危害台灣政、經命脈的原因。

筆者着筆本文，用意在於拋磚引玉，希望大家一起來觀察島內選民會否對黨外的民主運動發生「異化」（政治冷漠感）的現象，以及共謀補救的對策。倘若黨外的失敗都以老K作票、買票的理由一言蔽之，則既然明知必輸，又何必競選？既要參選，又何必去埋怨那些自己心知肚明的道理？筆者僅希望，提出國民黨作票、賄選而導致黨外選舉失敗看法的人士，能多拿出本身的觀察所得，以帮助大家了解真相，其他的用意似乎並無必要。





速宇

台灣學生運動卅年

引言

越過台灣官修的歷史教科書，初讀台灣史的人難免會很訝異地發現——台灣先民們曾是如此定地、英勇地與日本殖民統治者抗鬥。從早期的武裝抗日、歷經中期的議會請願運動，到晚期的文化協會、農民運動，大批的知識份子、青年學生、不分男女，忘我的投入，辦報寫稿，街頭演講，下鄉入礦，組織工農，坐牢殺身，毫不退却。同樣的，翻開中國現代史，亦不難發現熱血滔滔的青年學生運動史。若無黃花崗等諸烈士的成仁，豈有民國的締造？若無五四青年救國運動，中國恐怕早已淪為列強的禁脔。三十年代的青年學生們憂時憂國，校園演講，街頭示威，不惜用血肉之軀對抗統治者的警棍、水龍和槍彈，回顧他們當年的豪情壯舉，再近觀我們當代青年們的所做所為，不禁汗顏不已。未入大學前，多數學生不問身外事，只知啃教科書。擠入大學窄門的幸運兒，有人成日泡在低靡的咖啡室，談存在主義，蒼白地呻吟失落；有人「哇噠」不離口，只知郊遊、舞會、泡馬子；再有人終日坐鎮K館，持續高四、高五的填鴨子生涯，目標放在出洋留學，光耀父母，失落的一代，新科學制度的犧牲品，這便是我們這一代的寫照。

七十年代初期，國際局勢逆轉，內憂外患啟發了保土愛國的保釣運動，消蝕於全盤西化聲中已久

的民族主義浪潮，再度飛揚澎湃。隨着「擁抱斯土斯民」的召喚，青年學生們踏出象牙塔的校園，認同、關懷台灣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甚而投入鄉土改造的洪流，七十年代後期的本土化運動（註一），以及青年從政的熱潮，新生代的民主運動，便是在這一個歷史背景下滋育、茁壯。斷層已久的學生運動，終於又在台灣銜接上了。

本文將嘗試討論三十年來台灣的學生運動，除了必要的歷史回顧外，焦點將放在直接或間接受釣的運動影響的各種事物，例如：台大發起的向社會進軍運動；高醫持續了十餘年的白達山地服務隊；淡江所帶動的「唱我們的歌」；各校投入黨外民主運動的新生代文宣活動，以及最近轟轟烈烈的台大代聯會普選事件。文中除了將概略地分由文化、社會、政治等三層面來描述各事件的發展外，並將試圖分析運動的興起與沒落的原因。並且將設法揭穿國民黨如何以高壓、利誘並進的手段，遏止學生運動的發展。對於那些渾渾噩噩數十年，仍未驚覺自覺自己的學生權，求真知權被剝奪殆盡的青年學生們，期望本文能有些許發聵振聵的效果。更期望青年學生們在「知」後，能「起而行」。用具體的行動來表示對社會、鄉土的熱愛、不僅要上承我們的父兄和三十年代學運的精神，更要注入我們這一個時代的詮釋，使學生運動發揮八〇年代的時性。

一、二二八事變

——抗日反極權運動的斷層

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事平息後，亞細亞孤兒似的台灣終於在1945年回了家，歸屬國民政府。緊接着爆發了國共內戰，台灣出產的豐富物質不斷地被收割至內陸充當戰爭物資，在台灣島內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在短短的一年半內，台北市的米價由一斤台幣兩毛錢猛漲至台幣四千元，經濟的疲弊導致社會的不安定，加以官僚腐化，並歧視台灣的居民，終於在一九四七年由一次檣竿事件引燃了二二八事變。先是「蕃薯」打「阿山」，隨後成團的國民黨軍隊開入台灣，大舉屠殺「蕃薯」。台灣人的精英多數慘遭殺害，碩果僅存的少數，不是逃往海外便是隱姓埋名，與廣大群眾斷了綫。加以國民黨蓄意掩飾真象，年輕一代的台灣人多不知父兄們早年的事跡，無法繼承他們反抗極權壓迫的精神遺產。

二、四六事件

——大陸學運的斷綫

由日人在1928年所創立的「台北帝國大學」，1945年11月由國民政府接收，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國共內戰後，大批流亡學生和自由主義學者湧入台大，由傅斯年掌校，繼承北大的遺風。台大，薈集了台灣本土及大陸流亡的知識份子，成為當時台灣的思想中心。二二八事變後，學生們更關心的政治、社會和鄉土，盼望實際的參與能推動改革。結果引起疑忌，國民黨當局在1949年4月逮捕上百名「叛亂」學生，隨後槍斃了一、二十名，此為「四六事件」。以後幾年，學生匪諜案層出不窮，在殺頭、坐牢的鎮壓下，早年大陸學生運動的餘波終於在台灣沈寂靜默。年輕的一代無緣再見幾萬人自發性地罷課示威的豪壯場面。

代替街頭群眾路線而起的是校園內知識份子啟蒙運動。這種溫和，訴諸文字的學生運動，主宰台灣校園二十年，直至保釣運動後才略有改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文化運動」和「自覺運動」。

三、新文化運動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美援恢復，台灣局面穩定，大量美元隨美軍湧入台灣，社會上充滿了燈紅酒綠，風氣逐漸糜爛頹廢。鑑於社會風氣不良，十八名台大學生（孟德聲、胡佛等）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狂歡日）聯合發表「再展開新文化運動宣言」。主張改造思想生活，以端正社會風氣，掀起革命高潮。他們以「台大思潮」為根據地，熱烈地討論了一年餘。可惜這運動只有立場和目標，却無具體內容，只議論為在文字上喊口號的運動，無法刺激整個社會。到了一九五五年，陳香梅在台灣舉辦奢靡的服裝表演，「台大思潮」撰文批評此舉為「隔江猶唱後庭花」。台大訓導處因此文趕至印刷廠搶奪稿件，「台大思潮」憤而宣佈停刊，以示抗議。新文化運動亦從此消聲匿跡。

四、五廿青年自覺運動

一九六〇年九月國民黨老牌黨員雷震被捕，「自由中國」雜誌被查封。一九六四年，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被迫離開台大校園。一九六七年，一群本省籍青年，包括林水泉（台北市議員），顏尹謨、黃華等，因籌組政黨被捕。一九六八年，楊蔚（筆名何索）因貪圖酬金而出賣友人，於是陳映真、丘延亮等人被送綠島。整個台灣社會陷入白色恐怖中，校園內則因西方存在主義的大其行道，青年們普遍虛無、冷漠、無思想。學生們所夢想的只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人人爭相出國鍍金，個人主義盛行一時。

一九六三年四月，留德學人俞叔平應台大融融社的邀請，主講「遊德觀感」。中央日報刊出演講全文，重點是反對當時台灣一窩蜂出國的崇洋風氣。同年五月，一位美國留華學生，狄仁華，投文中央日報，批評中國人徒有人情味却缺乏公德心。由於洋人的羞辱，民族自尊心催生了台大校園的「自覺運動」。一群台大學生在校園內張貼海報，呼籲「不要讓歷史批評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基本上，這是一個反對走入歧途的個人主義的道德運動

，很快地便獲得新聞界、政府機關，和其他學校的支持和響應。運動方興時，如火如荼。立刻救國團插手，運動方向竟走火入魔成中小學生停課到馬路邊澆花除草的公德的活動，真正的意義反而被忽略了。加以期末考、暑假接踵而至，自覺運動便因缺乏人力而鬆垮了。

自覺運動發起後，台大學生出了一份機關刊物——「新希望」雜誌。幾位負責人把缺乏公德心追溯成傳統文化與歷史的問題，並下結論——唯有讓科學、民主在中國生根，中國才能成爲一個上軌道的現代化國家。雖然「新希望」雜誌在一九六四年春被救國團函請台大當局取消發行，但雜誌的成員却分成兩個路線發展。在台灣，鄧維楨在一九六八年辦「大學雜誌」。在美國部份，張系國辦「大風季刊」，林孝信等人辦「科學月刊」、「兒童月刊」，從最根本，踏實地爲中國現代化做長期性的奠基工作。

七十年代，保釣運動興起後，當年自覺運動熱心成員在海外留學者大多捲入過洪流。釣魚台運動發展成左派運動或統一運動，持續了五、六年。其後部份成員在一九七九年又加入新成立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發行「民主台灣」雜誌。在台



六月十七日上午，二千餘名台大學生，在數百名治安人員監視下，整隊向美國大使館進發。

灣的鄧維楨、王曉波、高信疆、王拓等人則分別在出版界、文學界、新聞界、思想界，甚至民主運動陣營中從事各種進步改革事業。

「自覺運動」在當年雖然沒有什麼具體的作爲，但幾年來，昔日運動的核心份子，依舊辛勤地播耕思想的種子。比較起「再展開新文化運動」，「自覺運動」對後來學生運動的影響來得深遠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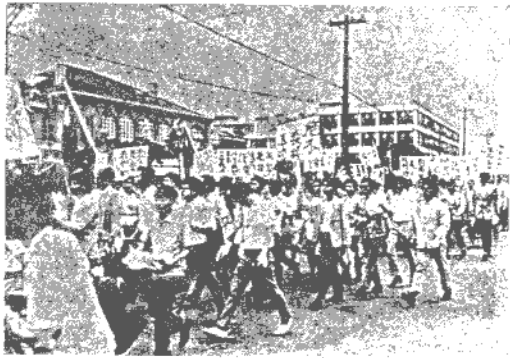
五、保釣運動

中共的外交在六〇年代末期有了新的突破。與中共建交的國家日益增多，相對地，台北政府的外交局勢便日形孤立。連國民黨素以仰賴的美國，在六〇年代末期也爲了適應新的國際局勢，並爲了解決越戰，而開始放鬆對中共的經濟禁運，並減少惡意宣傳。國際形勢的轉變敏感地表現在聯合國席位上。國府在聯合國的席位斯時已是岌岌可危了。

國民黨的應變之道，是加強爭取日本政府的支持。

也在六〇年代末期，世界性的石油危機陰影開始籠罩全球。特別是西方國家，經過了五、六十年代的高度成長與廉價石油時期，國防軍需，工業生產以及民間消費都已經轉型成高度石油依賴性。而西方國家石油的主要供應地——中東——却因幾次以——阿戰爭而變得太不可靠。科技的進步使大陸礁層的海底石油開採成爲可能。繼英國、北歐的發現北海油田之後，各地大陸礁層的石油前景便成了人們注目的焦點。依賴進口石油最厲害的日本自然最爲熱衷。中國大陸沿岸的大陸礁層便成了日本追尋的目標。無奈日本與這些大陸礁層之間隔了一條很深的琉球海溝，按照聯合國海洋公約的規定，日本無權開發這些海底石油。這就是日本覬覦釣魚台的來由。因爲釣魚台列嶼剛好在琉球海溝西邊，位於大陸礁層之上。日本如能佔領釣魚台，便享有開採附近海底石油的權利。

在美國的扶持下，加上韓戰、越戰兩次戰爭橫財，六〇年代末期日本已成爲高度資本主義國家，尋求工業原料來源及開拓國際市場也就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提高而日形迫切。就這樣，日本又一步步地走上帝國主義或軍國主義的道路。雖然它還不能像戰前地獨霸亞洲，但對於像台灣這種地方，而且



台大學生遊行隊伍，浩浩蕩蕩通過市區。

又一度是它的殖民地，日本政府的帝國主義嘴臉就表露無遺了。於是釣魚台列嶼就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往外擴張的第一步對象。

這自然激起飽受日本侵略或殖民統治的華人的憤慨。特別是在海外留學生，由於受了當時美國學生反戰運動以及世界性學生運動的影響，遂引發了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這個被人比喻為海外五四運動的釣運使一向是乖寶寶的中國學生覺醒過來。釣運在海外是個涉及面極廣，參與人數比例很高的海外學生運動，過程曲折複雜，歷時久遠，影響深刻。由於這不是本文範圍，在此表過不提。

六〇年代下半葉是世界性的學生運動高潮。從東京到巴黎，從莫斯科到雅加達，到處都有學生在示威遊行，在批判社會的保守、不義、在推動各種社會改革，探索社會進步的原理與方向。在這世界性浪潮中，台灣是少數的例外。整個六〇年代，台灣沒有學生示威遊行、沒有任何對社會提出改革的行動或言論、沒有跨出象牙塔一步。甚至連象牙塔也鉤不上，學生的時間力氣被耗費在郊遊、烤肉、舞會上、沉耽在瓊瑤與武俠世界裡、或消磨在「暑期戰鬥營」中。這種異乎尋常的平靜自然是國民黨高明統治的成就。國民黨統治者頗以此為自豪，他們曾宣傳說台灣是世界最安定的地方，以此召來外資——尤其是那些正受香港學運影響的港資。

然而世界潮流畢竟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浩浩蕩蕩，不可抗拒」。這股世界學生運動的浪潮雖然在國民黨當局巧妙地疏導與嚴加防範下，未能及時直接衝擊及台灣島內，但却間接地透過釣運，繞道北美洲慢了半拍地登陸台灣。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台大校園出現了第一張保釣海報。四月十三日，成大學生率先在校園內示威遊行。四月十四、十五日，台北市郊各校僑生聯合向日、美大使館抗

議。其後各校陸續展開各項保釣活動。六月十七日台大代聯會並發動一個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沉寂多年的台灣學生終於開始走出象牙塔了。

不難想像，直接的「保釣」運動在台灣很快平息下來。然而，這終就是二十多年來，台灣學生第一次自己集成隊伍，走出校園。其意義與日後影響不能只以短暫的「保釣」壽命來衡量。二十多年來，台灣的大學生在升學主義的風氣下，成了台灣社會的天之驕子，也被驅使着繼續往上爬——出國、高考、等等——的「社會使命」。他們生活的經驗就是考試，補習、升學，而與台灣社會多數人的生活現實脫節；他們未來的道路是單淺而相光明的。這樣的被社會寵愛着、這樣狹窄的生活體驗、以及這樣無憂無慮的「光明」前途，使台灣學生在主觀上成了不必思考、不必關懷社會、不必關心人間疾苦、也不必對人生前途有多少雄心壯志的乖乖牌。而今，從釣運之後，學生開始「不乖」了。

果然，從釣運之後，台灣的大學生開始思考了。他們覺悟到，學生也有自己獨立的人格與權利，不應隨意被剝奪，於是繼釣運之後台大學生開始爭取自治權，刊物的審稿權，以及代聯會主席的普選權；他們也開始認識到，學生也是社會的一份子，而且還是被供養的一份子，不應長年呆在象牙塔中，而應當去關心社會，反哺社會，於是有「山地、醫療服務」，有「百萬小時奉獻」等等；他們更體認到學生應關心國家前途，祛除「政治是骯髒的」，開始參與討論「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等等；他們有些人更深一層地認識到窮人的困苦，社會的不正義，以及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侵略，於是在思想上展開對現存社會的反省與批評，在文學上支持鄉土文學而唾棄西化派的現代主義文學，等等。

所有這些活動，都緊接在釣運之後次第展開。固然，當時台灣局勢，由於外交上日益孤立，內政上因蔣經國準備接位，加上經濟上急速工業化，帶來社會重大變遷。這些局勢的變化為上述各種學生活動提供了客觀條件。然而釣運的衝擊，却是學生覺醒的第一步，為日後各種運動提供了主觀條件。

下文我們將詳細介紹各次運動。

註一：曉山，“民主台灣”第二十四期。

自由中國

「祝壽專號」風波

陳津生

一九五六年十月卅一日，「自由中國」雜誌出版「祝壽專號」，迅即被搶購一空，這一期再做重印，達十一次之多。這在台灣出版史上，不僅是空前，也是絕後的。

每逢蔣介石生日，他的部屬們便傾力發動軍公教各界張燈結彩以表祝賀，街頭巷尾張貼着「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的標語。這一年，蔣介石心血來潮，忽然「下詔建言」，函知各機關：「盼海內外同胞，直率抒陳所知，俾政府洞察輿情，集納衆議，虛心研討。」雷震乃籌組「祝壽專號」，以諍言代祝頌之意。

「祝壽專號」發表了一篇社論，提出當時「最使人憂慮」的三個問題：第一是繼任人的問題，論及「領袖之產生，毫無制度，毫無成規，就可能引起比君主時代更大的混亂。」第二是責任內閣制的問題。主張依憲法定，中央政制應以行政院為中心。第三是軍隊國家化的問題，指出不能「僅憑個人的威望來統率三軍」；「軍隊祇是效忠於國家，受人民所選擇的政府之節制，不受個人的影響，亦不受黨派的影響」因而像軍中遍懸「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的標語，應予矯正。這些原本是民主政治裏的常識，但在當時國民黨權力結構中，却成為十分敏感的問題。

國府（國民黨政府）歷經大逃亡的慘局，痛定思痛，檢討前失，蔣介石本人所得的結論是：「戡戰」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大家不聽他的話。因而如何「鞏固領導中心」，乃成為國民黨黨方的主要課題。具體的措施，表現在：（一）推行黨政軍一元化：首先將何應欽、白崇禧以下的一級將領，一一解除兵權，並以輪調制將大批將領搬到虛位上去。接着成立「退休制」，冠以「國策顧問」的虛銜，紛紛移入「人事倉庫」裏。有的則在「任期制」解除實權之後，竟以「蓄謀叛亂」罪名幽禁起來（如陸軍

總司令孫立人的遭遇）；亦有的則虛構「粉紅色間諜」罪嫌「調虎離山」（如空軍總司令「老虎將軍」王叔銘的下場）。黨和軍同時進行整肅，在大陸時期，所謂「蔣家天下，陳家黨」，C.C.（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代號）所經營的黨，來台後旋即被「改造」①陳果夫隱居台中養病，陳立夫被逐往紐約近郊養雞，②蔣介石組織「國民黨改造委員會」，該會通過一項總裁的交議案：「國民黨在持有武力的軍隊、憲兵、警察、軍隊政治部和特務機構內，秘密的設立國民黨黨部。」③軍中除遍設特種黨部之外，後來又增設政工制度④。由是，蔣氏一方面將黨特務化以治軍，同時又加強特務組織以控制黨政軍。（二）進行「效忠領袖」政治教育工作：蔣介石一到台灣，便在台北近郊的草山⑤設置「革命實踐研究院」，挑選高層幹部進行「思想訓練」，蔣氏自任為院長，調訓的文武百官則為學員，由是「作之君」又「作之師」，在行政系統的上下隸屬關係之外，又都納入了封建式的師生關係裏⑥。在這層關係上，「忠貞」思想被「文化復興」到學員們的腦中。

在領導一元化及效忠領袖的運作中，蔣介石同時又推展「親親」政治。由於以往眾叛親離的陰影，致使蔣氏的猜忌心理增長到人人可疑，唯有信託自己兒子蔣經國的地步。一九四九年七月間，國府遷台，蔣氏首要的工作便在高雄召集各特務機關負責人，秘密成立定名為「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核心組織，指定蔣經國、唐縱、鄭介民、毛人鳳、彭孟緝等為委員，唐縱為召集人⑦。不久唐縱被調開去黨部做第六組主任，「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實權便交到蔣經國手上。該會由蔣經國控制後，改名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在編制上是「總統府」裏的一個秘密機構⑧，後來才改組為公開的最高情報機關：「國家安全局」。無論什麼名稱，「最高

安全會報」，都由蔣經國主持，這就是外國輿情之所以稱他為「中國貝利亞」的原因。

由是，蔣氏父子的權力運作，便與以「自由中國」雜誌為代表的雷震等民主派人士，在觀念上產生了基本的衝突。民主派人士指出過去在大陸的慘局，固由於權勢人物的貪污無能以致民不聊生，而個人獨裁及迷信特務控制亦為積怨於民的根本原因。因此認為當局應痛改前非，厲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然而雷震等人在「祝壽專號」社論上的主張，被蔣氏父子認為在「散播毒素思想」。而有關繼承人選或責任內閣制的推議，更被蔣經國敏感地視為支持他政敵陳誠的訊息。

「祝壽專號」發行不久，蔣經國主持的總政治部便以「周國光」的代號發出了一項印有「極機密」字樣的「特種指示」文件^⑨。該文件抨擊「自由中國」雜誌的言論：「與過去在大陸上共匪民盟，在根本上並無不同」，因而下令所屬各單位，「有計劃的作口頭宣傳，耳語運動，使此一刊物及其同路刊物，在人們的心理上，產生一種極惡劣的印象。」

「周國光」（蔣經國做總政治部主任的代名）的「特種指示」下達後，又散發了一個小冊子：「向毒素思想總攻擊」^⑩。在這長達兩萬多字的秘件裏，對於「自由中國」雜誌所提出的實行「軍隊國家化」和廢除「主義、領袖」標語兩項，大肆攻擊。關於後者，被指為「除了甘心投降共匪偽政權的而外，任何人皆不能懷疑」。關於前者，則強烈抨擊「取消軍隊國民黨黨部」的抗議；認為「黨與國兩者是不可分的」，「反對軍隊設立黨部」就是「跟着共匪和他的尾巴來唱舊調」。該冊子反覆指責「『軍隊國家化』的口號，這個口號不知陶醉多少人。其實這是共匪瓦解國軍的政策之實施。」然而，他們忘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蔣介石自己就曾在國民大會發表聲明說過這樣的話：「必須使任何政黨皆不能擁有軍隊。」他還宣稱要「達成『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目標」！

「自由中國」的「祝壽專號」，除了撰寫社論之外，還發表了胡適、徐復觀、徐道鄰、陶百川、劉博崑等十五位作者的文章，而「向毒素思想總攻

擊」的小冊子，却特地挑出胡適和徐復觀兩人的文章加以批判。胡適發表「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一文，以美國艾森豪當年做校長和當總統時的故事，說明他能委信下屬分權處理事務，並以呂氏春秋所說：「無智、無能、無為」勉勵蔣氏「做一個無智而能『御衆智』，無能無為而能『乘衆勢』的元首。」徐復觀發表「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則指出蔣氏權力太大太久，以致「常常妨礙他與客觀事物作平等的接觸」，而且「常要求客觀的東西從屬於自己」。並批評：「蔣公受言訥諫的藝術的拙劣，遂使一般作官人發生一種變態心理」。徐文對蔣氏所做的政治心理分析，確是觸到蔣氏的痛處，而胡適勉以「三無」的政治作風，亦與當時神化「領袖中心論」相違。但胡、徐兩位的文章之所以被視為「批評總裁個人，陰謀毒辣！」甚至被疑為「其幕後是否有匪諜指使亦難揣測」，則恐另有原因。對徐復觀是有宿怨，特別是在這三年前（一九五二年十月間）徐復觀在「自由中國」發表了一篇批評救國團的文章，導致蔣經國的刻恨。胡適則與陳誠靠近，因而他所說的「我們憲法裏的總統制本來是一種沒有行政實權的總統制」一番話，便被指為「其中含有極大的政治陰謀」。反之，在當時最引起轟動的「清議與干戈」一文，雖然「最高當局為之震怒，發動圍剿，蔣經國的政工部門所散發的小冊子，則隻字未提。

「祝壽專號」所發表的十五篇文章，在當時最引為話題而激怒當局的，乃是署名劉博崑寫的「清議與干戈」。該文託古諷今，把老蔣比擬為慈禧太后。國民黨當局慌忙派員到各書攤整批收購加以焚燬，「自由中國」社則連夜再版趕印，而國民黨發動各報進行圍剿，則無異替「祝壽專號」大做免費廣告，由是更激起讀者搶購之風。

這期間，「中華日報」社長曹聖芬發表「我的看法與作法」，並用老兵筆名發表「蛇口裏的玫瑰」，指責「清議與干戈」一文：「敘述拉那氏攬權自恣四十年，對外失敗，乃下詔罪己，又無誠意，終致亡國。」因而以為這篇文字「是對總統號召國人批評其個人的一種影射」，曹氏並認定「作者的惡毒尚不止此，他暗示着這種誹謗一遭取締，便將

引起干戈，這簡直在鼓吹內亂！」但這位侍從室出身的曹社長，並沒有要求循法律的途徑處理，竟以美國費城晨報被群眾搗毀而深獲佛蘭克林讚揚為例，鼓動「群眾」使用暴力去打砸「自由中國」社（曹氏因此而有功，不久被提昇為「中央日報」社長。）

曾經表示「虛心納言」的蔣介石，看到了「祝壽專號」上的文章，當他翻閱到「清議與干戈」將自己比附為慈禧太后時，勃然大怒，摔雜誌，拍桌子，口中瀰瀰出惡言。

然而無論蔣介石的震怒、蔣經國的「特種指示」、或曹聖芬的鼓動暴力，都未能產生阻嚇言論的作用。相反的，「自由中國」的言論却深深激起讀者的共鳴。因着「祝壽專號」的大膽評論，反對派的聲音首次響亮地出現在台灣的發言台上。

直到今日，每當人們談到「自由中國」的時候，便會提起「祝壽專號」；每當人們提起「祝壽專號」的時候，便會想起它將老將比擬為慈禧太后的事件來。這裏，我們選出「清議與干戈」一文，以饗讀者。

註譯：

①關於「改造委員會」的成立，一九五〇年七月、八月間，蔣介石宣佈成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雷震說了這樣的話：「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來台後，另起爐灶，組織所謂『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用以扶植兒子繼承大業，竟把過去，由全體黨員選舉出來的第六屆全體中央執監委員一筆勾銷，為他挨罵受辱多年的C.C.首領陳立夫則驅至海外。」見「雷震回憶錄」，第20頁。

②「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於一九五〇年八月五日正式成立，陳立夫就在那時間被逐往美國。蔣介石撥給了一筆生活費，但拒不接見。陳立夫託宋美齡說情，希望藉辭行機會得見一面，仍為蔣所堅拒，陳立夫帶了兩萬美金，灑淚台北機場，黯然離境。C.C.派勢力，被拉攏的被拉攏（如立法委員吳延環之投靠小蔣），受排擠的受排擠（如立法院「革新俱樂部」首領齊世英被蔣介石在陽明山紀念週會上親自宣佈開除黨籍），旋即瓦解。原屬C.C.指揮的特務系統——「中統」，由蔣經國加以整頓，不易指使的，如調查局偵緝處處長蔣海鎔、情報處處長范子文等，均以「匪諜」名義下獄。十餘年後，C.C.派已成歷史陳跡，才讓陳立夫回台灣講「四書道貫」。

③引自「雷震回憶錄」，第19頁。

④詳情可參閱江南著「蔣經國傳」，加州「論壇報」出版。

⑤蔣介石一到台灣，便看中了悶熱的台北盆地近郊的避暑勝地「草山」，於是佔據下來，蓋別墅

，設立「革命實踐研究院」。蔣氏認為「草山」有「落草為寇」之意，所以改名為「陽明山」。

⑥草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後改名為「國防研究院」）成立之初，被挑選去受訓的，文官為部長級，武官為將官級。結業的學員，紛紛調任為要職，因此不少人活動到山上「洗溫泉」，以為進身之階。蔣介石死後，蔣經國接任院長，一共招了三班，留過美的「青年才俊」（以權貴後裔為主），多入選為「建國班」學員。蔣經國的第二個兒子蔣孝武，在第三屆（最後一屆）被招入為學員。經過這層師生關係的「革命洗禮」之後，這些洋系的「青年才俊」，不僅納入到蔣經國的新梯子裏，而且不少人以「同學」之誼，成為蔣孝武的左右手。

⑦見孫家麒：「蔣經國竊國內幕」，香港自力出版社出版。按：孫家麒歷任國民黨核心組織秘書工作，「政治行動委員會」一成立，孫氏便擔任秘書職務，四年後調任中央黨部第六組秘書，五年後調到香港負責「聯戰」工作。孫氏參與特務、黨務機要，達十餘年之久。六十年代孫氏在香港先後發表「我為什麼脫離台灣國民黨」，「我所認識的蔣經國」等書。

⑧孫家麒對「政治行動委員會」及「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內情，有詳盡的透露。參看「蔣經國竊國內幕」，第20頁至26頁。

⑨「特種指示」文件，附錄在雷震「雷震回憶錄」，第109頁。

⑩「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小冊子，附錄在「雷震回憶錄」第112頁至145頁

我們深感有選編三十多年來有關台灣民間重要言論文獻的必要。透過這些言論，不僅可以使我們對於被官方蔽蒙扭曲的實情，有另一面的了解，也可使我們從先行者們艱苦奮鬥的經驗中獲得激勵的力量。這裏，我們將一系列地選刊具有代表性或影響力的言論，每篇言論將作簡略的背景分析，並評介它的時代意義。同時，我們歡迎讀者推薦值得選刊的文章。

清議與干戈

劉博崑

—轉載自「自由中國」1956年10月—

「清議亡而干戈興矣」，這雖然是一句老話，但却很精確的說明了輿論治亂的關係。治亂興衰，在中國歷史上本來有極豐富的經驗或教訓，可惜的是，了解歷史的人，不一定有力量影響歷史，而足以影響歷史的人，又太缺少足夠的知識從歷史上記取教訓。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遷極大，而進步却極慢。古老的君權觀念，與近代的民主思想在這長期的演變中，不斷的互相衝擊。所謂清議云云，本來是君權下無權無勇的文人議論朝政的美名，實際與民主政治下的輿論在本質上有極大的區分。但是在近代中國的政治演變中，就是中國傳統君權下的所謂清議，也完全喪失了牠本來就十分微弱的作用。

十九世紀下半期的滿清政權，經太平天國的襲擊，本來是搖搖欲墜，但經曾左的奮起，清廷的壽命又得以延長。如果當政的人以國家人民為重，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國還足以有為，滿清的政權也不至於那樣快的崩潰。同治就位時，意大利才開始成立國會，太平天國滅亡，是同治三年，當時的美國還正在南北戰爭中。日本德川幕府歸政明治天皇是同治七年，而法國第三共和國於光緒元年才得成立。所以同治以後的內外局勢不是不足以有為，而滿清之所以不免覆亡，並禍延全體中國人民的，完全是由於當政者的無知及其家天下的君權思想在作祟。戊戌政變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沒有牠的地位，但是知識份子以國士自許而與專制政體相抗爭，以求國家生機之延續，這在歷史上有其永久不可磨滅的莊嚴意義。那拉氏的淫威足以撲滅康梁等的維新運動而有餘，她在躊躇滿志之後居然鬼迷心竅，煽惑起拳匪的排外運動，而許景澄袁昶因反對這種荒謬的舉動竟而被殺。後代讀史的人，甚至於懷疑那

拉氏是否是瘋狂或喪失理性，但是一切暴君這類引火自焚的愚蠢行動，完全是由於迷戀權位醉心專制，所以才有這種倒行逆施的行徑。最後京師淪陷，聯軍壓境，那拉氏挾光緒流亡西安，而於庚子七月廿六日居然發出如下的所謂上諭：

「我朝以忠厚開基，二百數十年，厚澤深仁，淪浹宇內。……不謂近日聳起團教不和，變生倉猝，竟致震驚九廟，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罪實甚。然禍亂之萌，匪伊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體國之忱，無泄沓偷安之習，何至一旦敗壞若此。爾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俱在，試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許忠義者安在，今日國家岌危若此，其將何以為心乎？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塗炭，朕尚何所施其責備耶？……要之國家設官，各有職守，不論大小京外文武，咸宜上念祖宗養士之恩，深維王屏臣死之義，臥薪嘗膽，勿託空言，……滌慮洗心，匡予不逮。朕雖不德，庶幾不逮而復，天心之悔禍可期矣。……」這是一篇典型的中國帝王的官樣文章，開首是官冕堂皇的假話，繼而是不敢面對現實，避重就輕的陳腔濫調，薄責自己，痛罵臣工，畫符念咒，以期天心回轉。但是他却永不忘記炫耀他的君權，而把希望寄託於神權。

瓦德西雄踞中南海，終生「一意做官」、而生命已近黃昏的李鴻章已無從發展他的「洋務」經綸，城下之盟的屈辱已經無可避免，於是那拉氏情急了，於庚子十二月初十日，又以光緒帝的口氣發出如下的上諭：

「……自播遷以來，皇太后宵旰焦勞，朕尤痛自刻責，深念近數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致成此大變。現在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

實整頓，以期漸圖富強，懿訓以爲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着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併，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倘再陷日循敷衍之故轍，空言塞責，省事偷安，憲典俱存，朕不能宥。……」

那拉氏雖然又極力炫耀她的威風，但是環境左右的都是俯首貼耳的順臣，不僅像康有爲、梁啟超這類的讀書人沒有了，就是戊戌政變時曾經告密一度被視爲親信的袁昶也因為犯顏直諫，反對拳匪而被殺，還有誰敢再說話呢？何況那些信得過的大小臣工們，只有聽主上吩咐的美德，那有自己說話的份兒。皇上本來責成他們的只要聽話，而今忽然又要他們說話。這種突變的情況，實在難以適應。這正如今日在大陸的可憐文人，對於沒有講話的自由，本來早已心領，而對於沒有不講話的自由，委實感覺惶惑。但是那拉氏仍不肯放鬆這般吃皇糧的人們，於是庚子十二月廿六日又是一道上諭：

「……近二十年來，每有一次弊端，必申一番語誠，臥薪嘗膽，徒託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以後，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飾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夫無事且難支持，今又遭此奇變，益貧益弱，不待智者可知。……」

一旦顛危至此，仰思宗廟之震驚，北望京師之殘毀，士大夫之流離者數千家，兵民之死傷者數十萬，自責不暇，何忍責人，所以諄諄誥諭者，則以振作之與因循，爲興衰所由判，切實之與敷衍，即強弱所由分。固邦交，保疆土，舉賢才，開言路，已屢次剴切申論。中外各大臣其各稟遭訓誥，激發忠忱，深念殷憂啟聖之言，勿忘盡瘁鞠躬之誼，朕與皇太后有厚望焉。」

這道所謂上諭，讀來固然音調鏗鏘，但仍不外是「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老調。可是那拉氏忘記了，是她自己專政四十年的結果，所以才造成當時這種奄奄一息的政治局勢。她個人的權勢慾是充分發揮了，所謂清議早已滅絕，而滿清帝國也不旋踵而隨同毀滅。歷史就是這樣因果不爽，而極端無情不斷的在演變。

司馬光奉命所編著的歷史，宋神宗命名爲資治通鑑，足見神宗是頗想從歷史上獲取教訓。可是司馬光雖是書生，而對於實際政治，因目擊身受更有深切的了解。他知道皇帝是最難教導的，所以書成之後，於進資治通鑑表中，近乎苦肉計的這樣苦口婆心的說：

「臣今骸骨癯瘠，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宴，時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神宗曾否認真的讀過資治通鑑，史無明文，讀後究竟有無心得，更難確切考證。宋代以後，識字無多的人而君臨天下者仍大有人在，如那拉氏就是這種人。她大概是讀不懂通鑑，也不會想去讀。就是讀過通鑑，而仍然不願與情專制自娛的，那也只是未曾讀。司馬光在通鑑裏關於盛衰興亡有許多精闢的議論，對於清議與治亂的關係也有一段極精采的論斷。這一段話，專制時代的皇帝如果不想亡國，需要細讀，就是現代的主政者如果心在國家，也值得平心靜氣的一讀。話是太消極了一點，可是如果能從正面設想，那就不能說是消極，而應該認爲是一種極有價值的教訓，所以值得引來結束本文：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危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

稻米生產過剩危機

談稻米過剩危機

台灣一方面進口極大量的糧食，成了「糧食進口大國」，另一方面却有過剩的稻米，吃不完又賣不出去，堆得倉庫都裝不下。這個矛盾的現象，是怎麼產生的？該怎麼解決？

台灣風稱「寶島」，優厚的天然條件使她在歷史上一直是自給有餘的糧食出口地區。隨着科技的進展，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也不斷提高。日本、西歐各國近年來並不因人口增殖而增加進口糧食比率，甚至有的還有能力外銷。只有台灣是個大例外，從自給有餘變成「糧食進口大國」。

任覺民先生在兩年前即已重視這個問題。除了揭發以每年增加率百分之六十三來加速進口糧食此一令人吃驚的事實以外，他詳細地剖析各種似是而非的藉口，而以細緻地歷史追蹤與搜尋對方的文獻，查證出真正的原因是來自美國、來自美國的四八〇公法、來自美國資本主義要尋找其生產過剩的市場。這個研究發表在一九八二年大地生活（今已停刊）的元月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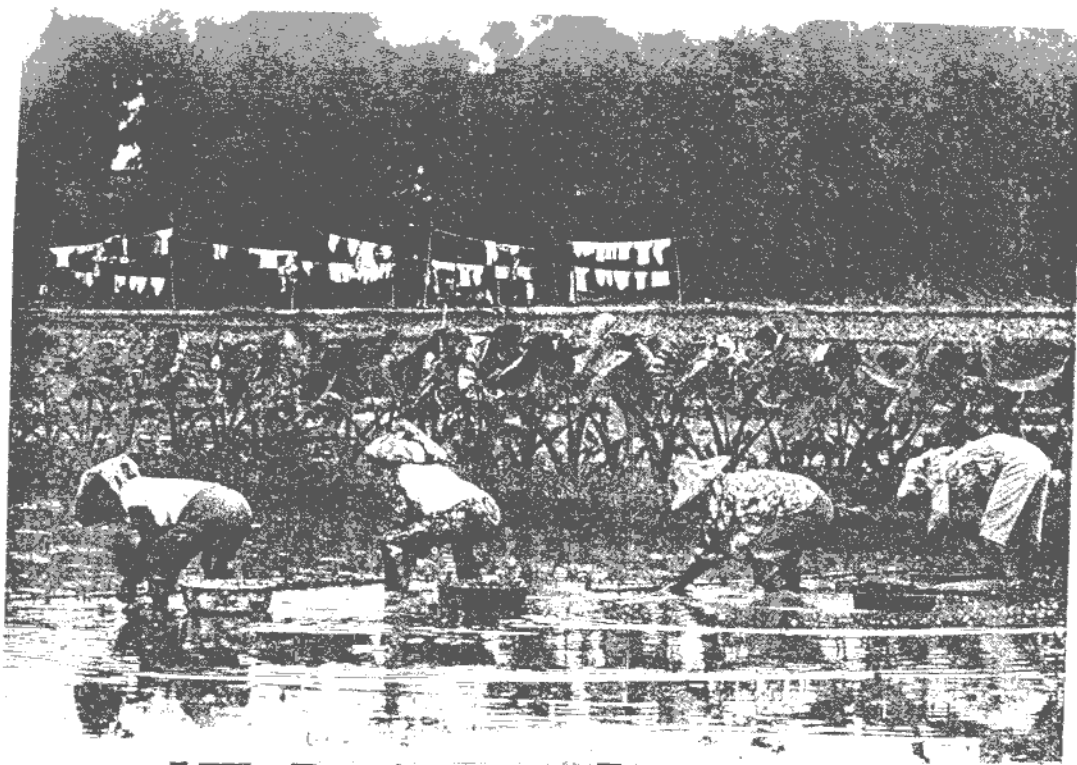
那篇文章同時揭露出，資本主義者為了擴大市場，如何地宣傳鼓吹以改變人們的飲食習慣，刺激人們從未有的慾望。從這裡我們領略了資本主義力量的龐大，不僅可以改變你的文化習慣，還可以改變你的慾望，創造你的要求？試想，這樣的威力如果應用到政治層面來，將會造成多麼鉅大的「民意」扭曲？

兩年後，台灣的糧食對外依賴性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變本加厲；而同時，卻又發生了稻米過剩的危機。一則美聯社新聞讓任先生覺得需要再出來吶喊。他喊出事實的嚴重性，指出了原因，更提出了解決之道。這就是本文從理論上來看，大量輸入而又生產過剩這類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是必然的結果。類似的矛盾，例如在經濟衰退時過多商品賣不出去壞掉而同時需要該商品的人又無力購買等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相當多的。這主要因為資本家並不為人民的「需要」而生產，而是為有能力購買者而生產，儘管有能力購買者並不「需要」該商品。這是「需求」（DEMAND）與「需要」（NEED）的差別所致。

麵食在台灣的原來「需要」量並不大，但美國為了尋找其過剩糧食的市場，便在台灣製造了大量的「需求」。美國達到了目的，而生產稻米的台灣農民就遭殃了。

遭殃的不僅農民。長期下來，將使台灣的經濟逐步變成依賴性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這是目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遭遇到的共同問題。台灣的生活水平雖比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為高，但基本生產關係並無二致。依賴性經濟隱憂很多，本文提到的國防考慮只是其中一端。

——編者識



糧食進口大國的

任貴民

稻米生產過剩危機

美國米高控訴台灣津貼稻米出口

美聯社華盛頓九月卅日電稱：

美國米商又投訴
控台灣津貼出口
售價低於收購及市價

美國碾米商協會副主席斯帝夫·蓋伯特再次向聯邦政府貿易總代表威廉·布勞克投訴稱：台灣省糧食局以人為高價向稻農收購米價，轉手以低於世界的價格在國際市場出售。這一做法使得其他供應商深受壓抑。這一投訴是該協會舊事重提。該協會在七月份曾向美國貿易代表署提出上述指控。

布勞克已答應對此進行調查，如確有不公平貿易行為，他可以向總統建議採取報復行動。

近年來台灣的稻米生產過剩，確實給台灣當局帶來許多困擾。雖然多次作政策性的計劃減產，自年產量二百七十餘萬噸，而二百三十萬噸，而至今

年的二百十五萬噸，但仍然無法消化多年的過滿倉儲。安全儲備稻米每年都超過一百萬公噸上下。

台灣目前稻米的消費量僅為二百一十九萬公噸。農發會對未來十年進行的預測研究報告稱，一九九一年時人口將增至二千一百九十萬人，而稻米的總需要量將仍為目前的二百一十九萬公噸。這看來是個明顯的奇怪現象，但是農發會的專家的預測並沒有大錯，而是多年來自外國（美國為主）進口糧食的結果，我們的同胞已越來越對本國傳統的大米銷量減低，改吃麵食，並增加消費玉米雜糧飼出來的肉類，美國蘋果，「香桔士」，加州葡萄乾與澳洲牛肉……。所以即使人口不停地增加，稻米的消費量却反而減低。

台灣自己生產的農產品銷售遲滯，加上努力發展出口導向的工業，農村勞動力外流，工資上漲，能源、肥料、農藥上漲等等因素，已使得台灣農村到了崩潰的地步，政府不得不給予補助。雖然補助得很少，（每公頃產量五千～八千公斤，已「高價」收購九百七十公斤，而所謂「高價」也只不過較市價高出每公斤二元左右而已，這與日本政府以國

際市價六倍價格全部收購的政策，簡直不能相比）也得每年動用六十億台幣，加上儲備、管理、人事等等都得用上巨款。

倉滿有餘，當然要設法銷掉，但是台灣已多年沒有外銷過稻米了，國際市場幾乎全是美國大糧商的天下。即使比照國際價格，台灣每出口一公噸得賠上三百多元美金，只夠成本的一本。出口只不過是不得已的緊急措施而已。台灣感到壓迫的餘糧，也只不過幾十萬公噸，在國際市場上根本不起作用的。較明顯的只是去年孫運璿訪問印尼時，爲了「疏散」對阿拉伯的石油「集中」性的依賴，以及發展政治性的實質外交，當時蘇哈托正因印尼的糧食危機受着選舉上的挫折，台灣當局就趁機作人情，半送半賣的運去了十五萬噸稻米而已。然而這就造成了美國大米商控訴台灣「高價收購」、「津貼出口」的理由。

犧牲農業支援外交的報應惡果

國府這類啞吧吃黃蓮的苦衷，已不是第一次顯示了。還記得兩年前美台穀物五年協定的續約，一切程序完成，只剩下簽字一項，美方突然爲了台灣不能使用「中華民國」的正式國號而攔下。使得台灣官方爲之氣結。

相反地，廿多年來台灣爲了依靠美國，長期的在犧牲着自己的農業，在維持貿易平衡的理由下，帮着美國解救其「生產過剩的糧食出口政策。每次來美的採購團代表以及政府的官員都公開宣揚着是「爲了美國的利益」，自美國進口大量的小麥、黃豆及雜糧（每年約五百多萬公噸），甚至大量的蘋果、柑桔、小紅莓、葡萄乾等等。却任由自己自然條件最優厚的，生產力量活躍的，對社會最具穩定作用的農業，一天天的敗落下來；台灣的香蕉成堆地爛掉，成噸的芒果倒入河裡，今年鳳梨也被逼得毀去，大力開發出的梨山果園也因競爭不過外來品，而將果樹連根拔起……。然而這一切犧牲了自己永久性實質生存的代價，不但沒有換來國府外交上多少暫時的利益，反而節節敗退，反而常常換來羞辱，反而招來更多的外侮與侵害。（譬如由泰國以「外交人情」進口的玉米，高價劣質，事後又拒絕對我們賠償。）這是小國勉強要世界級外交的悲哀。

自信喪失與美國糧食出口政策的錯誤配合

大多數人可能還不明白台灣農村崩潰的根源，主要是在於台灣自信的喪失與美國長期糧食出口政策的錯誤結合上。「自信」包括政府在國防外交上的自信與國民對本國文化上的自信。包括許多政府的決策人員也不一定對此本國重大的農業危機會有足夠的全面發展上的認識。以至於找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或表相。爲過去錯誤政策推御責任，爲推行目前一些治標的而可能造成更大錯誤的新政策而鋪陳。這一切更造成我們外交上的懦弱，經濟上的不合理發展等等。

對於我們是怎樣變成「糧食進口的大國」？有很多常聽到的似是而非的說法，譬如：

很多人以爲台灣之所以要進口這麼多糧食，是因爲我們地小人多而糧少不足。但事實上，十幾年前台灣還有充裕的糧食可以出口，所進口的只不過是些許黃豆。人口的增加率每年只不過在百分之二上下，而進口糧食每年却是成比例的以百分之六十三的比率激增。

台灣的人口由一九六六年的一千三百萬到去年的一千八百萬，總共增加了百分之卅八·五，而自美國進口的糧食，十五年間却增加了百分之一千！

台灣的人口由1966年的一千三百萬到去年的一千八百萬，總共增加了百分之卅八點五；而自美國進口的糧食，十五年間却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人口的增加率每年只不過在百分之二上下，而進口糧食每年却是成比例的以百分之六十三的比率激增。

這可以說明人口的因素並非主因。連年進口糧食激增的反常現象應另有原因。

農業沒落不一定是工業發達的必然結果

有很多人，包括政府許多負責經濟決策的官員

，稱我們農業的衰退是因為工業發達導致農工人口變遷的必然結果。又認為農業利潤的偏低是因為農業人口還嫌過多之故，如能把當前百分之三十餘的農業人口減少到像美國的百分之三以下，並且以機械操作，則每個農人所分獲的利潤自然就會升高。這種作法也許能使單位勞力（單位農民）的利潤提高，但是投資成本提高，利潤並不一定增加，而單位面積的產量反而降低，並且可能帶來大批的失業、社會不安，及農村趨向解體。

事實上這是本來不分，把「結果」當作「原因」來看。只會看美國現成樣本的表相，而根本不了解我們自己的國情、不了解農業的本質。

農業利潤過低最主要的原因是農產品價格受到約束，不能自由的與工業產品競爭，不能與進口的糧食競爭之故。台灣的農業生產成本已經夠高了，昂貴的農機化肥、農藥、勞工以及燃料費用每年都在上漲，再加上土地重劃費用等等，豈不是更增加成本的負荷？美國的大型農業是過去廉價石油時代的產物，在油價每年倍漲的今日，已經暴露出很多缺點，一九八〇年美國農業報告，提出很多警告

美國的大型農業是過去廉價石油時代的產物，在油價倍漲的今日，已經暴露出很多缺點。一九八〇年美國農業部的「有機農業報告」針對大型農業也提出很多警告，並建議作根本的改革。

，並建議應即刻考慮作根本的改革。當此別人正要棄捨的時候，台灣却要沾沾自喜的學樣。

日本的工業不但比台灣發達，在很多重要方面已經超過了美、德諸國，然而他們每戶農家平均土地所有的大小，農業人口及勞動力等等仍然同一百年前明治維新時代情況差不多，農業並沒有像台灣一樣因工業發達而遭到打擊。每戶僅擁有一、一公頃的田地，同台灣也差不多（台灣平均每戶約一公頃），他們並沒有大力推行「土地重劃」。日本每年出口大量的農機到東南亞各國，而他們自己大部份農地上的操作並不以機械力為主。

然而像這樣一個高度工業化，高度人口密度的國家，他們的糧食自給率竟可達百分之七十三。即

使如此他們仍然經常警告自己，認為太低了，政府及民間都在計劃的用很多辦法，努力希望能更加提高自足率。主要的辦法無它，政府以高價補貼本國農產品生產，盡可能地抵制外國糧食，牛肉、乳品、果蔬進口。政府以五~六倍國際米價，收購全部稻米，平均每公噸稻米，日本政府要津貼一八三美元給農民，另外再花七十七美元在倉儲費上。這與台灣政府過去以每公噸約貼廿五美元，且僅收購五分之一的產量相較，可真有天壤之別了。也難怪台灣的糧食開始長期性的減產。

台灣的糧食自給率是工業國家中最低的一個

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兩年前只有百分之六十強。照這兩年來進口糧食數量來算，現在大概在百分之六十以下。如果除去飼料，蕃薯等，僅考慮所謂基本熱量的話，現在大概已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了。如果再講那是因為工業發達才使糧食自給率低降的話，則如此低落的糧食自給率，是在先進工業國家中所找不到的。譬如美國是百分之一百廿，法國是百分之一百十四；瑞典，百分之一〇九；歐洲共同市場在一九八一年時，穀物出口了二〇〇〇萬噸，超出進口量（一七〇〇萬噸）三〇〇萬噸。

因此，工商業發達根本不是個充分理由可以解釋本國糧食減產，進口糧食激增的畸型現象。

犧牲本國農業平衡美方逆差

根據官方解釋，進口美國農產品是為了平衡貿易的逆差。已好像是無可奈何的事。台灣的工商業得力於農業的扶植，現在工商業發達之後，農業不但沒得到反哺，又在受盡工業污染、商業擠壓之餘，工商業帶來的逆差困擾，難道又非得犧牲農業的方式來解決不可嗎？為什麼要用「五年的長期協定」？為什麼要在協定中用有利於美方的條款向美國保證呢？日本與美國之貿易逆差可要比台灣大的太多了，他們是如何的態度面對美國？他們又怎麼能夠長期地限制多種農產品進口以保護自己的農業呢？

如說日本為工業強國，但南韓又如何能抗拒美國農產品的強硬推銷，以保護日本國的農業？

美國國際糧食市場開發的策略
——食物美國化

美國爲了解決其長期以來的糧產過剩危機，以及爲了向印度換取原子能戰略物資中的稀有金屬，在五十年代時發展出一套完整的長期外銷糧食計劃。首先由國會通過了公共法四八〇號，（*P.L. 480*），允許幾個特選的「友邦」——台灣、韓國、日本、印度諸國，不需用外匯美金來買美國糧食，如此不但可以繼續向美國購買更多糧食，更可用多出來的外匯買進其他美國貨物，發展輕工業。當時的助理國務卿克雷頓（*C.L. CLAYTON*）曾在向負責貸款的世界銀行作證時說：「這當然會對美國的農產品出口有利，理由是當你幫他們發展了工業，你就把他們的經濟轉移到工業上去了，他們就更需要你的農產品，所以我認爲最終你一定會爲你的農產品拓出更多市場出來！」

庫利農貸——麵包廠、烟廠、紗廠……

這類「*P.L. 480*」變通得來的當地外幣，有高達百分之廿五的這種糧食來交換來的外幣，以極低的利息貸給在當地的美國公司，等於直接幫助美國的公司投資。這麼一來，馬上又對美國農業出口創造出許多新的需求。美國國際商業公司（*BUSINESS INTERNATIONAL*，一個專門替多國公司服務的組織）的主席海因斯（*ELDRIGE HAYNES*）的美國國會的小組說美國需要在低開發國家擴展食品加工工業。他這麼說：

「我們現在出口的是小麥，不是麵包，總得有人去把麥子變成麵包。如果他們（低開發國家）不做，如果沒有設備去做麵包，麥子是沒法被消化掉的！」

海因斯又說棉花及烟草也是同樣一回事。所以他建議美國公司應該有資格獲得「庫利農貸」（“*COOLEY LOANS*”，因當時的參議院農業委員會主席而得名）以便在外國建造紡織廠及香菸工廠。所以跟着就有至少四一九家的公司在卅一個國家創業或擴充起來。有名的像：*WYETH* 藥廠、*UNION CARBIDE*、*OTIS* 升降機、*SYLVANIA* 電器公司、*ROCKWELL* 國際公司、*GOOD YEAR*

輪胎、*CPC* 國際公司、陽光農場、第一國家都市銀行、美國銀行，*AMERICAN EXPRESS* 等等各類公司、銀行都有，都是得款於「庫利農貸」法案，都是跟推銷美國農產品沾上了邊。

此外，美國農業部又用外國食物貸款的償還款項，支持了許多民間貿易公司的組合；譬如美國飼料穀商協會（*U.S. FEED GRAIN COUNCIL*）等，在低開發國家推廣飼料、畜牧、養豬、家禽工業。每年貸款數都在千萬美元以上。台灣當然是這些大公司群集的地區之一。

建立國際小麥市場——美國人教咱們包餃子？

「*P.L. 480*」非常成功地爲美國開拓了小麥的國際市場，取代了很多本來是食米地區的稻米生意。一位市場專家曾經如此的說過：「『*P.L. 480*』對小麥來說可說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事情。」並指出台灣、日本，及韓國三個國家的小麥消費量增加的簡直驚人。

糧食發展政策研究的專家稱：「美國對台灣政府的小麥援助信用貸款，使得台灣可以把當地人的主食——稻米外銷到日本等國。政府鼓勵人民改吃麵食，設法使大家喜歡，並稱：「吃麵可替國家賺外匯，吃麵愛國！」

美國的糧食政策專家說：「四八〇公法證實了一件事，就是人們是會喜歡他們所吃的東西，而不是去吃他們所喜歡的東西！不管你同不同意，美國公司的確是教了人們去吃他們推銷出去的東西！」

南韓目前有七千多家西點麵包店；他們開始吃義大利通心粉。

一位美國農部的官員神氣地自誇道：「我們教他們怎麼吃他們沒吃過的東西！」

聽起來有點氣人，但這些都是事實。台灣同胞們也許可以回憶起當時政府推廣麵食運動時，許多台灣省籍的人都從「麵食推廣中心」學了一手好藝，會包餃子、做花捲、蔥油餅等等多種麵點。如今，在台東路攤上賣餃子的不是山東人而可能是山地

同胞了！可能是當年「麵食推廣中心」的畢業生。

美國的糧食政策專家又說：「『P.L. 480』證實了一件事，就是人們是會喜歡他們所吃的東西！不管你同不同意，美國公司的確是教了人們去吃他們推銷出去的東西！」

其實這是資本主義的基本手段，即使沒有需要，他們也會創造出需要，同時還要創造出喜愛與偏好。何況小麵還不是那麼不需要的商品呢！

美國開拓糧食市場的偉大成就在一九七四年國會中被宣揚的有聲有色。美國前農業部長佛瑞曼（ORILLE FREEMAN 後來當國際商業公司的總裁，即海因斯為主席的同一組織，在更早的十九五七時就曾主張利用『P.L. 480』為美國農產品開拓出口市場。）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上作證時稱：「在過去七年間，我們對台灣的農產出口上升了百分之五三一，對南韓的上升了百分之六四三。這是由於我們創造了市場。」接着他又補充的說：「P.L. 480 是非常有意義的！」

建立飼料市場

穀類糧食的外銷，解決了美國的剩餘糧食的危機，又替美國帶來了財富。它的市場雖然不小，但若僅靠補充外國的缺糧部份或主食取代部份，它的數量還是有限的，很快就飽和了。因為人的食量是一定的。所以要想使美國能銷售更多的糧食，有更穩定、更有潛力而可靠的市場的話，則不但要使更多人把吃的習慣由米改為麵食，更要高級化的改成多吃肉。因為需要三~四斤的糧食才長一斤雞肉，五~七斤的糧才得一斤豬肉，廿七斤左右的糧，才換一斤牛肉，所以能把肉取代米麥以後，則糧食市場的潛力可加大到五倍、十倍、甚至於廿倍！而且很少有人不喜歡肉的，中國人作的西餐，中國的麥當奴漢堡、牛排都比美國的好吃，中國的宮廷珍席更是早已被發揚光大了，雖然美國要推廣肉食，但台灣却早已更上層樓。所以這次推廣可說毫不費力。所欠的是什麼？答案是發展養飼農業，建立飼料工業。

與台糖合作的美國的嘉吉穀公司（CARGILL INC）一九六八年以來在東南亞各國所建立的飼料工業，（包括飼料配製、種豬、種雞、大雞場、大豬場、畜牧場、設備等等）就是美國穀物外銷發

展到最高階段的一個代表。

這家每年做幾十億生意的大穀商（世界第一大？）除了遊說政府、操縱政策外，又喜歡走邪路，走各國政要權貴的後門，轉帳逃稅，在美國國內、國外都十分有名，許多劣蹟已經進入大學的教科書中。

現在台灣每年養了五百多萬頭豬，不過大多都是靠進口的玉米雜糧配製的工業飼料，而不是在台灣本土氣候可大量生產的雜糧及蕃薯及剩餘食物之類的傳統上的飼料。

傳統副業型的養豬法（「農業豬」）利用廢料、廢湯、廢物、廢地、廢工。大量的豬糞尿又回到農田做肥料，不但效率極高，更可說合乎生態，穩定農業市場，社會安全。相反的，「工業豬」却浪費能源，耕地、資金、豬糞不但沒有利用更污染着環境及水源，豬肉中殘留有大量的抗生素或其它藥物，危害人體健康。市場動亂不穩，「養豬危機」頻頻，一連數次都使得全部養豬業處於虧本與破產的厄運中。

農民自覺有待喚醒

台灣農村的破產，雖說是由於被美國及本國的糧商出賣了，被政府為挽回外交挫折而犧牲了；被不知反哺的工業侵害了，被崇尚洋貨的國民遺棄了，但仔細地追究起來，農民自己的保守、消極、被動的習性也多少有值得檢討之處。尤其是同日本的農民相較之後，更容易察覺出來。

日本農民參與政治，最大政黨自民黨百分之六十的票源是來自農村。去年美國同日本商業談判時向日方施壓力，日本馬上放鬆了近百種的貨物項目的進口限制，但就是沒有開放美方壓力最大的農產

日本農民為抗議雷根政府要求日本進口農產品的壓力，馬上聯合起來，舉行大型示威，向日本當局表示力量，不許退却。台灣農民，任由商人與政府結合，長期有計劃、有組織地摧殘，却不知設法組織團結，參與政治，以顯示力量。

品進口。今年初雷根政府再施壓力，日本農民馬上就聯合起來，舉行大型示威，向日本當局表示力量，不許退却；向美國抗議壓迫。日本進口的肉類、飼料、果蔬等等也多由農民的組合所控制。不像台灣的農民，但由商人與政府結合長期有計劃、有組織地摧殘。台灣的農民不知設法組織團結，參與政治，以顯示自己的力量。台灣善良的農民，仍然只知認命，只知道自殺（據榮總的研究報告，農民自殺率高居第二位，這是以前安定農村所沒有的現象），不知抗議，一次又一次地被商人的貪婪、被政府的媚外政策出賣了，最後又無知地來出賣自己——竟以五十元台幣的價格或兩塊香皂的代價，將自己最神聖的選票賣給「金權政治」下在城市養尊處優的大商賈政客。

黨外不應只為抗議而抗議

李登輝上台省主席後，一方面由於長期輿論反映農民的疾苦、學者不斷地對不良政策的批評，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他本人也曾經是農業學者之故，即刻做了不少挽救農村的措施。其中一項便是展開食米的宣傳，勸國民多吃大米，以減輕倉儲過滿及政府補貼款項的壓力。這可說是一反近年來政府許多偉大而不實際的政策作風，一個最積極，最根本，而最樸實的辦法。筆者兩年前在「我們是怎麼變成糧食進口大國的？」（大地生活一九八二年一月號六三頁）一文中，即指出台灣農業沒落的首因是進口糧食；進口糧食之所以成功的展開是美國文化的進襲，本土文化的沒落，（食米是台灣的第一文化！生存第一也！吃饅頭的北方人在台灣的總人口中不過百分之五，而且也不是非吃麵不可的北方人，「麵食推廣中心」的觀念是來自美國！）所以如今要挽救台灣農業，解除稻米生產過剩的危機，當然也應首先恢復台灣固有食米的文化。李登輝這點樸素政策，是應該被大加讚揚才對。

然而，一些黨外雜誌的作者却為文諷刺李登輝沒有法度，叫「大家變成飯桶來救國！」

這種態度幾乎是種難以原諒的輕浮，也充分表現出部份黨外人士的只為反抗而反抗的無知反應心態，只知消極破壞，而不知或不願作積極正面的建議或協作。

黨外應以喚起民衆的方式，教育農民、幫助農民發揮自己的政治權力，把自己組織起來，走向合作化，挽救自身的危機。如此不但達到民主的實質意義，也開拓一片新的政治原野。

黨外依然可以嚴守其「反派立場」來評論而不失其對優良政策的建設性。譬如我們可以說李登輝對「食米文化」措施推廣得不夠早、不夠具體，應更大力地在電視上宣揚食米的好處（諸如可以減肥，防治心臟病、高血壓等等，合乎台灣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等等），成立「糧食推廣中心」提高省農林廳的職權，對所有進口農產品執行限制及調節等等，可談、可批評的地方很多，為何對這種維繫全台灣生存的嚴肅問題上，而一定也要以嬉笑怒罵地作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

另一方面，如果說黨外是一種民主運動，其運動的層面則不應像現在一般黨外一樣只下國民黨為唯一運作的對象，以贏得選舉為唯一的工作。應以喚起民衆的方式教育農民，幫助農民發揮自己的政治權力，幫助農民自己組織起來，走向合作化，挽救自己的危機。如此不但也可達到民主的實質意義，黨外也可像日本自民黨一樣，開拓一片新的政治原野。畢竟目前尚極少有出自農村或願代農民講話的國會或省級議員。

對當局農業政策的評估與建議

1 嚴正抗拒美方貿易壓力。

幾乎所有的工業國家，沒有不對其農業作大量補助的。日本的稻米保證價格是國際市價的六倍。歐市共同農業政策（CAP）一九八一年就支出了高達一三〇億歐洲通貨單位。連年的補助，使得一向是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地區，在一九八一年時反過來成為穀物出口地區。該項政策成為歐市最值得驕傲的成就。這自然減少了對美國飼料穀類的進口，為此美國曾多次抗議不果，一九八一年底國務卿舒茲曾親自帶了財政部、商業部、農業部三位部長

去布魯塞爾進行談判，曾被認為是場相當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貿易戰爭。

日本與歐市諸國爲了保護其農業所受到美國的壓力若和台灣這次受到美國米商的控訴或壓力，簡直不能相比。從沒有像台灣一樣，動不動就自動地去平衡貿易逆差，以擠壓自己的農民來保護他國農民的利益！希望台灣政府這次能挺直腰身，嚴正地拒絕美方無理的指控或要求。

2 大幅提高對農產品的保證價格與補助

很明顯的，台灣政府對稻米僅有的些微補助是難以與日、美、歐市諸國相比的。台灣長期以來的「維持食米合理價格」政策，實際上是個限價政策。在過去有穩定物價的作用，可是在出口導向的工業爲主的台灣經濟型態，一切物價皆以石油價格及國際市場爲浮動準則，再以食米來穩定物價，不但早已過時，不是事實，而且已起了「欺壓農民」的作用。如果說國庫負擔太重，則可由每個國民來分扣，也是理所當然的，每人每年約消耗一百公斤稻米，每公斤稻米上漲一元台幣，每人每年才一百元，只不過幾個進口蘋果或三包香烟的價錢。對於一般國民根本不會感覺，然而每甲地却可多了一萬多元的淨收益，對於農民則有可觀的改善。台灣農民是社會不可缺少的一份子，過去一直在扶植着台灣的工業，健康的農村又是工商業不景氣時的安定劑。對農民的「補貼」實際上是他們「應得而未得的收益」，所以不應被看作是一種負擔。

3 轉作雜糧或經濟作物是自殺性的農業政策

台灣政府對付稻米生產過剩現象是政策性的減產，以及輔導稻農改種較高價的雜糧、甘蔗、蔬菜，甚至鮮花等等外銷用的經濟作物。所以在成功地發展出口導向工業，台灣的生活環境遭到急速地污染與破壞之餘，看樣子現在又要發展「出口導向農業」來破壞台灣固有的農業結構了。

台灣的氣溫高，日照久，雨水充足，適宜稻作是天經地義的事，尤其是稻田的水利灌溉工程，是上百來祖先們血汗累積下的長期遺產，而今却爲了

配合「經濟」政策漸漸要「無用化」了。真不知這些專家們的「經濟」標準是什麼？一切只以「美金」來衡量嗎？

經濟作物出口導向的農業是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的農業型態，（如日治時代台灣的鳳梨園、甘蔗園、馬來西亞的橡膠園，印度與非洲的茶園等等，所謂「園殖農業」(PLANTATION AGRICULTURE)。進入現代後，歐、美、日諸國的跨國公司已將之轉化爲供應本國高級生活享受的農產品企業，(AGRICULTURAL BUSINESS 正是我們現在的「出口導向農業」)，在中南美洲、非洲、亞洲等落後第三世界地區發展果蔬、鮮花、水產養殖農業。結果本國正規農業衰退，得由外國進口穀類主糧，甚至像非洲許多國家近年來一面鬧着大饑荒，一面每天以噴射機運向歐洲大量的鮮花與果蔬。

以前台灣是被迫發展殖民地農業，現今豈不是要自動地做人家的殖民地嗎？政府口口聲聲要強調農業的自給自足，如今傳統上的主食不吃，改吃對他國農業有利的進口小麥與雜糧，自然高產的水田不種本土自然高產的水稻，改種雜糧成鮮花，如何還能「自給自足」呢！?

太平日子如此自我作孽已經夠糟了，雖然台灣每年花了高達百分之四十五的政府預算在國防上，然而中共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封鎖台灣，假如台灣那時出口導向的工業產品出不去，出口導向的農業產品也出不去，工業原料，能源進不來，依賴進口的糧食也進不來，不需太久，幾天的封鎖，就會造成長期的恐慌。嚴重的情況，不會亞於今日的香港。

這不是作者故意危言聳聽，而是來自許多中外專家早已公開認同的研究報告。也是一個國家的唯經濟論與唯軍事論所決定的政策的必然危機。犧牲本國農業的獨立自主，犧牲本土的生態健康，就等於放棄了自己的生存權一樣，也無疑是種慢性自殺的政策。

挽救台灣農業危機之道無他，只有停止發展出口導向的殖民地農業，減少對進口糧食的依賴。也只有保護本國農業，使其趨自給自足，挺起脊梁面對美國的無理要求，面對外交困境，才會爲台灣帶來真正的「莊敬」與「自強」！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
第三屆世界糧食日

黃賢

典

陳明忠

采光

陳明忠是在一九七六年被台灣政府逮捕的政治犯，那時，黃賢是一個剛從哈佛法學系畢業的香港留學生。他們之間毫無關係，陳明忠迄今也不可能聽過黃的名字。黃賢為陳案奔波的時候，他大概也沒有料到自己會有和陳一般的遭遇——陳明忠結果以匪諜罪被國民黨政府判刑十五年，數年後，黃賢被中共政府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判刑十五年。他們的故事，紀錄了民主、人權和法治在海峽兩岸的掙扎，也反映了海外華人的關切和努力。

七六年，黃賢剛到芝加哥，在一法律公司工作，他在工餘時，和芝加哥的中國留學生一起打球，聊天，討論國是。他給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生活簡樸，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對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民主方面的發展，十分關注，但也十分樂觀，滿懷希望。

該年秋天，陳明忠在戒嚴令的名目下，被國民黨政府秘密逮捕，沒有公正公開的審判，更傳聞有被秘密處決的可能。消息傳到美國，大家都十分關心。芝加哥的朋友們，雖然都不認識陳明忠這個人，但大家都覺得，政府這鎮壓異己的手法，是黑暗的，是不民主的。在這所謂「法制」下，民主和民權都沒有保障，這是作為中國人不能漠視的。於是，熱心的朋友便組織起來，要為陳明忠事件出一點力。大家收集資料，了解情況，展開討論，聯絡美、日各地關心此事的人，又發電報給台灣當局和到領事館前抗議等等。最後，海外的民主人士更聯合起來，蒐集了約一萬美元，在紐約時報上登

了整版的廣告。在整個挽救陳明忠的運動中，黃賢的努力是不可缺少的，他為此事經常冒着嚴寒的風雪，到處奔走，聯絡、籌款和邀請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如一些國際特赦會的成員，一些諾貝爾得獎者等）來贊助廣告。很多時候，他要通宵達旦地工作。最後，國民黨在海外強烈的輿論壓力下，沒有把陳明忠處死，而宣佈了十五年徒刑。陳明忠事件以後，島內陸續發生了其他（如戴華光案等）鎮壓民主的事件，海外也努力不懈地大聲疾呼，反對那些政策，希望以輿論的力量，來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黃賢在這方面都十分熱心，付出了很多氣力。

後來，黃賢回到香港，仍替原來在美的公司辦事。不久，又轉到北京，利用他對國際法的所學，參加了中共對外貿易的工作。後來，根據一九八二年十月二日華爾街日報的報導，黃又放棄了在北京的工作，到紐約的一所美國公司任職。據報導，黃賢這一做法，引起中共十分不滿，於是，黃便自願到北京解釋。可是，從八二年初起，黃便神秘失蹤了，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大家都懷疑他是遭到中共政府的羈留。他的親人和關心他的朋友們，都不斷地向中國領事館查詢，但都沒有明確的答覆，不但沒有說明羈留的理由，甚至是否被扣也沒有公佈。直至最近，黃失蹤近兩年了，中共政府才宣佈黃是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理由是洩露國家的能源機密。

當年與黃賢一起工作過的朋友們，都很難相信黃是一個會見利忘義、賣國求榮的人。但是，和陳明忠案一樣，姑勿論黃是否有罪，政府對黃案的處理，不是光明正大的。秘密扣留，封鎖消息，沒有迅速、公開的審判，只是方便執政當局的任意施為，却侵犯了涉嫌者和他的家人的權利，更嚴重的，是否定了人民監督政府的權利。陳、黃兩案，是一個令人難過的巧合，看來民主和法治，在海峽兩岸，還是長路漫漫。

日本帝國主義

雖然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那種赤裸裸的船堅砲利式的侵略近二、三十年來較少看到，但敏感的人仍會從各種跡象中，感覺到帝國主義的威力在世界各個角落，各種層面中顯示出來，影響着世界絕大部份人民的安全與幸福。格里納達島的入侵、韓航被擊落、阿奎諾被刺、中東的僵持、核戰的威脅、以及到第三世界的糧食危機，消費社會的形成等等，等等，直接間接，莫不與帝國主義有關。加深認識帝國主義，不僅是關心民主運動者所需，也會影響每個人未來的命運。

不幸在台灣，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來到美國這個帝國主義的大本營，種種因素也使人們很少有機會去了解它。

本文敘述十九世紀末日本剛形成帝國主義時期的心理分析。了解一個事物，它的心理或主張背景是一個很重要的部份。特別帝國主義這個這麼複雜而重要的現象，擁護者必然會以各種美麗的理由來裝扮它。只看它的表面說詞，往往很容易為其迷惑。分析帝國主義者的真正意圖實為刻不容緩。特此推薦給讀者。

——編者識

十九世紀 日本帝國主義 的心理分析

入江昭 作
嚴敬 譯

日本帝國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有何不同？有些歷史學家以為並無不同，在他們筆下，日本的行爲與西方列強一般無二。部份歷史學家從經濟觀點來

解釋兩種帝國主義。由於一八九〇年代的日本正是典型的壟斷性資本主義，經濟決定論者乃視當時的日本爲一種「預防性」的帝國主義；他們認爲，日

本當時的海外擴張，是在「預先占定」某些地區，以供未來的資本主義剝削。其他尋求日本與西方之間相似性的學者，則着眼於較微妙的因素。索斯坦·維布倫有關日本帝國主義的理論，和熊彼得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解釋便很相近，他堅稱日本帝國主義是封建主義而非資本主義的產物，日本的帝國主義行爲，正反映出它尚未完全脫離封建的傳統。此說頗爲流行。不少作家都曾指出日本武士對權力、擴張和光榮的專執，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帝國主義的根源是封建意識，其傳播者充滿了隔代遺傳的精神。

另一方面，也有些學者強調日本帝國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相異性。許多日本學者就認爲，日本的擴張主義不像西方帝國主義那樣基於物質的貪慾，他們辯稱日本的帝國主義者有一種自我犧牲的「高貴情操」。西方學者的論調則恰好相反。他們認爲日本式的帝國主義比西方帝國主義更暴虐、更邪惡，而且更富侵略性。這種對兩種帝國主義相異性的主觀性詮釋，有時候竟成爲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的一種口實。

無論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之間有多少相同或相異之處，它們在十九世紀後期曾經並存於東亞，而且在東亞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顯然地，它們是同一種歷史動力的產物——這種動力爲帝國主義時代鋪好了道路。

不過，這並不是說日本擴張主義是一個嶄新的現象，純粹受到那種歷史動力的激盪而興起。日本在傳統上就有擴張主義的傾向，直到德川時代仍未消失。日本典籍中討論殖民主義的極多；十八世紀後期以後，日本的學者即不斷要求向北擴張到北海道、庫頁島和堪察加半島，向南擴張到菲律賓、爪哇和南海群島。這些主張似乎並不是受到西方殖民主義的啟發的後才起思效尤的。它們大半都還停留在「坐而言」的地步，並河天民鼓吹擴張領土，使「大日本」成爲「大大日本」；林子平希望把文明傳播給尚未開化的北海道土人；馬場正道嚮往着一個由日本掌握的龐大重商主義帝國；佐藤信淵則提議日本向全球發展帝國主義，使各國都臣服於神道之下。這些日本學者在提出上述各種主張時，並沒有看過有關西方殖民主義的文字，他們的「擴張主義意識」，乃是來自本身神道信仰的背景和參與政

府工作的實際經驗。

然而這個擴張主義的傳統和明治晚期的帝國主義不盡相同。傳統上的擴張主義只是「坐而言」，並未「起而行」，而且在德川時代的日本，同時還有一個非擴張主義的傳統。直到日本與西方直接接觸，學會從西方的角度觀察世界以後，新的日本帝國主義才於焉誕生。

和在西方一樣，日本的擴張主義思想與行爲，也具有一種不穩定感和不安全感。有人曾說，明治初期的日本是一個充滿自信、對人類改變世界的的能力毫不懷疑的時代，可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明治領袖的心理，我們會發現在整個明治時代，日本的行爲背後都隱藏着和當時西方相似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的根源，部份來自其封建的歷史背景——包括朝秦暮楚的君臣關係和以王陽明哲學爲基礎的自省觀念——部份來自一八五〇年代以後急遽轉變的國家生活。不過，在日本人學會使用西方的政治用語以前，這種不安全感還無法被形諸抽象複雜的文字，也還不致於導致帝國主義；事實上，它反而使日本政府極端謹慎，不願從事海外冒險。

至於那些帝國主義思想家，他們所承襲的日本人固有的擴張傾向，到明治初期無疑又受到一種迫不及待感和不確定感的刺激，從而變本加厲，使日本擴張主義的面貌更爲清晰。桐野利秋於一八七五年左右寫道：

「今天的世界局勢是弱肉強食、此興彼衰，各國競相爭權。我國地處東洋，二千五百年來蟄伏不動，對世界局既一無所知，又缺乏國家元氣；軍備廢弛、輿論不張，真有亡國的危險。」

這種觀感驅使桐野鼓吹日本採取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往亞洲和歐洲擴張，與列強逐鹿。其他早期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尤其是「征韓論」者——也表現出類似的態度。

當然，明治時代的擴張主義並不全是「帝國主義」。在日本，和在西方一樣，也有人主張自由開放式的擴張，譬如通商、移民和海外的和平活動等。然而本文的目的在於探討比較排他性的帝國主義——當代西方帝國主義正是以這種面貌出現。（自由開放式帝國主義的思想基礎，也源於西方）簡言之，日本帝國主義者很容易從西方的辭彙中，找到表達他們需要的用語。

一八七二年，日本駐俄公使榎本武揚便在他著名的信函中寫道：

「我以為，由於朝鮮的地理位置及政治情況，它與我國（相對於亞洲鄰國而言）的權利及利益，實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將我國的勢力向朝鮮擴張，也是我國『政策』中一個關鍵性的因素。……雖然我國不會從朝鮮取得太多實際的經濟利益，但是就『政治』和『戰略』而言，却十分重要。」

榎本出使海外的經驗，使他學會如何以外交辭令來表達帝國主義的企圖。這種帝國主義的「教育過程」持續至一八八〇年代。當時的前任外相副島種臣——「大陸擴張派」的領袖——竟然宣稱，為了保衛日本的國家安全，必須奪佔亞洲大陸，尤其是朝鮮與中國。他說，所謂維持朝鮮的獨立乃是一派胡言，因為朝鮮遲早要被他國併吞；僅就勢力均衡的原則而言，日本也非攫取朝鮮不可，更何況經由戰爭的磨鍊，國力可以增強，將有助於維持日本的獨立。山縣有朋一八八八年的著名奏摺，代表了官方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奏摺中指出，亞洲註定要成為西方列強——特別是英、俄——逐鹿的場所，印、中、韓均將捲入戰爭；其中朝鮮的捲入戰爭最令人擔憂，因為對於朝鮮半島上的衝突，日本無法坐視。因此，日本有必要尋求朝鮮的「獨立」，使它不致淪入西方列強之手。兩年以後，山縣進一步割朝鮮半島為日本的「利益線」，而日本本島則是「主權線」。他聲稱，將危險的列強逐出「利益線」之外，乃是國際公認的行為與國家安全的保障。

要想從日本人自己所說的這些話裏，來尋找日本帝國主義的原因，將是徒勞無功的。然而一般歷史學者往往只是重述這些話，好像認為言語本身便足以解釋行為似的。其實我們應該進一步研究日本如何接受西方對國際政治的觀點。本文所提出的假說是，由於日本人本來已經產生了一種不安全感，因此日本帝國主義者對當時西方帝國主義的辭彙與心理，特別一見如故；他們突然發現自己的不安全感原來是舉世皆然的現象，信心反而大增。於是他們用西方人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念與感情，也在行動上步西方各國的後塵。換句話說，他們變成了帝國主義者。

正因為如此，日本帝國主義在言語上和西方帝國主義無甚不同。中日甲午戰爭就是一例。這場戰

爭使日本成為十足的帝國主義者。從日本的觀念看來，這場戰爭與西方擴張主義的戰爭是一樣的；外相陸奧宗光在戰爭前夕寫道：「自開國以來，我國首度執行了真正的外交與外交政策。」所謂外交，包括派遣日本軍隊到朝鮮向中國挑釁，陸奧認為這是鞏固日本在韓勢力的必須措施。不過，如果日本無法從此舉中得到明顯的物質利益，國內的輿論也許會反對用兵，所以日本政府必須攫奪若干朝鮮的鐵路、電報、礦山和其他利權，讓日本人民享受一下帝國主義的果實，儘管依陸奧自己的看法，「這些利權益並不能（為日本）帶來實質的利益」。陸奧又辯稱日本的行為乃是為文明着想。他說：「這場戰爭的根源，實為歐洲新文化與東亞舊文化的衝突。」當然，這可能只是一種用來討好西方人的宣傳手段，但這種以新文明自許的態度，也反映了當時日本人心理的一個重要層面。日本人企圖將他們的作法解釋為「世界潮流」，並借用西方帝國主義的辭彙來形容他們對亞洲大陸的侵略。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無論就權勢或自我形象而言，都成為一個帝國主義者。至少根據官方的想法，日本和西方先進國家之間的距離是拉近了；但矛盾的是，這倒使日本人和西方人格外注意到彼此的差異。

正如帕理艦隊的打破鎖國，曾引起日本國內政治一連串急遽的變化，終於導致德川幕府的衰亡一樣，中日甲午戰爭也對日本後來的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的波盪一直持續至一九四〇年代。馬關條約使日本佔領台灣和澎湖，儼然崛起為一大帝國；它也獲得了朝鮮的「獨立」，並開始插手這個半島王國的內部事務。牢牢地控制朝鮮成為此後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日本的海陸軍也都必須大幅擴充，以保衛帝國和應付朝鮮的變局。甲午戰後中國對日本的巨額賠款，不但補償了日本的軍費，還有餘裕供日本發展重工業和採納金本位幣制。總之，日本人從此自視為帝國主義者，列強之一。對他們來說，這表示日本今後可以以「文明強國」的身份，趾高氣揚地參加帝國主義政治的遊戲。

（本文譯自AKIRA IRIYE, "IMPERIALISM IN EAST ASIA"收錄於JAMES B. CROWLEY ED. MODERN EAST ASIA: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一九七〇年出版。）



在台灣受教育成長的人都曉得在台灣有很多種禁忌，禁忌去參加政治活動，禁忌去閱讀一些書籍，或接觸某些思想。每個禁忌的背後都是一種令人打從心底顫慄的陰影，恐嚇人們不得越雷一步。禁忌下，不僅使人無法爭取到自己應有的各種權利，也使人們喪失了獲取知識與真理的機會。對一個個人而言，這兩者都是莫大的損失。失去了獲取真知的權利，也就意味着將失去許多智力與個性發展的機會。

在各種禁忌中，關於馬克斯又是最突出的一種。長期的反共恐共氣氛下，台灣來的留學生往往把馬克斯等同作一種恐怖暴戾的化身。如果有人告訴他，馬克斯的著作是當今西方社會科學學術界被引述最多的一個作者，因而是最具影響力的大學者時，恐怕他會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當然，馬克斯本人主要不只是一個大學者，而是大革命思想家。他的思想曾鼓舞與指導了無數爭民主，反壓迫的人去奮鬥。

對於關心台灣民主運動的留學生來說，不論是站在探求真理或支援民主運動的立場，都有必要了解馬克斯的理論。

本文介紹青年馬克斯時期的一個主要思想。如前所述，馬克斯的思想非常豐富多樣。青

年馬克斯的異化理論，只是馬克斯思想的一部份。以此來概觀馬克斯主義，是非常不夠的。這是我們首先要說明的。

馬克斯的理論十分深奧，特別是青年馬克斯的哲學，帶有相當多黑格爾哲學色彩與語言，比較不易閱讀。然而，我們總不能老停在浮面的問題上。黨外運動要如何往前發展？很多人也感到要往深探討。往深探討，往往就不是一些簡明易知的推理所能蓋括的。

理論的層次愈深刻，或是抽象的程度愈高，它所影響的面也就愈深刻，愈廣泛。因此，一何理論的正確如何，其影響要比普通的文章來得大。我們在審核這篇稿子時便特別小心。以免介紹了不正確的東西，反而把讀者帶到錯誤的認識上。

在處理過程中，我們發現幾位審稿員的意見出入很大。這一方面反映了問題本身尚在爭論，而且高度理論性的哲學題材不易有定論；另一方面也反映海外華人在這方面的研究還處於萌芽階段，溝通討論還很不足。本刊雖不是學術性的刊物，但我們重視理論工作的重要，期待有更多更廣泛而嚴謹的理論討論出現。

我們原則上維持了原作的全貌，對於不同審稿員的意見，我們綜合作了「編註」，附於文後。還有些意見則屬各人的看法不同或行文筆法的不同而有歧異，我們保留原文，但在此說明這只是作者個人的敘述。

我們要特別感謝作者向新左先生，為我們提供這個重要而不易介紹的題材。本稿的審核也遠較一般稿子為久（是本刊迄今處理最久的一稿），在此感謝作者及審稿者的耐心與合作。

——編者

I

青年馬克斯的哲學在我們的思想界還沒有廣泛地被討論。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台灣，國民黨政府聞馬克斯變色，不管青年或老年馬克斯，通通在禁止閱讀與討論之列。若有人念了馬克斯的任何著作，然後在私人的場合報告或討論，就犯了散佈馬列思想罪，刑期是七年以上，或無期徒刑。所以青年馬克斯的思想在台灣是很陌生的。法蘭克福學派提倡青年馬克斯的研究不遺餘力。不久以前有人在台灣介紹法蘭克福學派，馬上受到台灣官方御用理論「家」的圍剿。當然也有一些新馬克斯主義專家被介紹到台灣去，像 Lukács 和 Marcuse 等，但都是透過御用文客的「批判」角度來對待這些大思想家。在大陸，青年馬克斯思想也是被壓抑的，主要的原因是青年馬克斯的人文主義色彩太濃，也有相當的唯心與宗教的成份，與資本論時的馬克斯格格不入。最主要的原因是青年馬克斯的異化理論有太多地方和資本論不一致。例如在一八四四年經濟與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馬克斯主張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果，資本主義階段是必要的。蘇共與中共革命均違背了青年馬克斯的歷史哲學。因此蘇共與中共的理論家都拼命地去論證成熟的馬

克斯揚棄了青年時期的人文主義（編註一）。當然喜歡青年馬克斯的人則想法子證明馬克斯一生的思想是一致與連貫的。後面這一類人通常被稱為馬克斯主義者。（編註二）

筆者評介青年馬克斯的動機之一是介紹給關心台灣的朋友們一個比較深刻而且寬廣的思考方向。大家聚面談論台灣時局時，多覺得黨外民主運動有其局限性。局限在那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局限？怎樣突破這個局限？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台灣社會現實的資料的收集與分析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去瞭解一個社會時，我們需要一個較好的概念架構，瞭解才會深刻。批評資本主義社會，很多人慣以晚期馬克斯的思想為架構。馬克斯的資本論大家談得很多了，筆者希望本文能有拋磚引玉之效，大家來討論青年馬克斯，也許對思考台灣的種種問題，能有較深刻的洞見。

這篇文章的寫法是比较專業性和理論性的，雖然會比較難讀，但對喜歡思考的讀者較具挑戰性。研究青年馬克斯，最核心的一個概念便是異化（alienation）。異化理論是整個青年馬克斯哲學的基石，新馬克斯主義者更主張異化理論是整個馬克斯哲學的基石，不瞭解異化論，就不瞭解完整的馬克斯思想。所以本文主旨在介紹青年馬克斯的異

化說。但本文不採平舖直敘的方法，而採比較黑格爾和馬克斯兩人的異化理論的方式，來闡解青年馬克斯，或者可以說是全部的馬克斯，最精華的異化學說。

II

在手稿中，馬克斯論道：

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一書中，最卓越的觀點是黑格爾把人的自我創化看成一個歷程（process），把人的客體化看成物性的消失，看成異化以及異化的超越。因是之故，黑格爾掌握了勞動的本質，並把客觀化了的人看成入自己的勞動的結果。

（編註三）

馬克斯認為黑格爾認識到了人的本質是勞動，但他只看到勞動的正面，而沒有看到勞動的負面。上面這些句子讀來撲朔迷離，很難理解。本文的目的之一便是澄清這段文字的意思。為了瞭解這段文字，我們必須討論黑格爾和馬克斯的異化理論，也必須討論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勞動的概念，和馬克斯手稿中勞動的概念，最後我們要討論馬克斯怎樣批判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解決異化問題的處方。

III

大部份的馬克斯學者都同意異化說是馬克斯哲學的核心。當然如上所述，許多人質疑青年馬克斯與成熟馬克斯的連貫性。中心問題是到底成熟馬克斯有沒有擯棄早年的異化說？這個問題我們不討論，我們只介紹一個反對的主張。馬克斯學者Hook認為，「自我異化」的中心概念是與馬克斯的歷史的、自然主義的人文主義不相容。Hook的理由是：「異化」這個概念源於聖經，基本上是宗教的和形而上的，宗教與形而上學正是馬克斯所反對的。

毫無疑問地，異化這概念是源自於舊約。在舊約裏面，異化概念與偶像崇拜概念連在一起。人崇拜偶像，偶像却是人造的。偶像是物體而已，人却崇拜它們，崇拜人自己所製造的物體。因此，人把自己轉換成一種物體，也因此，人迷失了自己，他與自己疏異（estranged）了，他再也認不清自己。

根據Hook的說法，人之所以異化是因為人由天堂墮落到希伯來基督傳統裏，從上帝的完美那裏墮落到希臘的哲學傳統裏。因此人的靈魂與上帝異化了。拯救人的過程就是克服異化的過程。因為異

化的概念基本上是宗教的，Hook因此認為不應以「異化」來解釋整個馬克斯哲學。（編註三）

IV

黑格爾認為，事務或物體是心靈的「形體化（externalization）」。因此自然界（The Nature）是精神或觀念（the Idea）的形體化。觀念形化為自然，這個自然是外於觀念的，具有他異性（otherness）。觀念在變成自然後，便逐漸地超越自然的他異性，直到完全地回到觀念本身，而變成具體的精神（the Concrete Spirit）。這段話很玄。簡單來說，黑格爾認為人的歷史是：人在天堂時，是一種較基本的精神，後來墮落了，形體化了，一開始和物體沒甚麼兩樣，可是形體化了的精神會逐漸地克服異化，即超越他異性，而回到精神本身。於是人由物體進為動物，有感覺了，再進而變為人類，有自覺和內省能力了，又進為完全的、具體的，不具他異性。即不再形體化的高級精神，最後與上帝合一，而為絕對精神（Geist）。馬克斯認為，黑格爾把人的疏異（estrangement）看成一種精神層面的現象，自然只不過是心靈的「形體化」而已。自然沒有他的獨立的地位。這一點是馬克斯最反對的。

簡單而言，馬克斯認為黑格爾把人類歷史的辯證發展視為人的意識體（consciousness）的辯證發展。自然或物質在歷史內沒有獨立的地位。黑格爾看到了人的本質是勞動。可惜由於黑格爾的「頭腳顛倒」，忽略了實際的社會與經濟史的發展，因而建立了一個架空了的，沒有實質基礎的意識辯證歷程。馬克斯自認承襲了黑格爾的大部哲學，最大的不同只是他把黑格爾顛倒的頭腳修正回來而已。

換言之，馬克斯基本上承襲了黑格爾的異化概念，只是他把黑格爾的唯心的、玄思的說法變成非玄思的說法，給黑格爾的異化概念注入經濟方面的內容。馬克斯同意，所有的文明及人文化的世界都是人的勞動的結果。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以「主人與奴隸」的類比來說明人類歷史。黑格爾說，在人類早期歷史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野獸殊無二致，為了生存常常進行生死鬥。生死鬥有三種結果，一是雙方都戰死，二是一方戰死，三是一方臣服。黑格爾認為，前二種結果都足以毀滅人類的歷史。雙方都戰死就沒有人類了。若一方戰死，則歷史的

辯證發展便不可能，因為辯證需要一反一正。只有在敗方臣服情況下，人類歷史得以發展。臣服的一方變成奴隸，勝方變成主人。主人驅使奴隸勞動，自己却享受勞動的成果。奴隸因為勞動而得以接觸世界，改造世界和創造文明。主人雖很舒服，却與世界隔離，中間隔著奴隸。主人只消費而不生產。奴隸的勞動却不是為了自己的消費，而是為了保老命一條。但是死亡的恐怖與顛慄却給奴隸一個思考世界本質的機會。死亡抖掉了奴隸日常生活中沒有意義的執著，開始面對大宇宙。雖然表面上奴隸受苦受難，但却是文明的真正締造者。加上對世界的深刻反省，使奴隸的意識發展較為先進。因此，最終的勝利者是奴隸，主人只變成類似催化劑一類，在歷史的辯證發展中不據重要的腳色。奴隸象徵異化的痛苦，面對死亡而發展出深刻的世界觀象徵異化的克服。異化雖然痛苦，却是必要的。沒有了異化，人的精神就無法辯證地提昇。但受苦的靈魂却是歷史的最終勝利者。

馬克斯受到這個故事的影響很大。他幾乎接受了黑格爾的所有觀點，只是奴隸變成了工人，主人變成了資本家，而面臨死亡的恐懼所發展出來的世界觀則是他的共產主義。工人是文明的締造者，工人是歷史最後的勝利者。青年馬克斯的工人指一切勞動的人。勞動是人的本質的意義就明確多了。沒有勞動就沒有文明，就沒有人文世界。

依據黑格爾的說法，異化是人類歷史中的必然。在人完成其歷史發展以前，異化是不可避免的。精神現象學的主題之一便是區分動物生活與人類生活，以及人如何由物一直提昇到絕對精神。在非常早期的人類歷史，人的生活和動物沒什麼兩樣，只是消費、破壞、轉換和同化外界的物質。意識（consciousness）變成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是在它開始知道自己本身，開始有內省能力，開始有「我」這個概念以後。自我意識把「我」當做對象，當做物體一般，做為人認識的對象之一。這就是黑格爾所謂的「客體化」（或譯作「對象化」）的過程（the process of objectification）。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由動物性到人性再到絕對精神，意識的客體化是必然的。沒有了客體化，人只停留在動物的層面。在動物層面無客體化可言，因為自我的概念尚未產生，「我」仍然不是認識的對象，所以主體（我）只是主體

，不能變成客體（做為心靈活動的對象）。因為沒有客體化，所以也就沒有異化。動物是沒有異化的問題的。黑格爾把自我意識當做人的本質，人做為人（不是動物）就是因為他是自我意識體，簡言之，客體化就是自我意識體把自我當做對象，自己省察自己，自己思考自己。客體化在人的歷史上是無可避免的。同時因為有了客體化才有異化，有異化必有客體化，所以黑格爾認為客體化即異化，異化即客體化。我們因此可知，異化也是歷史上的必然。客體化是知識形成的必要條件，若沒有客體化，即若人沒有自省能力，知識如何可能？所以換句話說，人要提昇，要瞭解世界，就必先客體化，客體化帶來了異化，雖然很痛苦，却是人自我實現的代價。

在客體化的過程中，人把自己形體化了（即把「我」當做物體一般），因此成世界的物體之一，因此意識體異化了自己，把自己變成他（other）。最重要的觀點是，黑格爾把客體化和異化視為必然共存的兩現象，這一點也是馬克斯所反對的，容後誌明。

V

上段大略說明了黑格爾的異化說。現在我們回到馬克斯的異化說。

本文一開始引了一段手稿，其中馬克斯說，黑格爾把人的自我創化看成一個歷程。上節我們已說明了這點。人的自我創化是一個很大的歷程，由物→動物→人→完全的人→絕對精神（上帝），歷史是一條上昇之道。人由上帝那裏來，自我創化完成後，又回到上帝那裏去。馬克斯又說，黑格爾把人的客體化看成物性的消失，看成異化以及異化的超越。現在我們也瞭解這句話的意思了。在客體化的歷程中，人把自我投射成物，認識自己（做為自己認識的對象），但最後人必提昇到絕對精神，一個完全沒有物性的絕對觀念，因此客體化歷程的終點便是物性的消失，人性的完成。我們也明白了為什麼黑格爾把客體化看做異化和異化的克服。這些都是馬克斯在手稿中對黑格爾的解釋。現在我們來談談馬克斯自己的異化理論。

馬克斯反對黑格爾所主張的，客體化與異化必然共存的說法。他認為，客體化與異化共存在某些歷史階段而已，共產革命以後，客體化仍然發生（以便獲得知識和自我實現），但異化將被消除。共

產主義革命的旨在於消除異化，而不是客體化。

對馬克斯而言，人的歷史是一部人類的自我實現史。和黑格爾一樣，他也主張異化在目前社會是不可避免的。異化乃基於一事實，即人的存在和本質疏異了。人的本質是勞動，勞動的成果當然是屬於人的一部份。若勞動的成果不屬於勞動者，則勞動者只是單單存在著而已，他的勞動與勞動的成果都不屬於自己，因此存在與本質疏異了。因此馬克斯說，疏異（*estrangement*）不僅僅指我的生活工具屬於他人（剝削者），而且連我自己的慾求（*desire*）都是不可企求的，任何東西本身都變成異於其本身的他物了。

人變成非人（*inhuman*），他的勞動變成疏異了的勞動。〔馬克斯常用互用疏異與異化（*alienation*）兩個字〕人失落在他的對象中。這種疏異現象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達到最高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沈落到商品的層面，變成可以交易的商品，最悲慘的商品。悲慘的程度和他的生產力和生產量成正比。馬克斯說，「工人製造更多的財富，他的產品的力量更大，他就變得更窮。工人創造了更多的商品，他自己就變成更便宜的商品。商品價值的提高與工人價值的貶低成正比。」這句話很容易瞭解。一個工人的日工資若為一百元。假定他可生產十件商品，則每件工資要十元。若工人生產力提高，生產量增加，每日生產二十件商品，無件工資便降為五元。所以工人生產力和生產量的提高，意味工人的勞動的貶值。而勞動是人的本質，所以工人做為人的價值就被貶低了。

上段是一般的敘述。馬克斯提出異化的四個樣相：1 勞動產品和工人的異化，勞動產品變成壓制他的外物；2 在勞動過程中，勞動與生產活動的異化，勞動與生產活動應是合而為一的東西，但因為生產活動變成為了他人，像奴隸的生產活動是為了主人一樣，因此與做為人的本質的勞動疏異了；3 工人與整個人類疏異了。疏異的勞動把個人從人類做為一個類中疏異出來了，這是個人主義的哲學淵源。個人變成獨立的存在，有完全獨立的價值。人的社會性（*sociality*）消失了；4 人與人的疏異。商品價值成為人的價值的指標和度量標準，人人把人視為商品，而不視為人，人性喪失了，異化由此產生。

前面我們提到，馬克斯大體接受黑格爾的哲學

，他只是不滿意黑格爾太強調意識層面的、唯心的辯證歷程，而忽略了對現實社會的分析。馬克斯要加入政治的、經濟的與社會的分析。馬克斯這個批判最後我們要來評價一下，目前我們還是多談一些馬克斯的異化說。

上段提出的異化的四個樣相，筆者以為用一個中心概念來說明，即社會性（*sociality*）。首先，勞動產品之所以異化於工人，是因為工人的產品是非社會的（*asocial*）。這個意思是說，工人的產品不是為他自己和他人。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說明所謂的社會性。若一個意識體沒有自我意識，則社會性根本不可能。但自我意識的形成需要他人的幫忙。「我」的概念是不可觸摸的，他人就像一面明鏡，依靠這面明鏡，我才能看到「我」。自我雖在客體化的過程中投射出去而成為客體，以做為認識的對象，但若沒有他人，就像沒有明鏡，我就看不到我一樣。所以人在本質上，在自我實現的歷程上，需要他人的存在來完成客體化的歷程。但他人也是一個自我意識體，不是物體，所以這種人與人的需要是相互的。同時他人也不僅像明鏡一樣是被動的。我們需要他人的存在，不是只像需要明鏡的存在一樣，明鏡只是一個比喻。他人是不是具有明鏡的反射效果，就得看他的意識狀態。最重要的意識狀態是他人的承認，看他是不是承認你是一個人。這個承認也是相互的。人人互相承認人人都是人，這就是社會性（*sociality*）。馬克斯同意這樣的說法，但他換成另外一種語氣來講同樣的觀念。若工人的勞動產品只是為了資本家，為了他人而不為自己，則在這樣的社會中只有工人對資本家的承認，工人承認資本家是人，資本家却不承認工人是人，因此工人的產品是非社會的，異化因而產生。

再回到黑格爾。要瞭解馬克斯的早期思想，若不瞭解黑格爾是不可能的。而晚期馬克斯哲學若無早期的人文主義做基礎，則馬克斯只是一個社會改革運動家，一個經濟學家，而不是深刻的哲學家。這是筆者主張研究青年馬克斯的部份原因，也是新馬克斯主義的精義之一。

黑格爾認為，人的需要的不斷發展，會導向滿足這些需要的方法的多樣性與分殊化。因此導向人及其世界的不斷改良與細緻化。越專精的勞動使個人越仰賴社會。分工的結果是獨立生活的不可能，

因此導向越來越增強的人的社會化。黑格爾說，起初人的需要無大異於動物的需要，不外乎基本的生物需要。但人的需要變得越來越精緻，人不再能僅靠自己的勞動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一個好社會就是一個完全社會化的社會，人人需要人人，但不只是在需要他人的生產品的層面上，因為生產品及勞動都是人的本質，因此這種人人間的相互需要是在人性層面的需要，人要把他人當做人來看待，他需要於他人的就是他人做為人這個主體。這又回到前面所說的人間的相互承認，這毫無疑問地包含了社會性這個概念。

其次，如果產品異化於勞動者，則生產活動過程本身也必定是異化的。所以第二個異化的樣相也包含了社會性的概念。第三個樣相是人異化於人做為一整個類。社會性的概念與種屬的概念是互相涵蘊的。在一個完全社會化的社會，人與人間的關係是靠著人本身來媒介，而不是靠物來做媒介，即人人把他人當做目的，而不當做手段。這證明了第四個異化的樣相也包含社會性。因此，在馬克斯的異化說中，核心概念便是社會性（sociality）。馬克斯說，做為一個人，我們都要在生產中肯定自己和他人。因此我們可以說，人的歷史就是人的社會化的增強史。在歷史過程中，「人要逐漸放棄一廂情願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人類的整個存在要變成社會的。」這個社會化的增強就是解放（liberation）的歷程。

對馬克斯而言，人的本質是人的存有（being）是一個種屬的存有（a species being）。Lobkowitz在批判馬克斯主義學者Hess時說，「Hess指出了自私性就是動物性，他也說明了馬克斯的種屬本質的概念，換言之，種屬的本質就是全面的社會合作，是人的潛能的終極實現。」但馬克斯在使用「本質」這一概念時，不是指超越歷史，一成不變的人性。馬克斯不同意有一成不變的人性。他所謂的本質是指人的潛能，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目的。

VI

總而言之，馬克斯對黑格爾的二點主要批判是：1 客體化不等於異化；2 黑格爾的唯心辯證不能解決異化問題。本文不擬討論這二個批判。許多學者認為馬克斯誤解了黑格爾，但這也超出本文的範圍。這節要談黑格爾和馬克斯的勞動概念。勞動概

念在二個人的異化理論中均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們大略地談一談。

因為黑格爾認為人的自我創化是一個歷程，客體化是物性的喪失，是異化和異化的克服，黑格爾把客體化的人看成人的勞動的成果。勞動和動物似的活動不同，後者僅僅消費物體。換言之，勞動不僅僅是物體的否定而已。勞動製造和改良事物。因此勞動的第一個樣相是人把自己從生物功能中抽離出來，離開了動物的王國。勞動是人藉以實現人性（humanity）的活動。

勞動的第二個樣相是社會性（sociality）。在自我意識的辯證歷程中，奴隸被迫為主人工作。因為奴隸怕丟腦袋，他只好屈服並為主人服務。因此勞動不單單是物理工作而已，也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因為奴隸的勞動是被迫的，因而是異化的根源。奴隸的勞動成果屬於主人，並且變成外物反過來壓迫他。如前所述，奴隸的勞動是非社會的，這個非社會性便是異化的原因。

基本上馬克斯同意這樣的說法。他認為黑格爾掌握到了勞動的真本質。前已討論過這點，不再重覆。但我們要問在何意義下，馬克斯說黑格爾只看到勞動的正面呢？他批判說，黑格爾只認識到抽象的心理勞動。這是什麼意思呢？筆者以為，馬克斯反對黑格爾以意識辯證來描述人的歷史，而不是以勞動的辯證來描述。馬克斯在手稿中一再重覆，黑格爾的意識辯證不能克服人的異化。馬克斯認為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是政治經濟學（指古典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產物。用黑格爾的唯心辯證來克服異化就好比用更好的待遇或平等的分配來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一樣。這是現代共產國家內，異化仍然存在的因素之一。

馬克斯責怪黑格爾忽略了勞動的負面，因為黑格爾沒有認識到勞動的異化。他只看到勞動創造歷史，人文化世界的一面，而忽視了勞動及其產品的疏異。所以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不能清楚地說明奴隸何以是歷史的最後勝利者，奴隸如何能勝利？勞動異化了，產品異化了，反過來壓迫奴隸，奴隸如何能克服這層層的異化？馬克斯看到了這個負面。歷史革命是需要來克服這層層的異化。沒有革命，奴隸的勝利只是思想上的勝利，自瀆性的勝利，主人還是痛快的很，馬克斯因此認為黑格爾的思想上的、意識層面的辯證無法真正克服異化。

VII

本文大略介紹了馬克斯的異化說。許多有價值的問題值得再討論，例如馬克斯如何批評黑格爾同一客體化和異化？黑格爾和馬克斯的勞動概念值得再探討；馬克斯如何用社會·經濟現象來談異化？分工的意義及完整的人（whole person）如何

完成？資本主義社會在歷史中的地位與意義等等。限於時間與篇幅，這些相干問題只好割愛。有機會的話，筆者希望再寫一篇續文，詳盡討論異化的問題。文中爲了通順與清潔，省略了註碼，引文也未註出處。若讀者有需要，可與編輯聯絡，筆者可奉送一份書目。

編註：

1 對「異化」理論的研究，在大陸哲學界中並無定論。根據“中國哲學年鑑1982年”對“研究進展”的綜合報導、評價異化理論在馬克斯主義哲學中的地位至少有下列幾種觀點：

- (1) 異化理論是青年馬克斯理論上尚不成熟的表現，因而不屬於馬克斯主義哲學理論體系的内容；
- (2) 異化概念是馬克斯早期著作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出發點，推動了馬克斯主義哲學的形成。以後馬克斯從哲學轉向經濟學，異化概念的作用已被取代。
- (3) 反對將異化理論與成熟的馬克斯主義理論對立起來。認為馬克斯的異化理論與黑格爾或費爾巴哈（FEUERBACH）不同，從經濟學的角度，環繞着異化勞動與私有制關係而賦予新內涵。

(4) 異化理論即使在馬克斯本人用法中也有一個演變過程。隨着馬克斯思想的發展、異化理論中的思辯性與人本主義因素還漸被克服。另外，異化理論雖然在馬克斯主義中是用來分析資本主義的問題，但兩、三年前也曾被應用來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即中國大陸社會）中所發生的問題。唯這方面的研究在最近中共“反對精神文明污染”中却遭到了官方的批判，主要的提倡者王若水並同時失去了在人民日報社的編輯要職。

2 新馬克斯主義者的定義不但明確。新馬克斯主義的興起，主要是由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左右重新發現一批馬克斯早年來發表的著作而引起的。這些著作中，異化問題是一個重點，也有相當人文主義的色彩。此與馬克斯後期著作（以「資本論」為代表）強調剩餘價值，階級分析不同。當時有些馬克斯主義者（特別是蘇聯官方理論家）認

為這些早期作品是唯心主義的，與後期作品不同，因而有「青年馬克斯」與「成熟馬克斯」之對立。新馬克斯主義者雖大體上重視這些早期作品，但並不全都主張前後連貫者。有人只接受早期人文主義主張而反對後期主張。另一方面，蘇聯以及中共以前看法亦不一致。他們誠然都接受後「成熟馬克斯」主義，但也有人認為前期主張與後期亦不對立。（見註1）

3 本文出現在手稿的「第三手稿」『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一章中。原文有多種譯本。為有助於讀者的閱讀，並根據審稿者的建議，以下附上一則中文譯文（錄自「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第163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

「因此，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後成果——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辯證法——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失去對象，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因而，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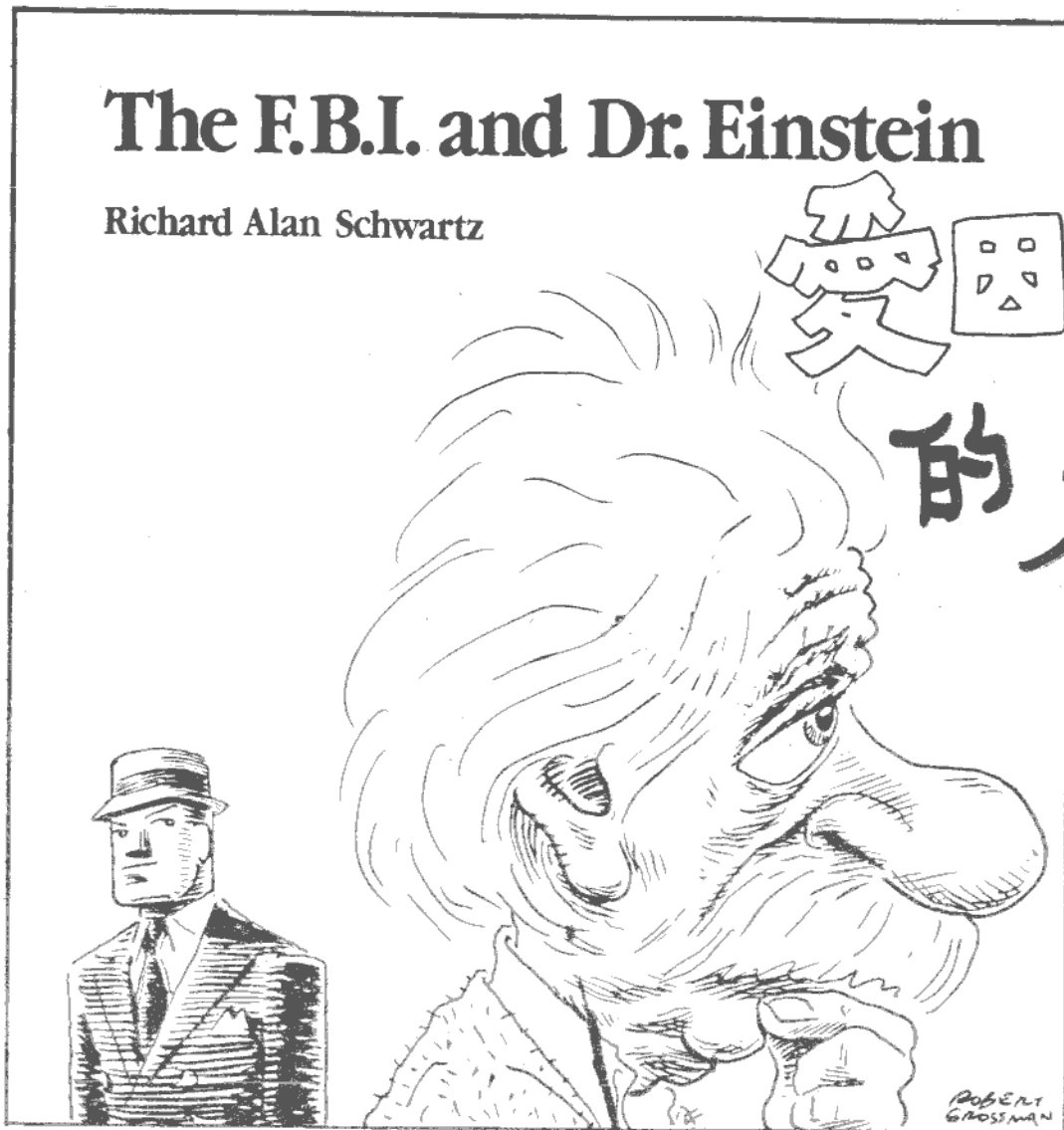
4 S. HOOK 反對「以異化解釋馬克斯哲學」的理由，只是眾多反對者之一種。他所持的理由——即，異化概念源自宗教，而馬克斯是反宗教的——也不為多數反對者所接受。因為一個概念被借用，在新的應用對象中注入新內涵，賦予新內容是常有的事。馬克斯提倡的「辯證法」（DIALECTICS）」這個概念，便是源自古希臘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又經黑格爾注入許多新意。馬克斯借用這個概念時，又將黑格爾的內容「頭腳顛倒」過來。但人們並不因它源自馬克斯所批判的柏拉圖哲學（和黑格爾哲學）而否定「辯證」概念在馬克斯哲學中的地位。

The F.B.I. and Dr. Einstein

Richard Alan Schwartz

愛因斯坦 的另一面

—信英—



一九八三年九月，美國的國家雜誌（*THE NATION*）刊出了一篇文章：“美國聯邦調查局與愛因斯坦博士”。文章揭露舉世聞名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博士，生前也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打了一千五百頁的小報告，密告他在主持一個諜報網，作為主腦去策動共產黨員佔領好萊塢，或密告他發明一種神秘射線，等等。

愛因斯坦也被特務打小報告，不禁令人感嘆萬千。那些名氣較小的人，其處境當然就要困難多了。例如化學家鮑林（*LINUS PAULING*，曾獲兩次諾貝爾獎），物理學家歐本海默（二十世紀美國物理學興起的第一大功臣，曾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所長，當時愛因斯坦便在這個所當教授），喜劇電影演員卓別林（*C. CHAPLIN*）等等，在五〇

年代初期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美國特務機關的騷擾，禁止出入境，干涉學術研究，等等。

五〇年代的美國，特別在所謂的麥卡錫時代（*MC CARTHY*），是被人稱為美國二十世紀的黑暗時代。當時美國反共氣氛高漲，磨刀霍霍地準備和蘇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任何人主張和平或較不反共者，都被列入可疑份子，而受到監視。愛因斯坦等人便在這個時期受「盯」上了。

當然，空穴不會來風。對愛因斯坦來講，他除了人們熟知的科學家身份之外，還同時是一個不懈的和平主義者及一個社會主義者。他雖然沒有非法活動，但這些個人見解導致他受監視。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愛因斯坦便在德國積極反對戰爭，反對歧視法國人。在戰爭中德國仇法氣氛濃厚的環境下，愛因斯坦這種“反動”言論是要多大的勇氣啊！

此後，也在各種場合，總是儘可能地提倡和平主義、反對戰爭。他特別痛恨軍事訓練。除了因為那是作為戰爭的工具之外，還因為軍訓要求絕對服從，不許有思想意志。這種把人當作工具，在愛因斯坦看來，是最缺乏人性的。

愛因斯坦在晚年，更加致力於反戰工作。特別是他寫了那封有名的致美國羅斯福總統的信。這封信促使了羅斯福總統決心發展原子彈，並投射在日本。愛因斯坦事後極為後悔，他曾說：「如果我知道德國並不會造出原子彈，我就不會寫那封信」。因此，他更致力於消滅原子彈的呼籲。他曾提議設立一個超國家的機構，用來監視地球上的所有原子武器。當然，他的努力還是抵不住美、蘇兩強為了爭霸世界而瘋狂發展核子武器的作法。

除了反戰之外，愛因斯坦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大學時代的愛因斯坦在瑞士的蘇黎世求學。這個貌似世外桃源的瑞士城市，其時正是歐洲一切進步思想與革命理論的搖籃地。二十世紀初期許多著名的革命領袖，如德國的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ERG*，俄國的普列漢諾夫 *PLEKHANOV*，列寧（*LENIN*），以色列首任總理魏滋曼（*W. WEIZMANN*）等等都前後在此留學過。和愛因斯坦同校同系而晚兩屆兼密友的阿德勒（*F. ADLER*）後來便成為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即馬克斯主義政黨）的領袖。

愛因斯坦在此氣氛下，耳濡目染，也就成為一

個社會主義的主張者。他盛讚列寧革命的成就，為他馬克斯主義者好友阿德勒挺身而出法庭作證。當他聽到羅莎·盧森堡被德國極右份子暗殺時，他十分難過，並推崇羅莎是人類中的完人，德國實在不配有這樣的偉人（*SHE IS TOO GOOD FOR GERMAN*）。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目睹各帝國主義國家變本加厲地對外擴張、侵略、奴役各國人民、威脅世界和平。因而他以當時正無比崇高的學術地位，毅然出任「世界反帝大同盟」的主席。

愛因斯坦對列寧的革命曾寄予厚望。後來史大林排除異己，曾使愛因斯坦十分失望。然而，終其一生，愛因斯坦未曾表示喪失對社會主義的信心。一九四九年，美國一份獨立性的社會主義刊物“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創刊了。創刊號上第一篇文章赫然便是愛因斯坦寫的：“為什麼要社會主義”（*WHY SOCIALISM*）（編按：參見本期譯文）。這時距他去世，只有五、六年光景。說明愛因斯坦直至晚年，即使目睹蘇聯的變化、受了各種人身迫害，仍不改其對社會主義的肯定看法。

美國科學社會學者 *L. FEUER* 曾對二十世紀主要科學家作科學社會學的研究。他發現，具有原創力的大科學家，都與他生長時期社會環境的思想有關。科學家的理論，以及科學家之所以能有這些理論創見，並不是那麼超然地純學術性地出現，而是深受那些社會中流行的思想所影響。例如大物理學家波爾（*N. BOHR*）便深受齊克果（*KIERKEGAARD, S*）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所以才會有互補原理及哥本哈根學派的出現，第·波格里（*DE BROGLIE*）則受柏爾森（*H. BERGSON*）生命哲學的影響而提出物質波的概念，等等。而愛因斯坦則深受馬克斯等社會主義與革命理論的影響。愛因斯坦在科學上的革命性創見，也不是純科學地產生的。愛因斯坦中年之後，思想漸受斯畢諾沙的影響（*SPINOZA*），有較多唯理論（*RATIONALISM*）的傾向。論者有謂這與他中年之後堅持不成功的統一場論研究有關，唯此非本文重點，在此略過不提。

愛因斯坦既有這等左派正義言行與社會主義思想，當然是美國特務份子不會放過的對象。幸好愛因斯坦的名氣太大了，才未遭受倒霉的事。和當時許多受迫害的人相比，愛因斯坦算是最幸運的一個了。

為什麼 要社會主義？

愛因斯坦 作
思 餘 譯

一個人若不是經濟或社會問題的專家，他對社會主義的見解會不會有價值？我可以舉出幾個理由來肯定這個答覆。

先從科學知識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僅就方法論而言，天文學與經濟學的差別可能並不大。兩者都只從現有的現象中歸納出一個定理，反過頭來希望這定理能講清楚地解釋種種現象，但事實上他們用的方法還是有點不同的。在經濟領域裏，有太多的因素不能個別測量估計，因此要想找個定理出來要困難得多。再說自人類文明以來，我們所累積的經驗並不能純粹是經濟性的，譬如很多歷史的發展源自“征服”。征服者在被征服國家中成了法律上、經濟上的特權階級。他們獨享了所有的土地，在自己人當中分派神職，這些宗教僧侶經由教育體系，確立了社會階級化的永久制度，建立了一套價值觀，使人們不自覺地遵守他們所該有的社會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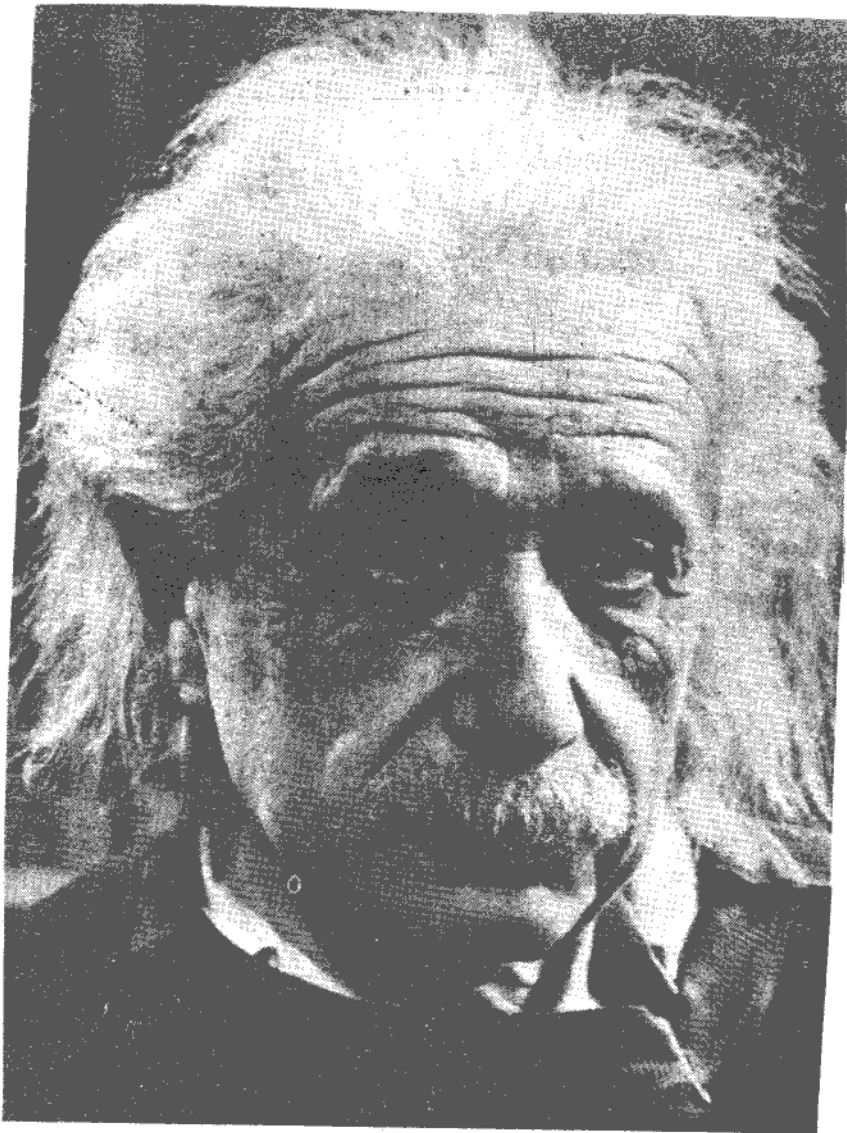
但歷史傳統已成過去，人類的發展似乎不曾脫離索斯坦·威柏林 (THORSET IN VEBLEN) 所謂的“掠奪階段”。觀察到的經濟現象仍屬於那個階段

，由他們所引出來的定理也因此不能用來解釋別的階段，社會主義的目的正是希望人類的發展能進步而超越現有的“掠奪”局面，目前的經濟學對了解實在沒什麼幫助。

其次呢！社會主義是要走向社會倫性的最高境界。科學不僅不能創造那個境界，也不能把那種境界灌輸進人的腦裏，最多只能提設一些方法來達到某些境界，但這些終極目標是由些懷有崇高道德理想的人士孕育出來的一如果這些目標不是胎死腹中，而能充滿了活力與精神一則將由半覺醒的大眾吸收與實踐而帶動了社會緩慢的進化。

所以，在處理人類的問題時，我們要小心，別過份倚賴科學方法。也不能認為只有專家才能對社會問題提出他們的意見。

最近常聽人說，人類社會正遇到一個大危機，嚴重影響社會的基本穩定，特徵是：個人對他所屬的團體漠不關心，甚至仇視。我舉一段個人經歷來說明。最近我和一位通達伯爾文的朋友談論下次大戰的威脅，我怕另一次大戰會危及全人類的生存，



因此我認爲要設立一個超國家的組織，才能避免這個危險。這時我的朋友用一種平靜而冷冷的口吻對我說：「爲什麼你這麼反對把人類消滅掉？」

我相信一個世紀前，決不會有人說出這種話。說這種話的人，內心一定經過了種種奮鬥掙扎無效後終告絕望。這顯示一種痛苦的孤立。在這時代，爲這種孤獨煎熬的人真不知有多少！爲什麼會這樣？有沒有解決辦法？

提這種問題容易，但要回答就不容易，以下我儘可能試了。雖然我知道，我們的感覺和奮鬥常常是模糊而充滿矛盾，不可能簡單地用一條公式表示。

人，一方面是獨立的個體，另一方面又是社會的一份子。作爲一個獨立個體，他會保護自己及最親近人的生命，他要滿足慾望，發展才能。作爲社會的一份子，他需要周圍同伴的認可與感情，和他們

分享痛苦與快樂，要增進大家生活的條件。這些不同而時常相互矛盾的慾望塑成了一個人的個性，進而決定了一個人尋求自我平衡的程度與他對社會所能做的貢獻。不過人格的最後形成大部份取決於一個人發展時期的環境，他成長的社會結構、傳統及對各種行爲的好惡，「社會」對個人來說，及是他與同代及前幾代人之間間接與直接的關係，個人可以獨立思想、感覺、奮鬥、工作，但不論在肉體上、精神上、感情上、他仍深深附托於社會。我們幾乎無法撇開社會來談論或了解一個個人。社會供給了個人食物、衣着、住宿、生產工具、語言、思想形式，思想內容。個人的生存是經由無數過去及現在人類的努力與成就所賦予的，我們就稱這些無數的人“社會”。

所以這是再明白不過了，人對社會的依賴性原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就像螞蟻、蜜蜂一樣，不過螞蟻及蜜蜂的生活形式原出於本能，而人類的社會形態却是多變的。人類有記憶力、組合力、又能用口語傳達消息、思想，使得他們的發展超出了生物的需求。他們的發展顯現於傳統、制度與組織；也顯示於文學、科學、工程學及藝術，這解釋了經由人的努力，他多少可以影響他自己的生活的，而在這個過程中，自覺的思考與希求可以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人類經由遺傳，一生下來即擁有了固定的生物本質，像自然慾望等等，都是不可改變的。而在一生當中，經由與他人溝通或其他別的影響，他又接納了社會給他的一套文化。就是這套文化經過時間的淘汰，是可能會改變的，也因而決定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現代人類學對原始文化做了比較、調查，發現文化形態及社會組織對人類的社會行爲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可以說，人類並不受限於他們的生物本質，而命定互相消滅，或終得自作自受。基於這個認識，人們才有信心經由互助來改善人類的命運。

要改進社會結構與文化姿態，使人類生活滿意，我們要注意，有些是無法改造的。例如人的生物本質，還有科技的成就及人口的增殖，也是既存的事實。地球只有這麼大，而生息的人口如此多，於是極度的分工以及生產工具的商業集中成爲必要。以前那種老死不相往來，完全自給自足的社會是行不通的。把地球看成一個生產—消費的整體，這種

看法已不算過份誇張。

這就觸及前面所提，現代人類危機的本質了。這個危機的本質涉及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現代人入都已自覺到他對社會的依賴性，但他不會感覺到這個依賴性的正面價值，不會看作是有機體式的關係，當作保衛個人的一種力量。相反地，他只覺得這種依賴性是一種威脅，會危害他的自然權利，甚至他的經濟命脈。

而且，他在社會中的位置，使他自私自利的性格受到鼓勵；他的服務社會心——這本來就比較微弱——則日漸退化墮落。任何人，不管他在社會上位置如何，都不斷地遭受這種墮落。不知不覺地，每個人都變成他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奴隸；不安全，孤獨，同時享受不到天然，簡單而純樸生活的樂趣。一個人如要找到生命的意義，唯有獻身去服務社會。

在我看來，上述罪惡的真正根源，在於現行資本主義社會的放任經濟。在這個社會裡，一大群生產者不斷地互相剝奪別人生產的果實——不是用武力，而是用一些合法的法律規則。在這兒，我們要認清楚，生產工具（包括所有生產設備及資金，物質）可以被私人合法地擁有。事實上大部份也正式如此。

為簡單起見，以下用“工人”代表所有不能分享生產工具所有權的人。佔有生產工具的人，他們在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工人的生產成果，就逐漸轉變成資本家的財產。這過程的重點是工人生產的價值和他所受的待遇是否平衡。只要勞資的合同是“自由”的，則工人的薪水便不會根據他生產的價值來付給，而是按工人生活的最低需求，以及資本家對工人需要的程度，還有工人求職的競爭程度等來決定。要特別注意：即使理論上，工人的薪水也不是由他生產的價值來決定。

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再加上科技的進步和分工的精細（因而生產的單位就愈來愈大），私人資本就愈形集中，這樣發展的結果，便造成資本家的寡頭政治。因為他們擁有太大的權力，因此即使在民主政治體系的社會，也不能有效的來制衡它。因為立法代表都由政黨選出，資本家就透過金錢或其它方式來影響政黨。為了資本家現實的目的地，他們總會把立法代表從選民隔開。因此這些代表們在事實上，無法充分保護多數受剝削老百姓的利益。

更厲害的是，利用各種條件，私人資本家都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各種訊息來源（包括出版，廣播，教育）。因此一個普通市民要得到客觀的結論，正確的行使他的政治權利，是極度困難的。在多數情況下，事實上都是完全辦不到的。

因此在私有資本制度下的社會，有兩個特性：
1 生產工具私有。私有者就按自己的利益來生產；
2 勞資合同是自由的。當然，天下沒有百分之百的這種純資本主義社會。而且經過工人們長期的政治奮鬥，“自由勞資合同”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改善。但整個來說，今天的經濟制度實在和“純”資本主義相差無幾。

生產既為利潤，而非使用，因此有能力而願工作的人就未必會找到事。結果總有一群人失業，所以工人永遠在失業的威脅下。又因失業或低收入的人，賣給他們的市場商品賺不了什麼錢，適合他們的貨品便大受限制，於是他們的生活愈形窘困。科技的進展，應該是為了減輕人們操作的勞累，但結果往往引起更多人的失業。追求利潤，加上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造成了資本集中及應用不穩定的現象。惡性競爭不但引起勞力的大量的浪費，更引起前面說過個人的社會良心的墮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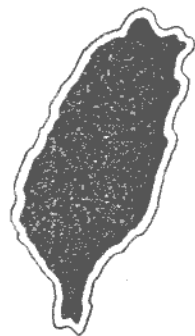
這種個人的墮落，我認為是資本主義萬惡中惡性最重大者。我們整個教育體系也逐漸被這惡魔所侵。學生被教育去惡性競爭，去崇拜成功。好讓他們出社會中能生存下去。

我相信只有一條路可以斬盡這些惡魔，就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配合上一套以服務社會為目標的教育體系。在這個制度之下，生產工具由社會所公有，有計劃的使用。計劃經濟就是根據社會的需要來生產，就會把工作分配給所有有能力且願工作的人。產品也能照顧到所有的人，不論男女老幼。至於教育，除了增進他們的職業技能外，主要應當用來發展每個人的社會良心和責任感。不要像今天的情形，用來歌頌權利與成功。

但要注意：計劃經濟並非就是社會主義。倘若只有計劃經濟，很可能把個人淪為社會的奴隸。要達到社會主義的境界，還得能解決一個極為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當政治與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時，如何去防止有權有勢者的官僚化？如何保衛個人的權力？如何實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以對抗官僚化？

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并試論如何正確地認識
日人治台史（中）



戴國輝 原作
林真理 改譯

一九八三年五、六月間，台灣的黨外刊物間曾發生過一個小型的論戰。論戰的起源是「生根」第八期的一篇文章「後藤新平」。這篇文章的作者及該刊編者將日據時代台灣的一個統治者後藤新平視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引起了台灣一些反帝國主義者的批判。

批判的角度着重在反對該文認賊為父，但對於台灣現代化的問題則並未深加探討。剛好台灣史學者戴國輝先生七月初來芝加哥，在本會的夏令營討論會中談到此事。戴先生遠在十多年前便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當時日本學術界也普遍認為台灣的

現代化是日據時代日本統治者奠定的。戴先生以嚴謹的學術研究，發現在日本佔據台灣之前，台灣已有相當現代化的基礎。戴先生這個研究成果，剛好彌補了台灣「現代化」論戰的不足，特此推薦給讀者。

本文原文為日文，刊於「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三卷，勁草書房，一九七〇年。譯者林真理按語說：「它曾經給日本學界以及在日留學生界帶來過不小的衝擊。論文雖成文於一九六七年，它具有的創見，在當前的台灣仍有深遠的意義。」本文雖已有譯文，但譯得不理想，流傳亦不廣，因而重新改譯，並得戴先生贊同，加上若干新材料。

上期刊出「前言」及「台灣開發小史」。「前言」深入討論了如何認識日人治台史，反應了戴先生史識與史觀。「台灣開發史」則作為主題「洋務運動在台的背景」的第一部份，主要以社會經濟史學的觀點和方法來整理台灣的開發史。本期繼續介紹「洋務運動在台的背景」第二部份，集中討論晚清台灣的經濟發展。讀者將看到，遠在日據台灣之前而且遠在清朝在台灣推行洋務運動之前，台灣已有相當高度的經濟成長，有十分可觀的資金累積。這是洋務運動在中國大陸失敗而在台灣成功的基本原因。戴先生更進一步地分析洋務運動前夕，台灣的經濟基礎所以較優於內地的社會因素，讓我們對這問題有一較全盤的認識。

——編者識

一、洋務運動在台的背景

2、晚清的台灣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歐美資本主義列強，進一步地加強了它們對世界「落後」地域（套一句今天的詞彙則為「第三世界」）的瓜分，進行殖民式的野蠻、侵略、擴張主義行徑。

帝國主義開始垂涎台灣

中國已變成它們下手的目標，台灣當然地亦被捲入漩渦之中。僅僅列舉其較為顯目的行徑，就有如下不少事件的相繼發生。

1：鴉片戰爭（1840年）之際，英軍為了牽制清軍，出兵派艦在台灣近海游弋。

2：1854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M. C. PERRY）派軍艦至雞籠（今基隆），測量港口並調查煤礦。事後根據調查報告，積極建議華盛頓當局佔領雞籠，以確保有關美國船艦的補給（煤、食品、用水等等）基地。

3：1858年，根據天津條約清朝被迫開放台灣府（當時，包括台南和安平）與淡水為通商口岸。

4：1860年，普魯士船向南部台灣山胞部

落砲擊。

5：1863年，清朝被迫增開打狗（高雄）、雞籠（基隆）為通商口岸。

6：1867年，美國軍艦砲擊並侵攻南部台灣山胞部落。

7：1869年，駐台英國人商行因買賣樟腦同清朝官吏發生衝突（一般稱為「樟腦紛爭」），英艦無理砲擊安平，要挾爭取貿易上的優勢。

8：1874年，日本明治政府發動所謂「牡丹社」〈現高雄縣境〉討伐出兵事件，向清朝示威並藉口要挾清朝承認其吞併琉球為合法。

9：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完成吞併琉球王國的國內行政手續，適用所謂「廢藩置縣制於琉球，創置沖繩縣，終於把琉球列島強制完全編入日本勢力圈內。

10：1884年，中法戰爭之際，法國艦隊侵襲並封鎖雞籠、淡水及澎湖島等港口，藉以牽制清軍。（註16）

從「亂自内生」到「亂自外至」的台灣

上述一連串的外來威脅事件，逼迫清廷有關當

局不得不加深其對「邊陲之地」台灣的認識。也就是說，清朝被迫檢討地當東南七省門戶要衝重地台灣，其在國防上所佔地位的重要性。並迫使清朝修正其傳統治台基本方針——一向由「亂自內生，鮮有外至」的認識而策定成的「以防台而治台」方針，且為了適應「亂自外至」的新情勢而不得不轉趨且採取「以防外患而治台」的新方針。

新方針在政策實踐中，最具體且最集中的表現，乃是在台建省（自福建省獨立，另成一省），和派任具有開明幹練之稱的劉銘傳為台灣巡撫，並委劉在台力推洋務運動。

未闡明在台洋務運動的實貌以前，我們似乎有必要略述當年的台灣產業經濟概況。

當年，台灣產業的中心在於農業，自不待言。台灣農民以七五萬甲的耕地面積作為基礎（1941年的全耕地面積約為八九萬甲（註17），值得我們憶起藉資參照），大大地發展他們的稻作以及蔗作和植茶等等的商品作物農業。

鴉片戰爭前的台灣稻作

稻作的豐盛，誠如巡視台灣御史黃叔瓚載云：「三縣（1684~1722年期間的台灣行政區劃只有台灣〈現台南一帶〉、鳳山〈現高雄一帶〉、諸羅〈現嘉義一帶〉三縣，其他地區尚未成縣）皆稱沃壤……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並可資贍內地，居民止知逐利，肩販舟載，不盡不休，所以戶鮮蓋藏。」（註18），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台灣（請留意，只限於南部西海沿岸原的三縣），已有相當多量的餘米可接濟對岸大陸。（國內間交易我們名為移出入，國際間交易我們稱為輸出入，以便區分）。

其後，開山闢墾更加進展，除正規的移出及「走私」之外，乾隆以迄嘉慶年間，每年移出被稱為「台運」的軍用米（包括軍眷用米）約為十萬石。到了道光年間，復受官府命令增額至十四萬石向天津移出（註19）。

鴉片戰爭後影響台灣經濟

可是，鴉片戰爭後，因大陸的市場秩序。「台米」因競爭而跌價，遭受嚴重打擊，遂使台灣農村

呈現「豐作但滯銷」的不景市況。

類似景況，可透過當年身任台灣府學教諭席的劉家謀所述：「台地糖米之地，近濟東南，遠資西北……嗚喇（英國人）販呂宋諸夷米入於中國，台米亦多賤售。商為虧本而歇業，農為虧本而賣田，民愈無耶賴矣（註20）。」而窺知其一斑。

鴉片戰爭對台影響所及，不止於搶奪了「台米」在大陸的市場，另外還讓「不速之客」鴉片擁進來台。鴉片的大量進口，必然地導致台灣經濟在貿易收支平衡上失調，逐漸造成台灣經濟的混亂。

自1847年到1854年，就任台灣兵備道的徐宗幹即曾嘆謂「銀日以少，穀日多。銀何以日少？洋烟愈甚也。穀何以日多？洋米愈賤也。……米穀不流通，月積日多，望豐年乎？歉更甚矣，抑待歉年乎？賤如故也。蓋內地食洋米而不食台米也。不食台米，則台米無去處，而無內渡之米船。無內渡之米船，即無外來之貨船。往年春夏，外來洋元數十萬（註21）。」，我們後人當可藉以上徐言，為當年台灣經濟困境之一個見證。

在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下，中國傳統經濟逐漸走上解體及崩潰之路，確是眾人皆知的史實。台灣的稻作經營當然難免受其波及。然而，對稻作經濟的「外來災禍」却因台灣的特殊條件，它可受而無愧地，轉變為新的「刺激因素」逐漸發揮它的獨特功能。

台灣諸島與對岸大陸，因間介有台灣海峽之故，本來就具有妨礙大陸與台灣諸島經濟結為一個整體，使其經濟動態成為高效率的有機體的先天「負因」。特別在中國國民經濟尚為成熟，交通工具未現代化的道光年間前的清朝期為然。

通商口岸的開放，一方面給台灣稻作經濟帶來不利，但另一方面，却給台灣的茶業和樟腦打通了進軍世界市場的新道路。茶葉和樟腦的外銷多利，遂吸引家境瀕臨破產的華南農民和一些已定居於台灣的漢族系移民直奔台灣中，北部幹活。大大地展開「處女林」製造樟腦，開墾丘陵地種植茶樹以振興茶業，發揮他們的「開拓者精神」，導致日後「台灣烏龍茶」和「台灣樟腦」名振歐美的盛況。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開拓者精神」却惹起並記錄了台灣史的另一面。則，漢族系人物慣稱為「蕃害」或「出草」，令有心人內疚且不堪回首的一些歷史「負面」。高山諸族——這一個時期，其中心

爲泰雅族一一的行爲，該定位爲抗漢入山義舉才夠公正。我們漢族再也不該一味地墨守成規，夜郎自大地總括數其反漢人行爲爲野蠻暴虐。這一點，真值得我們漢人們常爲自己警惕和自我反省的。

其結果，台灣中、北部茶葉與樟腦的生產大有發展，不但使1865~69年間的貿易（包括輸出入口和移出入口）赤字逐漸減少，並且自1872年以後直至「割台」當年均能維持出超局面（註22）。

話題歸回稻米生產的檢討上來，我們當前並無足夠資料可資推斷劉銘傳時代的稻米產量。不過若據「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台灣總督府爲了調查台灣風俗習慣而所組織的調查研究機構）報告所云：「米產量雖不知其詳，惟當時除正供十九萬餘日石（日本量穀單位，值一八〇公升）上繳官庫外，移進大陸的平糶米、軍糧及軍眷米等亦約與正供數量相當。此外，從打狗、鹿港、尤其是淡水等港口以「商品米」輸（該爲移）出之數量亦不少，足見其產米量決不少於今日。」（註23）

由此我們亦可推斷其產量已達到甚爲高，幾乎不需存疑。至於文中所謂「今日」當指明治三十四年~明治三十七年（1901~1904年）（註24），故即使以產量最低的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因抗日侵台戰事，兵荒馬亂，百姓難於安居樂業必然地影響產量低落，斯年尚未回復正常。）立爲推斷基準年，斯年稻穀產量亦已達約爲四百三十萬日石（註25）的可觀數目。一般而言，每人一年平均所需的糙米量爲一日石，若將稻穀以77%的碾米比率換成糙米來計算的話，上述產量可折爲三百三十萬日石的糙米量。這個數目，不但可供二百五十五萬人口充分消費外，顯然尚且保有充裕的輸、移出力於後。

蔗糖是日本垂涎台灣的經濟理由

台灣的第二種主要農作物、甘蔗在國際與國內商場受到重視，可說較比稻米還要早。自十七世紀三十年代起，台產蔗糖即不斷地向日本及波斯等國輸往銷售。十八世紀初葉，造糖生產方式已漸趨手工工廠制（MANUFACTURE）而開展（註26）。

到了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也就是雍正年間，自對岸大陸來台的商船日漸頻繁，加上「郊」（在台灣

的商人、商業資本所形成的同業組合）的成立，更促進了蔗糖向大陸的移出，同時促成大陸同台灣往還的商船陸續不斷（註27）。

就劉銘傳到任台灣巡撫的前五年的統計，來研討並推斷蔗糖的年平均產量，我們可得五年間（1880~1884年）的年平均爲八千三百萬斤（註28）。若再加上在台消費推計量的話，其總產量大約相當於一億日斤（1日斤等於600公克）。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全國所輸入的各種蔗糖量爲二億四千萬日斤，爲它得支付一千二百萬圓的外匯（當年日本政府叫它爲「正貨」，可與同值黃金兌現的貨幣）（註29）。由此觀之，當時日本廟堂所以垂涎台灣的經濟理由亦甚爲明顯（註30）。

茶業繁榮了北部台灣

我們下面得談一談，台灣的第三位主要農產物的茶葉生產。茶樹，其實很早就栽植於台灣北部。據十八世紀二十年來的記載，在水沙連（現在的淡水附近）一帶茶樹繁茂，每年通事與各「蕃」（指高山諸族的各部落）協議，入山焙製（註31）。再至嘉慶年間，有名爲柯朝者引進福建產茶名地武夷的茶樹苗，栽植於鯨魚坑（石碇堡）一帶，因土質、氣候合適，栽培得法，非常成功。至道光年間（1821~1850年），已發展到有力向大陸移出的成就（註32）。其後，根據天津條約淡水亦被逼開放爲通商口岸，來到北西部台灣的，不管其爲國人商家或外國商人，當然不會放過向北部台灣的重要特產——茶葉和樟腦打主意謀大利的機會。因樟腦及茶葉生產的更進一步的被重視，促進了漢族系開拓農民除了向北西部台灣的「邊境」地區繼續「進軍」外，還伸向北東部一帶，一向爲高山諸族所佔據的「處女林」，揮其刀斧闢山開墾。他們一方面製造樟腦，另一方面栽植茶樹並且種植稻米以期樹立自給自足的開墾農家經濟。

同治4年（1865年），英商約翰杜德（JHON DODD）在考察樟腦產地實況時，發見北部台灣適於栽植茶樹，乃自福建安溪引進茶樹苗，以預貸資金予開墾農戶之方式鼓勵農民種植，以備謀外銷茶葉的大利於日後。杜德除了在農耕栽植過程假藉預貸來控制原料外，他亦在艋舺街（今萬華

開設茶葉精製工廠，由已掌握焙製、精製茶葉工程並對外銷美國，開拓新市場下了不少功夫。結果他獲得了大利，「台灣產茶」因而揚名於世界，並樹立了「台茶」在國際市場的地位。（註33）

茶業盛況及其利潤之大，可由光緒初年身任台灣道的夏獻綸，致其上司福建巡撫之報告中略窺其一端。夏文述道：「淡水之種茶也，始於同治初年，嗣洋商有到該處販賣出洋者，茶價驟高，農民趨之，競植以爲利，所以海隅片土，市樓買船日聚月增。……傳聞種茶萬株，工本百金，三年以後，一歲所採，便足抵之，其利甚厚。台北千巖萬壑，居民寥寥，誰非曠壤？或招民佃種，或僱工種墾，行古官焙之法，取息裕餉，其利當倍於屯田。（註34）」。

我們仍然可以依據劉銘傳到任台灣巡撫以前五年的統計，來算出茶葉年平均的輸、移出量爲一千二百六十萬磅。當年一洋担（133磅）約值流通於淡水交易市場之銀元三六元，故其總輸、移出額將相當於三百二十萬銀元。此外，包種茶的輸、移出在1886年，約可計爲七十七萬磅，其後不斷增加，到了1894年也就是被「割台」之前一年，其量則大增爲二百三十萬磅（註35）。由這些數字，我們不難推出，晚清年間的台灣茶業亦頗爲興盛。

台灣是世界最大的樟腦產地

除上述的農產品之外，我們得對林產加工品中之一的樟腦，加上特別的留意。

在化學合成「樟腦」未被發明製造以前，台灣乃是衆人皆知的世界最大的樟腦產地。由於羊毛紡織工業的興起引發「防蟲藥劑」的大量需要，樟腦除了另有醫藥用途外，還可成爲當年正在興起的賽璐珞（CELLULOID）工業之原料，故歐美的市場需要與年俱增。台灣未正式向外國開有通商口岸之前，英商早已透過走私方式輸進鴉片，換取蔗糖和樟腦，貪圖暴利。台灣島，有了對外開放通商口岸之後，北部台灣尤其是淡水，很快地變爲外商雲集，被極從事樟腦貿易之中心港口。不過，樟腦交易的利潤特高，常常惹起有關樟腦交易之糾紛。樟腦交易糾紛，不但在民與民之間、民間與官方之間、官方與外商之間也不例外地且不斷地發生。日後，

爲抵抗「割台」而成立的「台灣民主國」之要員，林朝棟道員就是依靠樟腦發跡的典型人物之一。

由於，高山諸族常常發動抵抗漢族入山軍事行動，山地的「治安」不但難於保持，「安寧」的生產秩序亦不易持續因而樟腦的年量變動頗大，輸、移出量當然亦是變化無常。

1880年輸、移出量有一百六十萬磅，約值十五萬銀元。到了1894年則增爲約六百八十萬磅，約值二百十萬日圓。我們可據日方統計得知同一年（1894年）的日本樟腦的輸出量只有台灣的一半以下之二百八十萬磅，僅僅幫了日本當局賺取一百萬日幣而已。

因樟樹在世界上的分佈已相當有限，故樟腦產地亦必然地形成局限於華南、台灣及日本（註36）三地域的山地。但華南，日本的山地開發已快達到極限，反而把仍然存有原始樟林的小島台灣突出爲世界樟腦的名產地。台灣樟腦遂揚名於世界且誘引了不少外商來台謀利。

樟腦產量不定且有限，加以其用途日廣（不僅可造高效能的防蟲藥劑和用途極廣的賽璐珞外，樟腦的用途後來擴大到製造無煙火柴及煙火不可或缺的材料），故若能控制樟腦生產於台灣，獲利當然甚大。尤其是中北部深山還蘊藏着尚未被「開發」且甚爲豐富的森林資源，當然包括有樟樹的「處女林」，有何理由不叫樟腦出產國家的日本人，熟知世界樟腦行情的日本商人不垂涎萬丈？

洋務運動前台灣資本累積已甚可觀

試觀，日本在甲午戰爭前一年，也就是1893年的年間總出口金額，僅僅只有九千萬圓。反而觀我們台灣同一年的總出口金額則已有九百四十五萬海關兩，若以當年的海關兩與日圓的換算率（1兩比1.54圓）來折算，區區台灣小島則已有一千四百萬日圓（註37）的可觀出口金額。

上述台灣的外匯賺取潛力，就「晚到」的後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累積尚且不充分的日本帝國的國家立場來看，已揚名於世界，賺取外匯的能力並不壞的台灣茶葉與台灣樟腦業，當然和台灣糖業一樣地，將對日本人具有莫大的魅力，是不待言的。

此外，早受英美等國家注意的雞籠煤礦等，有關礦產方面的情況如何，留待下節敘述。

至於實施洋務運動是需要財源的。台灣若是，真正的「化外之地」，或只不過是「生蕃之荒島」的話，毫無疑問，清朝實權派是不會亦不可能在台灣謀其洋務運動之開展的。台灣第一任巡撫，劉銘傳在台灣社會經濟層面所實施的新政——「清賦」、

敷設電信網、修築鐵路以及「撫蕃」等等一一，其主要目的當然是在於開創財源，以補回已經投下之資金。另外亦意圖振興台灣經濟，使「乳牛」台灣更富庶，以便多謀田賦稅捐等等收入，好充當防務「原資」。取於台灣，用於台灣，本來就是劉銘傳一統的原始願望。

註：

16. 參照吉國藤吉譯，『台灣島史』，一四七～一五〇頁。
17. 台灣總督府農商務局編『台灣農業年報』，（一九四三年版）四頁。
18. 黃叔璥撰『台灣使槎錄』（台灣文獻叢刊第四種）之「物產」，五一頁。
19. 參閱前引『清代台灣經濟史』，（同註12）三六頁。
20. 劉家謀撰、吳守禮校『校注海音詩全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七頁。成書於一八五五（咸豐五年）年，其詩作於一八五一年，故大致可以說是描述四〇年代末年之事吧！
21. 徐宗幹撰『斯末信齋文編』（台灣文獻叢刊第八七種），「請籌議積儲」六六～六七頁。
22. 參照東嘉生著『台灣經濟史研究』三五二～三五三頁之表。
23.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一二頁。
24. 根據上引書（同上註23）之敘言（一～二頁）：本調查是根據明治三四（一九〇一）年十月廿五日之勅命而公佈該調查會規則，於明治三七（一九〇四）年四月中止調查，故以此推測。
25. 『台灣總督府第五統計書』四一〇頁。
26. 參照，前引『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同上註5），一六三～一六六頁。
27. 前引『台灣經濟史研究』（同上註22），三〇四～三〇五頁。
28. 根據 J.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57 之表“SUGAR EXPORT STATISTICS”。本文所引數字將其英磅換算為日斤。

29. 糖業協會編，『近代日本糖業史』，上卷七一頁所載第四表。
30. 事實上，明治二四（一八九一）年二月，日本當局，曾經派遣駐福州領事到台灣調查台灣糖業。根據該領事之記述，當時日本每年輸入台糖三、四〇萬担，價值海關銀多達六、七〇萬兩。參照參謀本部編『台灣誌』（同上註4），一一〇～一一八頁、一八八～一八九頁。
31. 前引『台灣使槎錄』（同註18.），六二頁。
32. 連橫撰『台灣通史』（台灣文獻叢刊一二八種），第四册六五四頁。
33. 『台灣文化志』（同上註9.）中卷，六四八頁。
34.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科編輯室編『洋務運動』第七册，七一～七二頁。
35. 參照 J.W. DAVIDSON, *OP. CIT.*, PP. 395 ~ 396 之表。又，根據前述明治二四年二月到台灣調查的福州領事之報告，則謂當年「茶況甚為昌盛……聽說台灣一年間之茶葉輸出量勝於我（日本）全國之輸出量」，前引『台灣誌』，（同上註4.）五三頁。
36. J.W. DAVIDSON, *IBID.*, P. 443。
37. 輸出額根據前引『台灣經濟史研究』（同上註22.），三五三頁之表。再者，本統計不包含從台南（安平在內）之輸出。又，向中國大陸之移出是否包括在內亦不清楚。換算率的一日圓五四日錢則得自『日清戰爭實記』，第三六編「北部台灣之貿易」。
38. 前引『台灣誌』（同上註4.），一九九～二〇〇頁。
39. 上引書（同上註4.），一四〇頁。
40. 參照前引『台灣通史』（同註32.）（第六册），列傳各項目。
41. 參照上引書（同註32.），一〇一二頁。

以上諸節，我們不惜贅述台灣開發的略史及台灣尚未真正施行洋務運動前夕的產業和經濟狀況。由上可知，晚清台灣絕非體制與體制派文人、官員所云的「化外之地」，亦非人云亦云的「未開之地」。誠如明治24年（1891年）作過實地台灣社會調查的日本駐福州領事所云「由東洋政略上觀之，該島（指台灣）的將來乃是今後我國（指日本）人最值得注意者。我此次前往該島各地考察物產資源及其他事物，其富庶實在令人驚訝，……誠可稱天賦寶藏之地」（註38。）。

洋務運動前台灣經濟成長迅速的原因

台灣，的的確確是寶島。清朝政績乏善可陳，並不因而促使來台一般民衆，減低其爲求生存，維持最低生活而從事開拓事業之興趣和努力。

我們不能忘記，來台開墾闢天下的大多數漢人，可以說都是在大陸出身地破了產，不得不冒險過海的流亡農民與其後裔。他們的家世和來台的歷史背景以及他們父祖輩在對岸鄉土的社會基礎，却變爲支撐着他們「開拓者精神」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衆人皆知，台灣是先居有「先住台灣人」（*NATIVE TAIWANESE*）的海島。但他們高山諸族的社會生產力與「民智」，相對地且大大地落後於漢族系移台住民的。因而，當他們遭遇到移民集團的人侵進自關棘造田時，心雖有不甘，但被逼只好節節退却，避至山地深谷求其生存。

來台漢族移民集團，逐漸相聚爲村莊，形成新移民村莊社會。新移民社會，一般來言，它甚少具有封建傳統束縛的。它的社會秩序，往往依靠着，源自住民內部的核心勢力來維持並鞏固之。

台灣，遙遠屹立於中國東南海面上的「小孤島」，儘管北京皇帝雖鞭長但亦莫及。尤當腐敗不堪，綱紀紊亂的晚清朝，政府控制台灣民間之力量更見低弱，駐台官員既明哲保身亦伺機中飽私囊，難有多餘的心與力，來管制開拓農民爲中心之台灣移民村莊社會。

筆者認爲，台灣的例子毋寧可說是與「傳統社會」是相反的。我不使苟同庸俗的常識論，人云亦云的「台灣觀」。當然亦不使接受好以「化外之地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等等俗語爲形容台灣的「負面」詞的一種慣用法。

「化外之地」，「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俗語，言者無意，聽者可覺，正是「話中有話」。它不正是在告訴我們，移民社會仍然有其「邊境」，移民社會的執政權力不夠嚴密有其鬆弛地帶，秩序尚未鞏固等等社會現實嗎？

上述社會現實，與其說將成爲阻礙或限制來台漢族系農民的開拓活動，不如說反而對一般開拓農民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讓移民們有機會充分發揮其潛能，在台灣開其勞動的花、結其血汗之果，開創出寶島台灣的真象來。

再者，在新開墾的沃壤及良好的氣候條件下，豐富的特產在國際市場上，佔有其優越地位，促使開拓農民的精力更集中於開拓事業上，結果耕地面積大增。參予「邊境」台灣的開拓，較比在對岸大陸從事耕作，陷於佃農的惡劣情況要來得有利，亦富於挑戰。故來台人口激增到上述二百五十五萬之多。尤其人口在社會層面上的激增的（非自然層次上的增加），概集中於劉銘傳推行新政前後，是很值得我們留意研討的（註39。）。

清末台灣推行洋務運動的條件與原因

在貿易方面，亦與振興開拓有關連的產業同樣有利。儘管英國等外國商人極盡其榨取之能事，當年仍然產生了陳福謙（著名糖商、陳中和的先人）、林維源（林本源家）、黃南球、李春生、沈鴻傑等等具有代表性的大商人（註40。）。

其中之一位，沈鴻傑爲了改良製糖方法，從德國引進新式機器在新營（台南縣境）設廠，在當時似乎是一件頗令人驚訝之快事（註41。）。

台灣，正由於上述相當有規模的社會經濟基礎，及逐漸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資本家之存在上，才能從內部支撐洋務運動——劉銘傳的「新政」的開展。

腐敗紊亂，病入膏肓的晚清期間，清朝爲何會企圖導入洋務運動於「邊陲之地，台灣」呢？理由甚爲簡單，日漸逼迫的外來軍事威脅，叫清朝生起危機感。因而，清朝洋務派爲了擴充並確保東南七省的防務與安全，只好斷然地在台灣推行洋務運動

聽陳映真 演講

過客

能夠把台灣文學的問題置於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範疇下來思考的人並不多，陳映真以他多年來對此的關注以及這次在美與一些第三世界作家的短期接觸，在哥大發表，他的心得，描繪出台灣文學或文化的歷史情境和奮鬥的方向。

共同的生活經驗——依賴性發展

陳映真首先指出台灣與第三世界的相同和相異矣。事實上，近代史中，資本主義國家對第三世界的滲透過程，雖然各被滲透國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但所展現出的社會結構反應，大體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依賴性的發展。台灣的外債和外資量雖然比其他國家低，但是國民黨及其所控制經營企業的買辦依賴性質並不亞於其他國家；台灣過度依賴性的外銷導向經濟使得它在全體資本主義市場貿易的不平等交換體系中毫無討價還價的能力，這幾年已明顯地表現此種惡果。因之，台灣社會與第三世界國家社會共同點的重要性遠超過其相異點。也就是基於這種共同的生活經驗（而文學本身即在宣示出人類的生活經驗），瞭解第三世界文學就變成了我們生存，奮鬥與學習上不可或缺的需要。誠如他在最近訪問上所指出的：“文學對人道主義、愛和正義的關心，超越了政治、偏見和仇恨”（夏潮論壇1983年10月號第77頁）。

面對（邊陲性）大眾消費社會

陳映真提出的第二個理念是：台灣的大眾消費性社會對當前文學作家的挑戰。

戰後台灣的資本主義改造的加速發展使得食、

衣、住、行、娛樂的型態起了根本的改變。經濟的奇蹟伴隨着人的深刻西化與物化，造就了橫行一度的國際派文學和至今依然盤踞商場主宰地位的消費文學。作家必須負起嚴格批判社會的任務。可惜在此我們無法清晰地從陳映真的演講中得到面對之道。可以說，在現存體制下他是悲觀的吧？因為台灣的消費資本主義有其邊陲性的特點：消費性的模仿、排場傾向，外銷導向經濟，農村解體所培育出的色情行業，依賴性經濟停滯與不景氣所帶動的社會犯罪，資金外流，無一不正刻蝕這個陳映真所說的「可愛」的台灣，面對着這種龐大邊陲性資本主義勢力的侵襲，我們的文化工作者要調整自己是多麼艱難。即使在陳映真的個人生活上，我們是極其悲憤地看到他正扮演着兩種相互衝突的角色存在：一是廣告設計的MARKETING PROMOTION，另一是良心的作家。

因之，我們並不認為陳映真所提的「學習、介紹第三世界作品，以及改變寫作的態度」能在抵禦此種努力上有所突破。因為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不單是文學上的問題。唯有改變此種邊陲性社會經濟，才有更進一步的希望。

邁向更廣闊的視野

從這個演講會上，我們很欣慰地體會出陳映真

文學！文學！

粗略來看，文學和民主運動好像是毫不相干的兩碼子事。的確，有些文學家對政治不聞不問；而政治工作者對文藝之欠缺了解也是很平常的事。然而，反映生活，表達人生的文學作品是無法不涉及生活的環境與時代的背景的，所以古今中外許多偉大的作品往往從人生的社會舞台中提煉出人性，人生的悲喜劇等等的結晶。也因此，文學家往往是擁抱社會最熱烈的，有些文學家甚至是社會改革事業的積極推動者，如歐洲的歌德、雪萊，或台灣的王拓、楊青矗等都是。當我們了解兩者之間有其內在的一致性時，對於許多人之兼具雙重身份，也就不引以為奇了。

另一方面，政治的涵蓋面也愈來愈廣。社會日漸複雜，人們對社會有機整體性的認識也愈來愈深刻即以戰爭為例，歐洲早期只是戰爭為單純軍事行動，到了克勞塞維茨發展了總體戰的概念，關連戰爭除了包括狹義的軍事外，還要調動政治、經濟、社會及民間各方面的力量，作全體總動員。這就是人們不列達識了社會的一體性而形成的看法。同樣，民主運動涉反而擴展，政治上的改革與進步，決不能只局限在狹義的選舉與議會運作上。一個健康的民主運動，必須兼顧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這種認識已被愈來愈多人所掌握了。

準此，我們在前兩、三期的「民主台灣」上都刊了文藝方面的作品。這方面的工作我們要繼續下去，而且還要加強。

這期，我們刊載了有關兩次座談會的文章。一次是在十月底於芝城舉行的一個座談會。六位演講者五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作家寫作班，由芝大華文教授主持，內容主要談各作家走入創作這條道路的過程。六位作家分別來自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年紀有大有小。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時代，對作家有什麼不同的影響？讀者可以陳鴻先生的一篇報導文章中，看到這個有趣的對比。

陳映真是台灣最受重視的作家之一。這不僅是因為他曾遭受過國民黨的迫害，也不僅是因為他的小說技巧高明，而且是因為他敏銳的觀察力與深刻的思想，並且能夠把這個觀察與思想融入文學創作中。上期我們評介的他的一篇中篇小說「萬商帝君」便是一例。陳映真也極關心台灣的人權、民主運動與前途問題，不時可看到他在黨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十一月底，陳先生應紐約哥大之邀，發表了兩次文學演講。「遊客」先生整理了他參加的華盛。讀者可從這個簡潔而內容豐富的短文中，看到陳映真獨到而深入的見解，引人不由地思索他所提出來的問題，僅得再三細讀。

——編者識

個人的成長，這三個月的海外經驗讓他“邁向更廣闊的視野”，更具體地認識到原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也有過像我們一樣的歷史命運（文學運動），而且在許多方面（如對文字、語言和作家的追慕），台灣算是較幸運的。各種場合的討論、批判，相信也能使他在台灣（甚至中國）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上的思考更為充實和成熟。傳統關關自守，政視留洋的看法早已被證實過於偏頗。美國雖然不是個真

實上自由民主的國家，但還是有不少可以提供台灣出來的朋友知識成長，進步之處。而北美，一向被視為只會培養買辦學者的地方，雖然到了八十年代，極右勢力震盪而且有些法西斯的傾向，但是近十餘年來大家歷經釣魚台運動和台灣內部反抗勢力開展的濺灑與覺醒，似乎應該是個能夠回歸批判思想、進步理念的最主要地方吧。

記一次 文學座談會

陳鴻

陳映真、等六位分別來自海峽兩岸及香港的作家，終於在大家引領期盼下，和在綿密的細雨中連袂到了芝加哥。十月二十二日不畏風雨，出席位於芝加哥大學的文學座談會的聽眾至少有一百五十到兩百人。小小的座談會會場，擠得水洩不通；站着的、坐着的、窗台上靠着的、滿坑滿谷、全是「炎黃子孫」，偶而點綴着一、兩個以能吃中國飯、會說兩句中國話、認得幾個中國大字為傲的「黃髮碧眼兒」，像劉姥姥逛大觀園似的，在那兒傻坐着。會場台前正中央，一字排開一張橫貫全室的會議桌。六位男女作家，「性別有序」地一一兩位女作家分坐會議桌的兩端，四位男作家居中而坐一一也是一字排開，就坐桌前，十四隻眼睛一一加上主席的一雙一一眨巴着，等着「觀衆」陸續就座，座談會好正始開始。

座談會終於在下午兩點三十分開始了。主席李歐梵先生，西裝筆挺、意氣風發，首先介紹了來自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這六位作家：由左至右依序為茹志鵬、六等生、吳祖光、彥火、陳映真以及茹志鵬的女兒一一王安憶。

坐在左首的茹志鵬首先發言。她沒有化粧、飽經風霜的中年婦女，眉眼之間，透出一股堅定、剛毅。談到如何由始從事寫作，茹志鵬回憶：一九四三年，她隨兄參加新四軍，曾任蘇中軍區前綫話劇團演員及組長。在前綫演出「白毛女」，目睹前綫即將投入戰爭的年輕戰士，平日不畏死難，怎麼難苦悲痛都不會流一滴眼淚，居然為劇中人「喜兒」不幸遭遇、痛哭流涕，劇後仍頻頻拭淚，走出會場，赴向火綫時，咬牙切齒地齊聲高喊：「為喜兒報仇」；片刻，不遠的「前方」就傳來震耳欲聾的槍礮聲。十八歲的茹志鵬就此感悟到：文學創作的力

量之大，從此立下志願：要拿起筆桿，化文藝為有力武器，為戰士、人群創作。一九四七年，寫歌詞一一「跑得快就打得好」，曾獲軍區文藝創作二等獎一一兩斤豬肉。從此，正式開始寫作生涯；文務團分工後，開始專門負責文藝創作，先從事話劇，後改行小說、散文。一九五八年，她的短篇小說「百合花」一一歌頌軍民動人的血肉關係，筆調細膩，人物性格鮮明一一曾轟動一時。

茹志鵬之後是七等生發言。中等身材的七等生、面孔年輕黎黑而兩眼神采奕奕。有意識的從事創作，在六位作家中他是最早的一個。十四歲起在台灣大甲鎮附近鄉村生活沒有友伴沒有參予聚眾鬧毆的七等生，就在家裏私人辦報一一「太平週報」，集發行人、出版人、製作人、剪貼者，漫畫家、讀者於一身，為期一年，全部是短小的漫畫作品。後到台北師範學校唸書，於此同時開始學習繪畫，二十三歲，教書三年後，才開始第一篇文章。據七等生回憶，他的寫作興趣受兩本書的影響頗大：其一為「諸神復活」，雷歐那圖·達芬奇繪製「最後的晚餐」的六七年經過。達芬奇的神秘性格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幼年的七等生為「草葉集」其詩的律動所着迷，把詩集幾乎全部抄錄下來。直到二十三歲開始當兵，才以文字形式寫了第一篇小說一一「隱遁的小小兵」，在「現代文學」刊出，開始了他漫長的寫作生涯。

第三個輪到發言的是著名的劇作家、劇評家、兼電影導演吳祖光。著作等身（有四十個劇本）的吳祖光可是春意盎然、一團和氣、謙虛客氣、平易近人。談到他的寫作經驗，吳祖光風趣幽默、妙語如珠、逗得「觀衆」、「聽衆」樂不可支。他一個逗兒數落自己的不是，先是「我是非常土的一個鄉下人，到了很現代化的美國，有點兒眼花撩亂」；

繼而「沒唸過多少書」、「花拳綉腿沒有真材實學」從小「自卑」、老喜歡「藏拙」、「濫竽充數」跟大夥兒一塊兒唱歌兒，被女老師偶然發現的音樂歌喉，也因為自此以後害怕，不願再正經唱歌了，所長也不得發展，以致於今天「最老不成材」。從事劇本創作也實在是因為一向「不正經唸書」的緣故。據吳祖光說：高中時代，有一年半的時間「不正經唸書」，每天下午都到北京一個只有販夫走卒和學生去的戲院子聽戲去了，因此後來寫戲主要就是由於京劇在少年時代打下的基礎。由於當初被京劇給迷住了，雖沒有心特意去學習，但在以後的戲劇創作上受傳統京劇的音樂和對話影響很大，因為中國戲曲中，有所謂「三小戲」——小生、小旦、小丑，在京劇中，舞蹈少，歌唱也少，武打幾乎沒有；完全是靠對話，這三小戲假如發展起來，很可能形成現代中國的話劇。吳祖光自謂老想宣傳中國傳統的優點，故自謙為「土」，為「國粹主義者」，受西方的影響不大。一九三七年二十歲不到時，他寫了第一個話劇劇本——「鳳凰城」，他編了一段京劇，插在其間。就這麼開始寫起來。另外，開始寫小文章，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前，長期以來最喜歡的是中國舊詩、詞，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期一、兩年，有機會開始學習作詩，寫了一些舊體詩，其間作了十年電影導演工作，也寫了一些傳統形式的戲曲劇本和話劇。最終還是以自謙了結：自謂「沒有生活和學識的基礎」，「作品只有等着批判」。談話在笑聲中結束。

接着發言的是彥火，是六位作家中，唯一來自香港的一位。口操帶有濃重廣東話口音的普通話，說話態度誠懇、幽默。彥火在六位作家中算小老弟。彥火身為香港「三聯書店」的編輯，也在報館、新聞界作事，兼寫一些散文。談起寫作經驗據彥火說，由於同在報館副刊寫專欄的曹聚仁平素喜歡年輕後進，鼓勵彥火從年輕時起，多收集有關中國當代作家的材料，由此開始寫作。又鑑於香港文壇對海峽兩岸的作家，由於隔閡，所引用的資料，多為二手，往往以訛傳訛，多所失誤。後編「海洋文藝」；有機會接觸海內外大作家，由於工作上的方便，可以親自訪問他們，並將有關資料與作家本人核定正誤，出了兩部「當代作家風貌」，目前正從事「海外華僑作家」的文獻。在談到香港文學與大陸、台灣文學的區別時，彥火指出香港由於地利，成

為中西文化交匯中心，因此是比較敏感的地區，中國大陸的新文學在台灣遭禁，香港却能比較瞭解；而西方文化思潮，是大陸所隔閡的也是首先在香港介紹翻譯。但香港本身由於是一個「商品社會」，文學作為商品，只有消遣性，價值很低，因此沒有培植文學的土壤。因香港的職業作家，主要是寫言情小說，否則無以生存。香港的業餘作家因而相當蓬勃，日間工作、夜晚寫作。但因沒有充分時間、缺乏創作環境，也產生不出好的作品來。彥火認為，只有等香港社會安定下來，才可能有重要的作品產生。

在眾人興奮焦灼的期待下，終於輪到萬方矚目的陳映真發言。陳映真表情凝重，面上、額上歲月及憂慮的刻痕鮮明，說話聲音寬厚、音調低緩，娓娓道來他的寫作經歷。童年時代，圖畫課是得意的科目在班上表現好。自小對語言、文字相當敏感，學習漢語神速。中學時代，作文及國文課是唯一唸得好、有興趣的科目，受一位四川籍的國文老師，嚴格的詩詞訓練和薰陶，奠定很好的漢語基礎。高中時，作文課自由命題，產生了第一篇浪漫、感傷格調的少男少女愛情悲劇小說，在當時的「野風」雜誌刊出。在校辦壁報、畫插圖、寫文章，認識了高兩班的尉天聰。陳映真上大學以後，尉天聰自辦「筆匯」雜誌，請他寫小說；陳映真把大學作文課的一篇英文作文，修改翻譯成中文交卷，成為他第一個故事，以後一篇接一篇寫出，登載在「筆匯」上，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坐牢時止。但據陳映真指出，他寫作生涯所受的命運性的影響，是來自魯迅。台灣光復時，時任新生報副刊「橋」主編的楊逵，為了促進台灣華語教育，出了很多三、四十年代，魯迅、巴金等人作品的。陳映真的父親，和當時很多熱心的知識份子一樣，收集了很多這類叢書。幼年的陳映真在他的書房中，找到一本紅皮的「吶喊」，其中的「阿Q正傳」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和影響。這是語言上的影響，此其一。第二個來自魯迅的影響是民族的認同，隨年歲增長，慢慢理解出從魯迅作品所看出的世界，和台灣社會的相同性。第三個影響是由於接觸了三十年代文藝、政治、經濟理論，使陳映真較早地形成了以批判的態度來對待三十年來台灣社會所接受的美國和西方的價值觀，和文學教育。文學上所受的其他影響，所來自的第一個外國作家，以日語讀的

則是俄國作家安東契訶夫。契訶夫的人物，有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憂鬱、無所作爲的苦悶感，很合陳映真想表達的主題和感受。由於讀的是日語翻譯，日語奇特的語言結構和風味，也影響了陳映真的小說表達方式。第二個外國作家是芥川龍之介，他的人物有非常精緻的、絕望的、自棄的、頹廢的心態，對陳映真影響也很大。談到台灣文字目前面臨的問題，陳映真指出第一是語言的問題。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台灣社會一般而言，漢語教育發生問題，師資缺乏，對於好的近代文學作品，或學生習作，却沒能加以分析、批評；對去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的豐富遺產，也沒有加以整理利用。第二是中國三、四十年代的新文學，由於政治原因，造成了台灣文化及文學上的斷層。第三台灣社會一如美國，講管道越來越多工商社會，講究效率的結果，是語言越來越退化，語言的繁複性被忽略。台灣需要努力去復興語言，需要正確、嚴肅的看待語言問題。這個疾病已蔓延到各類文字。另外，相當嚴重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台灣社會文化上、思想上的貧困。由於複雜的原因，台灣人文科學被三十年來對文學、哲學的限制，造成思想不能創新，對文學、文化上的影響很大。台灣文學創作者，因為認識上的貧困，對歷史、文化在認識上，焦點很模糊。陳映真指出，補救的方法是，現代作家須有這層認識，需要進修，增進知識，才能較精確地看待人生、剖析人生，寫出與生活比較接近的作品。文化、思考、意念上的貧困，是創作及學術上貧困的源頭。最後，陳映真談到台灣作家的自由。他說：我們必須誠實地指出，台灣三十年來，幾乎沒有一個人，因創作而坐牢，也很少有人肯在文學作品中，碰觸政治上敏感、犯忌該禁的領域。他以為，台灣政府經過這麼多年來對他出國的禁制，首次讓他離開台灣，赴美作短期講學旅遊，也許不能作為個案處理。與以下幾種考慮，綜合來看，似乎預示着台灣國民黨政府，於最近的將來，可能發展的一個開明方向。第一：黃春明的小說「蘋果的滋味」，已由中央電影製片廠出資拍製。拍製過程中，雖然起了些爭執，但大體上忠於原著。第二：國民黨一反過去每年十二月立委增額選舉大選前抓人的作風。今年在大選前夕提前假釋政治犯，作家楊青矗為其中之一，這是一反慣例的作法。第三：陳映真本人最近的小說「山路」，是以台灣五十年代左翼共產黨為主題。

陳本人，在「山路」刊出後，隨時等着這篇小說被禁。沒想到，「山路」反而得到中國時報「推薦獎」。陳映真最後審慎地指出，綜合以上種種跡象，似乎台灣社會將有一個較自由化、民主化的傾向，就海峽兩岸任何一方來說，都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最後輪到發言的是，六位作家中，最年輕的王安憶，二十九歲的王安憶是作家茹志鵲的女兒，個子高挑，反應敏捷，口才流利。談到她是怎麼開始寫小說的王安憶回憶，小時候她對寫小說、做小說家沒有抱什麼夢想。由於小學五年級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不能再上學唸書。下鄉以後，在不知作什麼好的徬徨中，開始有寫作的夢想，尤其因為母親是一個寫小說的，因此就想自己也做一個小說家。四人幫倒台後，雖有回學校唸書的機會，但認為從頭整理功課、準備考試，能力時間均不容許，既然時間已流失浪費了很多，就不允許自己再浪費了。一九八〇年的文學氣候變了，作家有較大的幅度的自由和多樣的嘗試，從事小說創作。在這樣的文學氣候影響下，王安憶寫成了她的第一篇小說「小雨沙沙沙」。王安憶指出，她在這篇小說中，非常真誠如實地把心中的感受寫出來。下鄉插隊落戶的經驗，對王安憶有很大的影響。在不長的幾年中，最初她有極委屈的感覺。然而，現在的王安憶回顧插隊落戶的經驗，認為在生活上，確實是一種難得的教育，因為這種生活經驗，不是書本上的知識所能提供的。現在的青年人都有一種共同認識：覺得自我應該擴大一點、提高一點。七九、八〇年代小說發牢騷的階段已經過去了，現在的小說開始有深一層的認識、開始寫自己的感覺。她又指出，海外對國內有興趣的作品，如「苦戀」、如「人妖之間」，都是引起轟動性的作品，却不純以文學的角度出發。她認為好的作品應該生命力更長久一些。自己身為寫小說的，她覺得寫小說的往往得到社會過多的注意和讚美，他們實在和社會裏從事其他職業的人，沒有大不同。

以下是觀眾、聽眾和作家們談話的綜合整理：
問：文學與作家和社會有什麼關係？

茹志鵲答：文學有其社會功能，是為社會服務的。它是一個有力、有效的武器。好的作品是應該為人群而寫的；作家應該透過文

學，表達對社會的關懷，才能社會和心聲。如果作家的動機和目的背離社會的須求，是很悲哀的。

王安憶答：文學是從自我出發，描述自我的感覺；但一旦出發後，是與社會有聯繫的。作家自身有被瞭解的需求，但讀者讀後，反而有他們被瞭解的感覺。

問：拉丁美洲的鄉土文學與台灣的鄉土文學有何不同？

陳映真答：台灣的鄉土文學是自發的。楊青矗為工人作家，但不能稱之為無產階級藝術家。由於台灣的政治社會環境比較特殊，台灣作家因此比較善良、單純，對歷史、文化、社會的認識不夠、焦點模糊。

問：吳祖光先生的劇本與西方劇本有無相同之處？

吳祖光答：作品希望繼承中國傳統，但傳統太大，苦於很難達到，因此自覺作品與西方近代作品仍很相似。

問：文學作品的效果應當如何？

王安憶答：文學作品的效果應當是安靜的，不應該是爆炸性的。比如劉心武的「班主任」，效果太轟轟烈烈了。現在的小說和一般文學作品在往真正的文學、更好的文學的方向發展。

問：小說家與社會學家對社會資料的處理方式是不是不同？

陳映真答：小說家與社會學家對社會資料的處理方式理應不同。但小說家應該多有一點「知」的生活，再以純粹主觀意念去理解現今這樣分工精細、龐大組織運行的社會和世界是不夠的。小說家應像其他社會科學家一樣，勤懇努力地用功去求知——作研究、作筆記、旅行、分析，具備了現代知識，才可以比較接近他所要理解，所要刻劃的生活。

問：請談談香港的文學，以及香港的文學活動。

彥火答：香港的言情小說太多，文學的正常功能消失；而文學的價值主要是從商品的角度出發來衡量。作品的思考性、深度性因而非常貧乏。至於文學活動，香港有兩年一次中文文學獎，另由兩家大學主辦的文學獎。

問：繪畫的興趣對七等生的文學作品有無關係？

七等生答：我因自小喜歡繪畫和音樂，我想繪畫和音樂和我的小說創作有一定的關係。

問：請陳映真談談日本左翼傳統裏的作家對他的影響，以及他的作品與這些作品之間的對話關係。

陳映真答：日本大正年代至今也有七十年了，日本一直有左翼作品的發展。透過魯迅的文章，我確實接觸到這方面的思想和理論，比方「日本共產黨黨魁公文」評芥川龍之介一文就很精彩！另外還有「社會主義思想全集」等書，幸或不幸，對我本人人道主義思想的形成，都有深刻複雜的影響。

問：文學作品裏是否應該有「意義」（即動機）？

王安憶答：高曉聲的小說裏是有東西要傳達，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可能把「意義」抽離文學作品來對待。如果要我說明高曉聲小說裏頭的意義，我沒有別的辦法作說明；我只能把故事完整地告訴第二個人，假如他再要說明這個故事的意義，他再把故事完整地告訴第三個人，那麼，意義就在這裏頭。

問：請談談寫作習慣、寫作過程。

吳祖光答：每天由於工作量很大，又經常須要替年輕人送來的劇本改稿，每天工作到夜裏兩點，第二天七點鐘就起床，因此，讀書、寫作隨時爭取時間，這叫做「見縫插針」。

問：寫作時，是先有人物，後有意念；還是，先有意念，後有人物？

茹志能答：寫作過程，每個情況不一樣。有時先有人物，有時先有意念。但先有人物的創作，效果往往比較好。

七等生答：寫作受作者生活世界的影響，表現自我在生物世界中，是一種常見的現象。我是比較屬於自由派，我主要想表現我的內心世界，不在乎讀者的態度和反應。

座談會於下午五時三刻結束。會後，部份意猶未盡的與會者各人自掏腰包，以自助餐方式在座談會會場與作家們聚餐，三三兩兩圍着各人心儀的作家，繼續未竟之談。餐後七時許，賓主盡歡而散。

更正啓事

本刊21期「研究台灣史的經驗談」（戴國輝先生在夏令營討論會講詞）一文，文前的「編者識」及本文有些嚴重錯誤，經戴國輝先生來函指出，謹更正於後，並向戴先生及讀者致歉。

重要的錯誤更正表

19頁「編者識」第一段：

「1956年赴美」

應為「1955年赴美」

「東京經濟發展研究所」

應為「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

「皇族等大學……」

應為「學習院學校等大學」

19頁第二段第二行：

「台灣史研究會」

應為「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

20頁左側一行：

「二、三個地方我不滿意」

應為「二、三個小地方我不甚滿意」

23頁左二四行：

「他們的文化水平」

應為「一般來說文化水平」

23頁右十一行：

「訓練一批人才」

應為「訓練一批土著人才」

24頁左二行：

「開辦醫學校」

應為「開辦醫學校培養台灣人的醫學人才」

24頁右八行：

「我們清朝的台灣」

應為「我們清朝期的台灣」

24頁右九行：

「憑空搞起來」

應為「憑空在荒地吧台灣糖業搞起來」

26頁左十四行

「台灣習慣調查」

應為「“台灣舊慣調查”」

27頁右圖片說明五行：

「達茲其斯·納偉」

應為「達茲其斯·諾敏」

27頁右十行：

「同仁以後」

應為「同仁以及同鄉以後」

28頁右十八行：

「少少的禮物」

應為「少少的禮物——『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29頁左十四行、二七行、右一行：

「台灣意識」

應為「台灣人意識」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Taiwan
(OSDMT)
P.O. Box 53551
Chicago, IL 60653

Non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Chicago, IL
Permit No. 3293

Return postage guaranteed

5149
FH ST, #2
IL 60615